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曹雪娟 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编委

主　　任：徐　明
副 主 任：温祥华
主　　编：曹雪娟
副 主 编：何斌华
执行副主编：王　庆　叶　勇　刘豪兴
编　　委：徐　明　温祥华　曹雪娟
何斌华　王　庆　叶　勇
刘豪兴　费　皖　徐　平
吴　铎　冯月根　杨晓容
叶伟春　刘　勇　潘允康
朱云云　刘长喜　徐大伟

序

汝 信

今年是费孝通教授100周年诞辰。费老的家乡，吴江市委、市政府对费老百年的纪念活动非常重视，从去年就开始策划和筹备。其中之一，就是要出一本全面回顾和思考费老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著作。我认为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

应吴江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求，让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费老是吴江人，我也是原籍吴江，我们的祖居相距不太远，可算是正宗的同乡。但在我的记忆里，费老更多的是我尊敬的前辈、我的师长，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他的学术风范，始终在我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费老是当代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老的一生始终在追求理想、追求富民、追求强国，从他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这一点。当年他从学医改为学习社会学，从研究作为个体的自然的人到研究作为群体的社会的人，从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到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研究，从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到对中国社会学的培植与重建，从江村的研究到小城镇的研究，从县域经济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从社区建设到小康社会的研究，从中华文化到文化自觉的提出，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关注，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费老是一位与时俱进、胸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他的思考和研究是超越历史、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

费老总喜欢称自己是一介书生，是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他行行重行行，一辈子都在从事社会调查。有生之年，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观察着社会的点点滴滴，他对中国农民、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了解是广泛而深刻的，也是独特而自主的。无论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民主党派人士，还是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他都在他坚守的阵地上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民的安康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生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作出了示范。

吴江是费老的出生地，也是他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他对家乡人民的情感，对中

国农民的情感是深厚而久远的。他在《爱我家乡》一书中讲到，“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育养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可以告慰费老的是，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亲朋好友没有忘记他，学生弟子没有忘记他，所有了解费老、接触费老、认识费老，接受过费老教诲、帮助和关爱的人都没有忘记他，都在深深地怀念他。

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费老“志在富民”的学术思想，“文化自觉”的学术品格，“美美与共”的学术理想，必将像那参天的大树一样根深叶茂，像那巨大的富矿一样取之不尽。

目录

CONTENTS

序 ……汝 信

第一篇 学科发展

第一章 跨越“文野之别”的新开拓 ……3
一、倡导社区研究 ……3
二、三次“田野作业” ……6
三、成功的起点：《江村经济》 ……12
四、乡土社会的“通论”研究 ……15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 ……20
一、为中国社会学的生存而历经坎坷 ……20
二、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尽力 ……25
三、从实求知与新探索 ……28
四、学术反思 ……31
五、“大树”与“富矿” ……33

第三章 家庭研究的理论贡献 ……38

一、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 ……38
二、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 ……41
三、以“双系抚育”为中心婚姻家庭功能论 ……43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两种家庭模式 ……45
五、现代婚姻家庭建设的科学发展观 ……47

第四章　从实求知的社会研究方法 ……50
一、走向社会，实地调查 ……50
二、功能主义方法论 ……55
三、“逐步”、“接近”认识中国社会的具体研究方法 ……58

第二篇　民族研究

第五章　从大瑶山出发的民族研究 ……69
一、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 ……69
二、类型加比较，行行重行行 ……73
三、六上大瑶山，不解终身缘 ……75

第六章　解放初期的民族工作 ……81
一、参加中央访问团 ……82
二、参与民族识别工作 ……83
三、培养民族干部 ……84
四、提出不同时期民族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85

第七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87

一、对话顾颉刚 ……87
二、对民族调查研究的梳理和思考 ……88
三、西部开发中的人文资源保护 ……91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诞生 ……93

第三篇 经济社会发展

第八章 发展农村工业的主张与疾呼 ……99
一、男耕女织，农工相辅 ……99
二、技术下乡，富民之道 ……100
三、乡村工业，农村希望 ……103
四、小城镇 大问题 ……104

第九章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106
一、“苏南模式” ……106
二、“温州模式” ……108
三、“珠江模式” ……110
四、“侨乡模式” ……111
五、“民权模式” ……112
六、“耿车模式” ……113
七、费孝通的“模式观” ……114

第十章 区域发展研究 ……116
一、“区域发展”概念的提出 ……116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117

三、费孝通与泛珠江三角洲 ……119
四、加快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建议 ……121
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 ……122
六、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 ……123
七、东北亚经济开发区 ……124
八、加快图们江地区开发和开放的建议 ……125
九、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125
十、京九铁路经济走廊 ……126

第十一章 缩短东西部差距的开拓性研究 ……128
一、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128
二、西部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130
三、互利互惠——市场合作的根本机制 ……131
四、西部区域发展之路 ……132
五、保护环境，合理开发 ……136

第十二章 “小康”思想与乡土中国 ……141
一、“小康”水准与乡土民生 ……141
二、“小康”生产与乡土经济 ……143
三、“小康”传统与乡土社会 ……145
四、“小康”生活与乡土文化 ……148

第四篇 民主政治

第十三章 参加民盟 ……153

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53
二、反对独裁、反对内战 ……154
三、呼吁和平，呼吁正义 ……155
四、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157

第十四章 迎来解放 …… 159
一、人民代表，参与国是 ……159
二、百家争鸣，反右运动 ……162
三、文革动乱，抄家批斗 ……164

第十五章 重获新生 ……166
一、平反复出，重建社会学 ……166
二、重视教育，多出人才 ……168

第十六章 参政议政 ……171
一、多党合作，推进民主 ……172
二、投入建设，学以致用 ……172
三、实地考察，提出建议 ……174
四、参政议政，务实求真 ……174

第五篇 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

第十七章 差序格局 ……179
一、中国的社会结构 ……179
二、“差序格局”的特点 ……179

三、差序格局的网络 ……181

第十八章 文化自觉与文化价值观 ……182
一、文化自觉的提出 ……182
二、各美其美，自觉地维护自身文化的历史传统 ……183
三、美人之美，学习西方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 ……183
四、美美与共，建立共同遵守的文化准则 ……185
五、天下大同，各国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186

第十九章 费孝通文化思想特点 ……188
一、中学熏陶，西学系统，学贯中西 ……188
二、从实求知，由点及面，终成体系 ……188
三、深入浅出，老少咸喜，微言大义 ……189
四、追求民主，志在富民，终身不悔 ……190

后记 ……191

第一篇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学科发展

第一章 跨越“文野之别”的新开拓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教授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从学医转向学社会学、人类学，怀着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富民目的，勤奋学习，不断创新。他的学术生命开始于大学时代，师承吴文藻、派克、史禄国、马林诺斯基等，进行社区研究。1938年，费孝通用初访江村的调查资料写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书名为《江村经济》。该书被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2]从此，人类学由主要研究原始落后的野蛮部落，转入对文明社会的研究，引起了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飞跃，同时也确立了他的社会学地位。

一、倡导社区研究

社区研究，又称社区分析、社会学调查。一般认为，社区研究的理论研究始于德国社会学家F·藤尼斯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1887），实际的社区研究导源于文化（社会）人类学实地考察初民社会、欧美学者的村落社区研究和城镇社区研究。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声望日高，并快速地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其中发挥了先导和典范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各种观点、流派逐步传入中国，消化吸收较好的代表是社区研究。燕京大学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习与创新有五个途径：第一，请进来。1933年和1935年，先后邀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和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布朗等来燕京大学讲学。派克介绍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芝加哥城市社区研究的经验，大力提倡实地调查。布朗讲授比较社会学，介绍了社会人类学的

1 费孝通对教育体制、教育改革、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等都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是颇有创造性的教育家，现在对此关注和研究者还很少。本书仅是提及，亦未及阐述。

2 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3 参见刘豪兴：《中国社区研究的发展》，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术集刊·第十六期1998，第363页。

理论与方法。第二，走出去。一是有计划地派学生到欧美留学，直接向名师大家学习，掌握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吴文藻1936年前往英国伦敦参加马林诺斯基举办的“席敏纳”（Seminar）讨论班，联系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第三，沉下去。一方面将1928年建立的清河镇实验区列为社区研究的调查基地，另一方面支持学生学术团体——“社会学社”的学术活动，鼓励他们到乡村、市镇进行实地调查。[4]第四，理论引导。吴文藻为倡导社区研究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系列文章，对社区研究的意义、功能、趋势进行阐述，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第五，延续下去。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等撤到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吴文藻和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室，继续开展社区研究；吴文藻主编《社会学丛刊》，出版社区研究成果，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平台。其结果是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在社区研究的实践中融合，形成了以燕京大学学术团队为代表的中国社区学派。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吴文藻已初步认识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是可行的，有意义的，回国后的教学实践和对美英学者研究动向的了解，更让他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应从社区着眼，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社区研究，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吴文藻提出的新观点，就是运用功能学从社区角度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为发展比较社会的基础，凡关于社会与社区、文化与文明、组织与制度、结构与功能、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等的基本原理”，[5]在社区研究中都分别予以介绍与发挥。“功能学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何为功能观点？吴文藻解释说，“功能观点，极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中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就必须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功能学考察社会文化制度，最重视一文化元素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占什么样的位置，发生什么样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需要，因而，功能学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

4 1936年8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社的年青学子前往农村调查之前，在《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上发表社会学社《启行》，铺下决心，激励士气。文曰：“原野是可爱的地方，是我们向往所在，给单纯美，那里从前只有大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事实，现在都在你们手下让你们支配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值得生，去做这件事，去做真理，活着为的大里就到那里，和你们携手同行。”“这次有得不回你们源由坑水，也不是请你们去吃苦日然，除平时互助与帮你们在自己的社区里发现了大自然同生活的通则原理，人和人，人和环境的一切关系。”“风雨晴晨，出营者，要你们各自保重，请记得，没有苦，没有泪，拿生出成绩，生要你们回来，不认识你们，也无需再见。”他们没有辜负大的期望，徐雍舜、黄迪生、黄华节、黄迪、陈友伦、杨庆堃、廖泰初、李有义、费孝通与王同惠等都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大多写出了调查报告，并发表相应的研究报告。

5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田汝康：《学术边的型》“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6页。

6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田汝康：《学术边的型》“附录”，第156页。

系。就内容言，所谓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社会学相同，都是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方法言，功能学派所谓之功能观点，与社会学上所谓之社区观点，两者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功能观点原本就是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自然最有助于现代社区的实证调查。因此，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可以相通的。运用功能学派理论来研究中国社区实际就能取得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出新的路子，得出新的经验与理论。于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可以“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实现这些学科的“彻底中国化”。

1930年，费孝通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希望学好社会原理医治社会之病。但学习了几年社会学，费孝通和同学们却依然感觉不了解中国社会，还谈什么服务社会呢？正当他们苦闷、迷茫时，美国社会学大师派克教授来校讲学，理论联系实际，带领他们走出未名湖，到胡同社区、贫民窟、监狱，甚至到北平的红灯区进行观察，亲身感受社情民意。这让他们受到了震撼，学到了活的社会知识，冲破了本本学习的传统。费孝通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中回忆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我们这辈学生真感激他，把我们带出了书本，进入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我们感激派克老师更重要的是在他给我们指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只有这个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社区研究’就是他给我们的这把钥匙。同时更具体地告诉我们这套方法可以向社会人类学者去学习。”[7]他在《〈乡土中国〉后记》中指出，人们生活坐落的时空，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8]他又指出，派克教授早就说：社会学和人类学应当并家。人类学原是一门包罗极广的科学，和社会学一般经过了分化过程，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也发生了社区研究的趋势。所以这两门学问在这一点上辐辏会合。他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中分析说，“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社会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攀近社会学，一推一拉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门学科的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后来便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特色。”[9]在吴文藻的引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从美英学者手中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的具体方法——社区研究。所谓社区研究“是指研究一个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社会组织、一定文化传统和人文环境的人类群体。”[10]他响应吴文藻老师的号召，积极主动地开展社区实地调查，成绩突出，如

7 《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8~9页。
8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5页。
9 《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9页。
10 《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4页。

他在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上发表译作2本、著作2种；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张之毅、史国衡和田汝康各有1本，占了该丛刊1943年~1948年出版甲、乙两集9本译著的78%，可见费孝通是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的中坚。

燕京大学社区研究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视。1937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在会上发表《社区研究与社会学建设》一文，提出以社区实地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道路，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陈达在会上提出了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提案，为年会一致通过。从此，社区研究在中国不再是个别人的提倡，而是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共识。诚如费孝通于1947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学的长成》文章中评论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极度困难时期，社区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的风气。“在这时期进行着实地社区研究的有三个重要的机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的边疆研究所”[11]，他们在西南广泛地开展了农村、工厂、民族社区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社区实地调查，与院校的社区研究最大的不同是，这些调查研究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直接服务于革命事业。费孝通不无自信地说“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八年的战争时期，已有了重要的迈进，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和实际化的路上的迈进。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开端……”[12]他寄希望于今后的社会学者和实践家的共同努力，在社会学发挥实用的同时推进理论上的发展。

二、三次“田野作业”

费孝通的校友、英国人类学家Sir Rdmund Lhecea在1982年出版了Soci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一书，对费孝通等中国学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田野研究提出了质疑。其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其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13]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和《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等文章中逐一做了肯定的、科学的、全面的回答，这里不作赘述。他在阐述自己的田野作业情况时说，“我生平说得上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三次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14]这三

11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14页

12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15—416页

13 参见费孝通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9~300页。

14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0页。

次田野作业，也就是他早期进行的实地社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广西金秀瑶山调查

除了派克、吴文藻两位老师的循循善诱外，推动费孝通进入实地调查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为留学做准备。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得到公费留学的机会。他的导师史禄国 (俄籍) 教授，要求他在出国前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携带调查资料到国外进行分析研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导师的意见。恰在其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拟订了研究“特种民族”的项目，他应邀承担了这一项目的研究任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验，“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到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贡献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15]同年8月，他偕同新婚夫人王同惠经上海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他们先是在南宁象县进行苗族、瑶族同胞的人体测量，然后进入大秦瑶山。在瑶山，他到各村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则进行家庭、亲属、村落等社会组织调查，他们白天分头工作，“夜卧小屋，日吃淡饭”，生活十分清苦。11月20日，他们离开花篮瑶区域到达坳瑶区域的古陈。不料，在12月16日由古陈赴罗区的山道上发生了惨剧：费孝通遇险，王同惠遇难。关于这一惨剧，吴文藻根据费孝通的介绍做了这样的记述：“由古陈至罗运的一段山路，极其曲折险峻，而和他们同行的向导，又先行不候，以致他们走迷了路，误入一带竹林之中。林中阴黑，他们摸索着走近竹篱，有一似门的设备，以为是到了近村，孝通入内探身视察，不料那是一个瑶人设下的虎阱！机关一踏，木石齐下，把孝通压住。在万千惊乱之中，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起立。同惠又赶紧出村呼援。临行她还再三安慰孝通，便匆匆地走了。她从此一去不返，孝通独自在荒林寒夜中痛苦战栗地过了一夜。次日天刚破晓，便忍痛向外爬行，至薄暮时分，才遇见瑶人，负返邻村。孝通一面住下，一面恳求瑶人四出搜寻，到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同惠的遗体。她已为工作牺牲了，距她与孝通结婚之期才一百零八日。”[16]

费孝通痛定思痛，抱病整理王同惠社会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写成了《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 (简称《花篮瑶社会组织》) 一书，于1936年6月出版专刊。《花篮瑶社会组织》以王同惠遗著名义发表，但事实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著作。该书从社会经济、社会控制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分析了花篮瑶的家庭、亲属团、村落、族团，揭示了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书中附有17幅照片，书前还有他老师吴文藻写的导言，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真挚感情。

15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64页。
16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3页。

《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是费孝通及其妻子王同惠对花蓝瑶社会生活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由于前期准备的不足、语言上的障碍、理论分析的薄弱，该书并不十分厚重，但其是以花蓝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首次把他们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描述，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初步运用。更为有意义的是，后来的家庭、社会制度、民族等许多研究都可以在本书找到相关的元素和观点。

2.江村调查

这是在多个偶然因素综合促成的、以村庄为对象的微型社区研究。但偶然中有必然，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译本的“著者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写成可以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17]后来他又经常说，他的江村调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怎么理解这些话呢？一般从中引申说，他的江村研究原本并无计划，而是在开弦弓村（学名：江村）恢复情绪、休养身体过程中，为江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为江村的乡村工业图景所感染，遂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搞起了社区调查。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与事实不符。费孝通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意，是指对这项研究后来产生的影响和获得的赞誉，即成荫的“柳”是当初没有预想到的，这也是他谦谨的为学之道，不能理解为盲目的、自发行为。江村研究虽然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却是有一定计划、方向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费孝通对江村研究的起步早已有明确的记录，只是我们过去的学习缺乏“认真”二字。[18]

何以见得呢？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二章第六节“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中说，“尤其是在这个村里，我可以充分利用我姐姐个人的联系。我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人确实都很信任她。我能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他们理解我的意图，不仅尽一切可能提供材料，而且还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和有价值的建议，这使我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此外，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因此，我一开始就能直接进入调查本身，无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初步的准备工作。”[19]我们对他以前曾多次访问过江村的详情没有更多的资料得以说明，从他代费达生撰写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和《复兴丝业的先声》（《大公报》，1934-05-10）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姐姐在江村创办乡村工业的事业生动、深刻的剖析仅仅靠间接提供的资料是不够的，还得有亲自的了解和感受。可以推测，他主要是在东吴大学医预科和燕京大学的假期里去看望姐姐，从对村民生产、生活、以

17 《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3页
18 参见刘豪兴：《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社会》2007年第5期，第67页
19 《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32页

及他姐姐与人的交往观察中获得印象和实际情况的。[20]他在文章中向世人介绍了开弦弓村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的发展及所遇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分析是深刻的，埋下了他日后研究的根。更直接的记录，是他1936年7~8月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发表的七篇《江村通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进村前写于震泽震丰丝厂[21]。研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样几点：第一，费孝通广西大瑶山调查伤愈后回到北京准备出国留学事宜，从6月下旬到9月初还有两个多月的“余暇”。怎么利用这段时间呢？他决定研究一个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22]在实地的观察中把它的状况加以描写叙述。第二，因时间和经济上的限制，他不敢做大，“只能以一个村作单位”。为此，他选择了自己已有所了解的开弦弓村。第三，这次研究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他私人方面的，希望做出实际工作来“赎我的罪”，以慰籍在大瑶山调查中献身的王同惠的在天之灵。二是为打破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研究“野蛮”社区的成见，去研究一个本国的“文明”社区。他决心要用事实证明，民族志的方法是同样可以用来研究“文明”社区的。这就需要运用瑶山实地调查的方法，即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一个“文明”社区中搜集资料。第四，离开北平时，他允诺社会研究社的朋友们[23]，在江村研究工作过程中“继续我的《桂行通讯》，来写《江村通讯》”。费孝通进村前的这些考虑，说明他是有所准备的，是有计划地去获取知识的，并不是“无心”，进村以后才“触景生情”进行调查的。这是基本的前提，其动机和希望不但明确，而且志向高远——世界人类学大师在想而尚无行动的前瞻——跨越“文明之别”。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次研究确是得之偶然——由于广西瑶山调查失事他受重伤，虽然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已基本好转，但并未痊愈，精神的伤痛仍存，因而在出国留学前夕，姐姐费达生劝他到她工作的乡下住一段时间，“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24]他则借此机会，计划对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时过境

20 据费孝通在《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答〈中国青年报〉问》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他同学的革命热情受到打击，第二年他在乡间呆了一个假期，是否呆在他姐姐工作的江村或是吴江的滥陵镇（出生地）、同里镇（外婆家）不得而知。

21 震泽震丰丝厂因经营不善，当年租赁给浙墅关女子蚕业学校，改名震泽制丝所，也被称为震泽丝厂，费达生任经理。

22 1936年1月21日，费孝通在广州柔济医院写的《关于追悼同惠的通讯》中说，王同惠和他有一个计划，准备从瑶山出来后，进行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出版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王同惠是能说，也能做的女子，但不幸她在瑶山为呼救费孝通、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不能实现这一宏愿了。费孝通希望担负起这一重任，并在治伤过程中完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第一部著作：《花蓝瑶社会组织》。“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一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世界上。更希望凡是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261~262页。）江村研究成为这一计划的一个部分。

23 社会学社的朋友们多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班同学，有林耀华、李有义、廖泰初、王兆临和我们现在不了解其姓的叔昭、景珊、安仑、秀贞等。

24 《留英记》，《江村经济》附录，第260页。

迁，三四十年的坎坷生涯，未及回顾。当他获得重新的学术生命时，又忙于繁重的学科恢复重建等工作，无暇查找他当年写的《江村通讯》，因而在“著者前言”中留下了“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25]的文字，给人误会的证词。

费孝通到达江村的当天下午，就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偕同一个本村的向导巡视全村”。一方面察看了开弦弓村的社区格局、人文和自然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实地查看，他希望见到一个买卖往来的“市中心”的预想被事实否定了，村里只有分散的几个小店铺（他稍后发现村里有13个店铺）。他由此判定这背后还有一个没有看到的卖买制度，进而发现了村中的“航船制度”和“信任制度”。他随航船从开弦弓村到震泽镇往返全程观察，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这种江南水乡的贸易制度类型。日后，他在随时随地的直接观察中，对村民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活起居、民风习俗、民间信仰、婆媳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实地调查中，访谈是更为重要的。费孝通通过对村中情况熟悉的乡绅、村长和成年人的访谈获取了开弦弓村生产、生活和各种社会制度更为系统、周密、深入的资料。同时，他通过文献资料特别是193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得到了相关的准确数据。

费孝通在《江村通讯》最后说：“我离开了我已发生了亲密感情的一村人民，将远远地离开了，我只觉得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一片亟需开垦的原野。”[26]当时他还没有设想，日后是会再回江村，亲近江村，更没有想到会在这片亟需开垦的原野上躬耕一生。

3.禄村调查

费孝通校对完《江村经济》样稿，以急切的心情于1938年10月回到抗战的后方——云南昆明。他稍事休息两个星期，就选择距离昆明100公里远的“禄村”（他给禄丰县大北厂村取的学名）为调查对象，试图与江村做一比较。江村是城市的附庸，代表着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深的农村社区形式。江村的土地权流入市镇是一个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存在不在地主制度。江村的居民并不是全靠农田上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他们有很发达的手工业。那么，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社区，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场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这些在《江村经济》完成后一直搁置在作者心头的疑问，希望在禄村调查中得到验证和解释，特别是社区研究的方法在对禄村的研究过程中得到完善和提高。1943年出版的《禄村农

25 《江村经济》，第3页
26 《江村通讯》，《江村经济》，第245页

田》一书，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对这些问题做了有理有据的回答。

禄村调查同样是以一个微型农村社区——村庄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了社区分析方法，但在许多方面比江村调查有了提高和改进。

首先，禄村调查克服了过去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的陈见，明确地认识到调查应从理论开始，在调查过程中检验和修改理论，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禄村调查有明确的目标，即研究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变迁，并把其中的一个方面，土地制度和雇工自营方式作为这一主题的重点加以详尽的考察和分析。[27]《禄村农田》主题突出并贯穿全书，而《江村经济》是全景式的描述，缺少一贯到底的理论主线。

第二，禄村研究的层次更为丰富。一是在分类学的层次上，特别参照了社区的土地体制来界定社区的特征。二是在解释的层次上，以理论为经，以叙事为纬，解释和叙事并重。作者把不同类型异同的因素综合起来解释土地所有权集中程度的差异，层层推进，全面分析了禄村人民由利用农田而发生种种现象的缘由，提出消遣经济的概念。而《江村经济》以描述为主，偏重叙事，理论解释不足。

第三，建立类型，运用比较方法。在《江村经济》写作过程中，费孝通已认识到中国社会仅靠江村社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实地考察。他的导师希望他“回国之后再去调查，再去写书”，[28]并给他提出了第二本书的书名，即Earthbound China。禄村是费孝通筹划开展更广泛调查的一个类型，在《禄村农田》的分析中，他经常把《江村经济》作为类型研究的起点，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通过这两种类型的比较，不仅揭示了一个不存在不在地主制度的村庄的特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农村工业对土地制度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在《禄村农田》所提出的问题的引导下，他指导学生张之毅进行了易村和玉村不同类型的研究，遂有《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两本著作问世，丰富了农村社区研究类型。这些调查研究类型的扩展，以及研究者对实际状况的持续的提炼和更为仔细的定义，滋养了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长，为更宏大的同类研究计划奠定了基础。

第四，《江村经济》中显现的社会科学为人类服务的学术价值观，在《禄村农田》中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费孝通认为，把科学研究和实践政策联系起来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中国农民当了原告。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陈述了中国内地农民拥有土地和困苦生活的情况，呼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制

27 参见《禄村农田》，《江村经济》，第314页。
28 《留英记》，《江村经济》，第272页。

定一些合适的政策，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无意中，我被英美的读者看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29]这些建议，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是不可能被采纳的，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尽到了一份社会责任。

《禄村农田》出版后在英国广泛流传，“获教育部的奖赏”[30]。1943~1944年，他在访美期间得到雷斐尔德夫人的协助，将《禄村农田》和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编译成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又译《乡土的中国：云南乡村经济研究》，或《云南三村》），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1月开始，美国《太阳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对该书进行了介绍和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在社会学社区研究文献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并且是中国新一代社会科学家在长期战乱中获得的坚韧意志的难得的象征。这些学者自觉地脱离了处处以本本为师的中国古代传统。费博士和他的学生张之毅是精干的社会人类学家，运用了各种有效的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实地观察和最先进的应用统计技术。”“这些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完成的工作是如此的丰富、重要、清晰和高质量，足以挑战美国的乡村社会学家，成为他们的范本。”[31]1990年，《云南三村》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抗日战争时期，费孝通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不但自己深入实际，而且还带领“魁阁”学术团队开展广泛的内地农村、劳工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区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育了艰苦探求的“魁阁”精神和团队互助合作、自由研讨的“魁阁”学风，造就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人才。

三、成功的起点：《江村经济》

1936年9月初，费孝通离开家乡，从上海乘意大利的“白公爵号”邮轮赴英国留学。他在船上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有关资料整理成稿。这样，他到达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准备了两份实地社区研究的资料，一是《花篮瑶社会组织》，一是江村调查报告，但他的老师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看了这两份资料的节略稿后，注意的却是后者，不久也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认可。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他运用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分析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32]，1986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以其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为书名

29 《内地农村》，《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182页

30 参见（美）戴维·阿古什著，单人民译：《费孝通传》，第63、64、69页

31 参见刘豪兴：《〈江村经济〉编后记》，费孝通：《江村经济》，第531、532页

32 该文应出版商的要求，英文版书名改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但扉页里有中文名：《江村经济》，还有中文“费孝通著”4个字。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早期实地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奠定了他社会学大师的基础。江村是他有意识地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江村经济》更是孕育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33]书中提出的以村庄社区为研究对象问题、农村的土地权和人口压力问题、发展和恢复乡村工业问题、解决人民的饥饿和增加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村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农村区域中心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农村的职业分化问题，等等，不仅为费孝通日后社会学、人类学，而且也为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本书是当时世界上仅有几个理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社区研究个案之一，也是中国人用社区研究方法研究本国农村社区的首本著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江村经济》扩大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开创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区的先河，打破了人类学只研究部落、“野蛮人”、落后民族、异民族的传统局面，跨越了“文野之别”。

第二，《江村经济》的作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学者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开辟了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新方向。

第三，《江村经济》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融入社会学调查，在中国实践了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家的主张，从理论到实践创立了本土化的社会学范例。

第四，《江村经济》把功能主义运用中国社区研究，为类型比较建立了参照点。

第五，《江村经济》是作者“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34]，为在中国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六，《江村经济》确立了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改变了过去人类学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

第七，《江村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乡村工业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改革等进行了研究，表明经济学可以突破抽象思维的范畴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中国经济社会学奠基之作。

第八，《江村经济》指出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35]，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和办法，奠定了他日后农村研究的主题。

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书的序言中称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

33 参见《“走出江村”序》，《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40页。
34 《禄村农田》，《江村经济》，第314页。
35 《江村经济》，第211页。

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36]据《费孝通传》的编者阿古什评述，《江村经济》“也为其他西方学者所赞许，人种学名著一览最近一卷称它为‘人类学家对分析伟大民族社区最早、最出名的尝试之一’。还把费孝通的江村与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特罗勃里德安岛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群岛人、雷德菲尔德的于卡坦村、史罗克格洛夫（史禄国）的西伯利亚通古斯族并列”。[37]该书中文版出版后，高校的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将其列为阅读书目，学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费孝通的硕士生导师史禄国却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像《江村经济》这本书，使人了解中国社会的内容不多，它没有借鉴现有大批的作品。用各种文字编写的中国人种学史编目，将比“漫无目的的描写十几个村庄更有用”[38]。然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了什么，而在于跨越了“文野之别”，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文明”社区领域，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农民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一条道路。

为什么西方社会人类学大师会认同这位尚未出茅庐的中国年青人的江村调查呢？因为，当时人类学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从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较高的农民生活。费孝通提供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类型恰与这个人类学的新趋势相谋合，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他刚踏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门槛，就跨越了“文野之别”，有了一个影响世界学术界的成功起点。

解放后，由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费孝通主要从事民族识别研究。1957年，他带领调查组重访江村，面对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的现实，在《重访江村》调查报告中提出在原料出产地的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他觉得这是“有很重大意义的”问题，“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39]。现在回过头检视，人们不难发现费孝通的这个主张是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是正确的富民主张。由于费孝通《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学术成就，1980年和1981年，他相继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林肯黎纪念奖。这都是人类学的最高荣誉。从江村研究超出预期的结果而言，《江村经济》确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36 《江村经济》，第7页
37 参见（美）截维·阿古什著，戴大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第62页
38 参见（美）截维·阿古什著，戴大民译：《费孝通传》，第62-63页
39 《重访江村》，《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57页

四、乡土社会的“通论”研究

费孝通是一位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学者，但他并不满足认识具体的事实，而是把观察与思考结合起来，根据事实进行总结，把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高到理论层面，然后将总结出来的理论开导实地研究。这就是他所说的“通论”研究。

1.研究的两个时期

费孝通将他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偏重于农村社会的具体描述；“第二时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40]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研究在性质上是连贯的，第二期的研究在第一期的基础上进行。

上述《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等是第一时期的工作成果，是对农村实地调查、直接观察、亲身体验的产物。这是认识事物的第一阶段，彼此是个别、是特殊。从个别、特殊达到一般、普遍的规律性认识，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的任务，即为第二时期的研究工作。

从1940年初开始，费孝通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开设“农村社会学”和“生育制度”两门学程，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里开了一门“社会结构”的课程。差不多与开课同步，他在《星期评论》、《今日评论》、《东方杂志》、《当代评论》、《自由评论》、《世纪评论》和《大公报》（天津）等报刊上撰文，持续到1948年初秋，发表乡土社会、城乡发展和历史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近百篇。这些论文广泛地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内地农村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人民饥饿问题的措施，如发展农村工业，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等。根据论文的系列和内容，作者按照文章彼此的内在逻辑联系分组，进行选编、修订，先后出版了《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和张之毅、张华群、袁方合著，1946.5）、《内地的农村》（1946.7）、《生育制度》（1947.9）、《乡土中国》（1948.4）、《乡土重建》（1948.6）以及《皇权与绅权》（和吴晗、袁方等合著，1948.8）等多本论文集。

边讲边写，边写边讲，在讲与写中探索，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形成了费孝通社会学第二期学术研究的突出风格。这些论著不是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前期实地研究在理论上的概括总结，是从具体社会现象里提炼出的通论：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在理论建构上，他认为人们除了从实地研究中获得理论外，也可以从以往人们的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当然，费孝通社会学内的这两个时期是交织在

40 《乡土中国》，上海出版集团，2007年，第81~82页。

一起的，实地研究的结论含有深刻的理论，而通论中又具有丰富的经验内涵。

费孝通的通论围绕中国社会结构这个中心展开，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贡献了许多见解，启示着后人朝前探索。如《皇权与绅权》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结构的分析；《乡土重建》是对中国（城乡）经济结构、政治（基层权力）结构、文化结构、阶层结构、城乡关系等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阐述，并对乡土复员后的未来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等相应的乡土重建方案。不过，在这一时期的通论研究著述中，为学界特别关注的是《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这两本著作是作者运用功能主义学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社会影响深远。

2.《乡土中国》

本书共14篇文章，是作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于《世纪评论》连载完成的。虽然它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层面。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1]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这种特具的体系，也就是特具的社会结构，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将引起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社会制度、权力类别等等的不同。若将中国社会结构剖析透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征、变迁和人们的彼此关系、人际互动与生活方式等等也就易于理解了。

“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孝通从对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比较分析中提炼出来的，与梁漱溟从与西方社会“集团生活”相对照中提出“伦理本位”[42]相类似，是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概念。

费孝通以儒家的人伦观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并做了形象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水的波纹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构成了富于伸缩性的网络。

这个“以己为中心”的理念等同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个人主义吗？他指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

41 《乡土中国》，第4页。

42 费孝通学生时代就读过梁漱溟的著作，受到一贯倡导梁先生的为人、为学，其思想也受梁先生“伦理本位”等思想的影响。梁先生的“伦理本位”思想深刻、丰富，这里不赘述，请参阅梁的《中国文化要义》有关论述。《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57~81页。

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利益；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中心的主义。”[43]

有基于此，他对《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进行反向思考，相应地揭示“自我主义”的“私”的本义：“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44]“可见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家、党、国、天下等任何一圈里，向内看都可以说是公的，并非绝对是“私”的。他进而引申观察西洋社会的外交政策，指出他们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他们把国家看成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自己的国家——本书按），上下双方（其他国家——本书按）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45]这是现代国家（其实是侵略者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为什么？乡土社会是礼治秩序的社会，克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46]

《乡土中国》一书1948年4月出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当年6月到次年1月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但受到社会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和作者政治遭遇的株连，该书在新中国建立后湮没了37年，直到1985年由三联书店重刊。目前，该书在中国大陆已有多种版本，发行数万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90年，社会学家李沛良在《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中指出，“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前，费教授出版过一本论文集《乡土中国》，并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这本书内容广泛，并具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概念洞悉。给人印象最深的创见之一就是‘差序格局’概念。”[47]其后，他还用一项实证研究验证了在现代社会的华人亲属关系网络中存在差序格局。

近几年，学习、评论费老的文章增多，对《乡土中国》现实意义的认识也不断得到认可。如刘志琴指出：“《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礼俗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最简约的提炼。”认为该书是中国乡情、民情、国情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

43《乡土中国》，第27页。
44《乡土中国》，第28页。
45《乡土中国》，第29页。
46《乡土中国》，第29页。
47 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67页。

只要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它就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48]

又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先后发表了马戎的《"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和刘世定的《〈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两文。马文说，"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49]刘文认为，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礼俗秩序"、"教化权力"等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50]

3.《生育制度》

本书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东方杂志》、《当代评论》和《自由论坛》上，从1941年延续到1944年，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修改、补充成书。

"生育制度"的概念指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一套行动规范。作者在《生育制度》中娴熟地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把婚姻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从种族绵续、双系抚育、家庭结构的基本三角形态、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及其扩展等进行多层面、立体的论述，创建了生育制度理论体系。

费孝通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实际出发，借鉴西方马林诺夫斯基、布朗、里弗斯、怀特黑德、洛伊、林顿、希洛科戈洛夫和涂尔干等诸多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文学、生物学诸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结构学、机械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同时，采用了以往实地调查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等研究成果，揭示了生育这一社会自然现象的社会意义，并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不同意马林诺斯基在《野蛮人之性生活》一书里过分强调生物需要的观点，在写作《生育制度》时，跳出了基本（生物）、派生（社会）、整合（精神）三层需要论的文化框架，"根本放弃了把婚姻、抚育、家庭、亲属、宗族等一系列的文化现象看成满足生物需要的文化措施。"他认为人们结合组成了社会，社会要维持其生存、完整，使分工合作体系延续和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个机制我称之为'社会继替'。为了完成社会继替的功能，才产生婚姻、家庭、亲属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总称之为'生育制度'，包括生殖和抚育相联系的两节，维持群体存在的必

48 参见刘志琴：《"乡土中国"的现代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49 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0 参见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要活动。”[51]

《生育制度》是费孝通最感得意的著作，他把这本书视作是他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52]之作。本书不仅发展了人类学、社会学大师的理论，而且把对家庭的微观研究指向了宏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他把人们构建理论的两条道路在《生育制度》中重合了。”[53]本书出版后，以其独特的理论创意，获得社会学界前辈的高度评价。

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此后不时有婚姻家庭方面的文章发表。但潘光旦注意的是问题，用意是寻求一些改革的意见与方案。而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注意的是制度本身，用意是在就种族绵延和制度的完善，其尝试是学术性的。潘光旦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序言，题为《派与汇（代序）》，指出该书“所论的不止是生育，凡属因种族绵续的需要而引申或孝通所称‘派生’出来的一切足以满足此基本需要、卫护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讨论到了。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求的学派的立扬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54]并赞扬说，“本书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不离其功能论的立场，章法井然，一气贯串，则也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在学殖荒落、思想杂遝的今日，也正复有它的贡献，初不因我的期勉的话而有丝毫损色。”[55]

社会学家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等问题上常与费孝通进行论战，但在读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后，撰文评论道：“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平之上的。”[56]吴景超在肯定评价的同时，批评他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即婚姻可满足人的感性生活的需要，从而使许多社会现实难以获得解释。

综合来说，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活动立足中国乡土社会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等是跨越“文野之别”的著作，成就卓著。在这个学术生命的黄金期，他在实地研究中获得了知识，为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等现实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与途径；同时，他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梳理实证研究的资料，探索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育制度，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理论。

51《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414页。
5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492~493页。
53 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第144页。
54 潘光旦：《生育制度·派与汇（代序）》，《乡土中国》，第241页。
55 潘光旦：《生育制度·派与汇（代序）》，《乡土中国》，第243页。
56 吴景超：《婚姻向何处去?》，载《新路》，1948年第1期。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

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110多年的历史中曾中断了近30年。费孝通的人生与学术也随之历经坎坷。他在新时期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组织者和学科发展的学术带头人。

一、为中国社会学的生存而历经坎坷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学及其学人们经受了许多磨难，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就给社会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关注和思考。

1.留下来，为新中国教育改革服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社会学的教授们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大多数选择留下为新中国服务，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都拒绝去台湾。民主教授费孝通也选择留下来，迎接新政权的诞生。1949年1月中旬，他作为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表，应邀赴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商筹备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的会议。他在途中目睹绵延不断的解放军队伍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送粮的车队，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他在《我这一年》一文中激动地写道："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又言，"像我这种没有积极参加过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对于潜伏着深厚的活力是陌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把握，对于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当头棒喝。他满怀信心地说，共产党人"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他亲身感受到了人心所向，释疑了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所在，受到震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57]

57 《我这一年》，《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104-105页。

留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学教授相互慰勉形成学术群体，怀着深情与期待携手进入新中国。典型者如，肢体残疾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在开国大典的当天，拄着拐杖参加游行，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又如，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社区研究的倡导者吴文藻，携夫人谢冰心排除各种干扰，从日本辗转香港回到祖国。他们为执行《共同纲领》，恢复和稳定教学秩序，进行教育改革、维护社会学生存等做出了许多努力。

1949年5月，费孝通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他带头开设“大课”，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课。其他大学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都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又名“新社会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土地经济与农民问题”、“马列哲学选读”、“苏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史”等新设的政治课中承担了主要课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究其原由，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教师，教授社会学的部分教师较接近社会实际和社会理论。费孝通在《我们的大课》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大学里的政治课，普通称为大课，就是教员和学生共同参加，互助相长，来改造自己的教育工作。普通称它作大课，因为这是全校学生,一部分教员以及职员工友一起上的课程。其实这只是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在进行着改造教育的一部分。”[58]他站在新政权立场上,在文章中分析了“大课”的性质、方法，非常用心地回答了师生的种种质疑。

2.向苏联学习，社会学成禁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中断了近30年。在前30年，中国人两次向前苏联学习。第一次向前苏联学习时，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学，撤销了社会学；第二次向前苏联学习时，虽启动了重提社会学的地位与作用，却没能如苏联那样恢复重建社会学。

前一次，潘光旦、费孝通等试图通过局部的院校调整和社会学的教学改革，维护社会学的生存与发展。如1950年3月，费孝通根据清华、燕京、辅仁三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会议的意见，撰写了《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说明社会学的性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的生存阐述理由和提出课程改造方案，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是无法抗衡政府的既定方针的。社会学在大规模的院校调整中被“合法”地取消了。

后一次，中国社会学者从苏联恢复社会学的行动中似乎看到了曙光，纷纷发表文章、举行各种座谈会，献言献策。1957年1月，社会学家吴景超率先在《新建设》“一得之见”专栏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不足千字的文章，呼吁寻找中

58 费孝通：《我们的大课》，《费孝通文集》第6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50页。

国社会学的出路。2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载社会学家李景汉《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的特约“农村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不久，费孝通先后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2月20日）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3月24日）文章。前文呼应吴景超文章，说“这个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他认为“应当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59]并联系人口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诸多实际问题进行了论证。后文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喜忧、愿望和疑虑，为知识分子说了话，为党怎样重视和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文中说，院系调整后三年无用武之地的社会学老前辈李景汉以谁也想不到的行动，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给今年春节献出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60]该文不仅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许和重视。实际行动上，4月下旬至5月中旬他又响应毛泽东“下马看花”的号召，重访江村，在《新观察》相继发表《重访江村》两篇调查报告，希望发展乡村工作，增加农民收入。有虚有实，一浪推一浪，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掀起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气氛突然改变，迅捷地发生了反右运动，费孝通等首当其冲，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批判。他们一系列的积极思想、主张和行动却被轮翻批判，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是“反共反人民的卖国通敌的反动派”，他从事的社会学是“买办社会学”，[61]等等。社会学被列入科学的禁区，参与者被一个个打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社会学被中断近30年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容不得社会学的生存和发展。

费孝通被这种种罪名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有职务均被撤消，只留下个教授职位。“我一生中的一个大变化是发生在1957年，我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迫停止了一切正常的社会活动，我被排除到普通公民的社会之外，成了圈子之外的人物。”[62]1959年4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成为“摘帽右派”。“不过这时我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会出版我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变

59 《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19页。

60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24页。

61 这些用语普遍见于当时主流媒体刊发的批判费孝通的上百篇文章。著作中和有关院校、机构编印的批判资料里，从1957年7月5日延续到1958年11月。

62 《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费孝通文集》第1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得默默无闻了。”[63]

3.文化大革命的心灵创伤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整个中国开始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费孝通突然被当作“牛鬼蛇神”、“人民敌人”，再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校园和“五七”干校强迫从事体力劳动，生活上失去自信，“智力上完全停滞”。从被打成右派分子到文革中的批斗、劳动改造，一位矢志献身于中国社会事业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就这样被政治的沙尘整整湮没了20多年。然而，费孝通最感复杂、深沉、难以捉摸的是昔日无怨无仇的朋友、同事、助手、学生和长辈，甚至众多名望甚高的哲学社会科学家，都在向他万炮齐轰，用毛骨悚然的语言，对他进行莫须有的批判，就连他本人也不得不低头服罪，也去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自己的老朋友。如1957年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历数自己的14项罪行之后说，“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64]短时间内，不仅许多人的脸突然转过去了，他自己的脸也突然转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演这样的角色，但是这些角色不一定和真正的人相一致。真人可以和角色不同。”[65]在是非颠倒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混乱了，思想混乱了，费孝通也变成了另一个费孝通。“千夫所指”，扭曲的心态，看不见的精神压力，这是更令他惶恐和苦痛的所在。他后来在回首前尘时不止一次地说，“我真是混乱了！”[66]“我不自信。我仍然混乱。我茫然。”为什么？他认为，“那是复杂的动机，而不是不诚实。”[67]这混乱本身就是混乱年代的产物。他试图在头脑中毁灭这种种社会奇像，但已在文字中留下了他许多痛心疾首的点滴记忆与思考，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和心路。他在这种种经历中，深深地体验到精神世界的存在是活生生的，其力量有时强大无比。后来，他从这种历史教训中获得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提出了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68]

4.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不堪回首的灾难岁月，费孝通挺了过来。其间，他配合中印划界工作，收集、翻译了有关资料，翻译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和吴文藻、冰心等共同翻译了《世

63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65页。
64 《向人民伏罪——费孝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2版，。
65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82页。
66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69页。
67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79页。
68 详见《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文集》第16卷，第147~174页。

界史》、《世界史纲》，为中国以至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历史教训，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警示。铭记历史，才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为期十年的'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实验'，一次强度极强烈的社会变动。……我的学力还不够做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但是我确实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能体察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69]他曾多次与刘豪兴谈到，希望从社会心理的视角叙述自己的人生旅程，并阅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钟书等人的著作及其传记。可后来，他认为现实课题的研究和学术反思更为重要，有思考但没有时间去写自己的自传了。他对我们希望看到他的自传问题做了这样的解释，说他的著作就是他一生的记录，"想了解我，看我的著作就行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费孝通和许多人一样获得了新生。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发出通知，对错划的章乃器、费孝通等22人予以改正。费孝通恢复了政治名誉，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1982年起，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重新投入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

5.社会学的春天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理应属于全人类。它可以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提供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知识，并在人们的学习、运用中，不断融入本土文化，结合实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一点，在社会学于世界各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在社会学于中国先被肯定、又被否定、再获肯定的历史中也得到了验证。

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但它作用的发挥需要有适合的土壤。如费孝通等对农村社区研究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建议，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受重视的，自然也就无法实施。1957年初夏，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提出发展乡村工业的建议，因与当时主导的方针政策不一致，反而遭到莫须有的批判。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许多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为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是科学的、正确的。同样，陈达、吴景超和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出的人口理论，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证明，社会学工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是可以为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69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85页

的。社会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与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本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对这样的学科采取非辩证的方法，全盘否定，用行政手段进行撤销，甚至设为禁区，是非科学的。其结果不仅严重伤害了社会学者的事业和心灵，而且阻断了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给社会和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损失。

痛定思痛。中国社会学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经历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受制于时代。用非科学反对科学，这样的事不会重演。新的时代已经到来，1979年社会科学的春天，焕发了社会学的美好明天。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倍加珍惜时代赋予的机遇与使命，为之不断地努力。

二、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尽力

费孝通的复出与肩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大任，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学科发展赋予的责任。历史证明，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如前所述，社会学在我国长期被视为反动科学，许多社会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曾因为要求确认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地位而打入社会另册20多年，待到恢复社会学时，有的已蒙冤离世。费孝通认为，现在要人们放弃已经长期改行的专业再来从事屡遭批判的“社会学”，心里终究不那么踏实，没有多少把握，自然心有余悸。因而，1978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出恢复社会学的任务，未能顺利实施。1979年3月中旬，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北京社会学座谈会上明确地指出，过去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播是错误的。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社会学，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70]他受命恢复重建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会上被推举为会长。不久，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71]邓小平的“补课”说，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更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支持。

无可讳言的是，费孝通对恢复重建社会学同样是心有余悸的，但为了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继续他认识社会的目的，他转变了想法，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他谈到自己下这个决心时说：“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像我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

70 参见王康：《中国社会的兴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页。
7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宿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袱，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尽点力。”[72]1980年6月，他的政治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估计自己还有10年的工作生命可以为社会、为人民做事情：他决心要用最后的10年追回失去的20年，不再辜负生命的最后阶段。

“生逢盛世”，“余生有限”。费孝通怀着迫切感，竭尽全力投入工作。20多年来他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贡献甚多，主要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确定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呢？他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1982年5月，他在中国社会学年会的报告中说：就这门学科的内容来说，我们要努力创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学”。[73]1986年4月28日，他在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认为社会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74]近30年来，中国社会学是沿着这个方向健康发展的，在社会各个层面为民富国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社会学为各阶层所认同。

第二，规划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他就高度重视怎么恢复重建的问题。他吸收各方意见，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国社会学建设与发展如同健全的人体生理机能一样，要具备“五脏六腑”。“五脏”指一个学科的建立不可缺少的五个部门，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出版（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等学科组织结构；“六腑”指办社会学系至少要有的六门基本课程，即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社区概论）、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等学科知识结构。[75]他为此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和参与工作，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进程基本是遵循这些规则进行的，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他在晚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文为学界和后辈的研究提出许多前沿性的课题，为社会学的发展留下了遗愿。他针对学界存在将科学与人文对立的观点，明确地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两者是交织的，是可以相融的。他特别指出现有社会学缺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讨，应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呢？“‘精神世界’作为一种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精神

72 《社会调查自白》，《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74页
73 《建立中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297页
74 《同社会学界朋友们的谈话》，《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29页
75 参见《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30-338页

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76]同时他指出，社会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与哲学、神学、精神病学的研究视觉不同，应该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觉。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涉及许多具体课题，如“人”和“自然”、文化与“不朽”、“意会”、“我”和“我”、“心”和“心”等，都是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77]这是他在最后的岁月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提出的学科发展任务，是对社会学发展的寄托，任重而道远。无疑，他的这个认识不仅是他个人亲身感受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多少人身心重负和社会历史教训凝聚的文化结晶，值得高度重视。[78]

第三，培养社会学人才。他在肩负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任务时，痛感任务之艰难，当时的困难中首要的是青黄不接，缺乏这门学科的师资和研究人员。为此，他亲自主持举办两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用速成的办法为高校、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培养了近百名社会学工作者，还在南开大学策划开办了社会学专修班，支持上海、武汉等地举办社会学高级研修班等，这些学员大多有志于社会学，尤如种子一样撒播在全国各地，逐渐成长为社会学重建的首批骨干。他积极推动高校创办社会学系、成立研究机构，由高校进行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系统教育，为社会学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还“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为年轻人破题、开路。他反复强调在社会现实这个大课堂里，他言传身教，不讲门当户对，不计报酬，为所邀的部门、单位做讲演，普及社会学常识；广泛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学人才和实际工作者。与国内培养社会学人才同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教育部门派人出去留学，他们中已有不少人学成归国，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第四，倡导实证学风。费孝通一向重视社会调查，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社会学研究，冲破学院式传统提出“到实地去”口号，90年代中期进而提出“从实求知”方法论，强调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从实际出发去探求知识、获取知识，走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之路。这是

76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77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文集》第16卷，第173页。

78 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学科怎样发展有许多思考，潘乃谷教授做了许多记录和整理，可参见她的《费孝通晚年关于学科发的思考》（载马戎等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62~263页。）和《费孝通先生在世纪初的期盼》（载李开鼎《大师费孝通——读〈费孝通文集〉札记》附录，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第200~256页。）

一种实证学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是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为长期有效地提供观察社会的窗口，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1980年秋天和1981年冬天先后在北京宣武区南河沿居民委员会和开弦弓村建立了社会调查基地。后者与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首期调查由京、津、沪、宁11个单位19名中青年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费孝通等亲临指导。此后他差不多年年回江村访问，了解江村的变化，从比较中增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提出改造社会的建议。复旦大学社会学工作者一开始就组织学生前往进行专题调查或带领学生参观访问，在江村坚持了近30年的追踪观察。到现在已有近10所高校在江村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发挥了社会调查基地观察社会生活窗口和培育人才的作用。

第五，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价值观。费孝通承继中国传统又注重现代，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两条原则作为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79]并倾其一生致力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如他所说，“我的学术研究，从一而终地和全体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80]1980年，他在美国丹佛接受“马林诺斯基应用人类学奖”时，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为题发表演讲，向国际学界坦诚、透彻地阐明了他的学术立场、观点、主张和追求。他认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应用人类学这门学科也是这样。他在解释“从实求知”的含意时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81]

三、从实求知与新探索

费孝通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后，研究领域和考察重点不断拓展，注重提供促进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思维与策略。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他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去考察外，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260余个县、市、区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进行了新的探索，为富民强国奉献了许多心力。

1.重访金秀瑶山。费孝通在新时期的实地研究，依然是从广西大瑶山和江村开始的。他一生都非常关注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1978、1981、1982、1988年，他四度重访金秀瑶山，探讨瑶族地区打破封闭、脱贫致富、走向开放之路。他认为，金秀

79 《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9页。
80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96页。
81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82页。

瑶山的经济发展应走“木材+电力+发展土特产”的思路，这一意见直到今天对大瑶山的经济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还提出，将金秀“瑶族五个支系”改为“瑶族五个集团”，为瑶族自治县行政区域的合理调整提出了合理的建议。30年来，瑶族人民大力发展八角种植等特色经济作物，瑶民由此迅速地富裕起来，金秀县也因此被国家授予“八角之乡”称号。

2.再访江村。江村是费孝通一生实地研究的基地。1957年，费孝通曾重访江村，并对发展乡村工业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却被时代错误地掩埋了。时隔24年，他三访江村故地重游，看到《重访江村》中提出的发展乡村工业主张在家乡开始开花、结果了，江村社队工业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为此他感到无限的欣喜。他与当时贬斥社队（乡镇）企业的潮流不同，不仅是颂扬，而且从刚刚显露的苗头中看到了它的未来，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他都积极地进行总结、扶持、传播。后来，乡镇企业从“草根工业”成长为参天大树，在国家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事实，证明了其预见的正确。此后，至2002年他又先后访问江村23次，发表了《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充分体现了他对农村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深情关切。

3.小城镇研究。费孝通在1936年初访江村时已观察到城镇（集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中心，认识到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但需要对整个地区做更广泛的调查。他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说，“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82]他一直找寻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终于来了。他“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首选了小城镇研究。他带领学术团队，由点到面，从吴江到苏南、江苏全省，影响全国，使长期被忽视的小城镇研究提高到区别西方的中国城镇化道路进行探讨。他先后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和《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等系列文章。他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的独特见解，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为决策部门所采纳。现在，小城镇已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4.边区开发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断登上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费孝通发现我国东西部的差距更为扩大了，令他不安。怎样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经济社会上的差距呢？从1984年开始，他开展了边区开发研究，先后对广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海南、四川、

82 《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425页。

贵州、云南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越穷的地方，他越是执意要去。在20年时间里，他11次进甘肃，7次访问定西，出主意，办实事，亲眼目睹了“陇中苦甲天下”的定西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在边区研究中提出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个问题，并对其重要性进行了多次论证。他提出的“东西合作，互惠互利”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发展设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发大西北的规划是相一致的。他进行的边区开发研究，也就是西部开发，提出的宏观设想和微观建议，对开发大西北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中部崛起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孝通又把富民这枚棋落到中部地区，他要调查研究怎样发展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中部地区历来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地区，它怎样才能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1999年他以河南的中原地区为重点，继而又先后在山东、河北、山西、湖北、安徽、江西等进行了考察，概括总结了我国中部地区“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脱贫致富的好经验。他认为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中部地区，走“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发展路子，就是先在农业里边做文章，发展种、养、加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原始积累，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既是以中国传统经济为根基，又是当前农村工业化的自觉选择。同时，他对京九沿线这个东部到西部梯度形的过渡地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在京九沿路“串糖葫芦”，希望找出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中等城市，加大它的发展力度，以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中部地区发展了，也就为东部的发展建设了更广大的腹地，为西部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6.区域发展研究。区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费孝通走南闯北，东西穿梭，通过调研和思考，提出了超越行政划分的区域发展的设想。如“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长江三角洲开发区”、“泛珠江三角洲开发区”、“东南经济开发区”、“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环渤海开发区”、“东北亚经济开发区”、“京九沿线开发区”等。他认为区域发展研究是比小城镇研究更大的问题，需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人文和地理相结合。“我从农村的微观研究，进入小城镇的比较研究，经过60年的时间，提出了这个更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着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的确是一篇不像我这一生可以亲自写到底的大文章。这篇文章我算是破了题，但怎样做下去还需认真探索，更需要有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83]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建立具有特色和生机的区域发展，以促进国民经济持

83《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21页。

续、稳定、协调发展，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前提出建立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带动全国经济健康发展建议的核心内容，已为中央的重大决策所采纳。

7.三级两跳。费孝通在概括总结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经历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过程时，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的观点，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包含着两大跳跃，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前一跳跃还在进行中，后一跳跃已在起步，在发达地区交错地进行着，呈现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84]这些表明，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已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现实与未来相结合，中国发展与世界前景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2004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志在富民》，是费孝通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辑录了他1981年至2003年从沿海到边区考察的主要报告及其综合分析文章44篇。书中关于小城镇大问题，发展乡村工业，边区开发、区域发展等思想经受了或正在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个黄金时期，他的学术思想已从本土的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延伸到对全球一体的大社会的思考。

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时说："我有一条，就是积极投身到沸腾的社会实际里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追踪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记下人民群众的创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作决策提供参考。"[85]他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总结和宣扬中国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多种致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示例。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著的学术成就，验证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的原则。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武雅士在2005年费孝通追思会上评价说："费教授的研究立足中国却影响了全球。"有鉴于他的学术成就，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给他颁发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给他颁发赫胥黎奖章；1988年联合国授予他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得"霍英东杰出奖"；1999年被授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

四、学术反思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另有一个工作主题，可以用"反思、对话、补课"

84 参见费孝通的《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1993）、《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新形势 新探索》（2000）等文的论述。

85《小城镇研究的新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542页。

来概括。学术反思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通过检视自己走过的人生经历和以往的著作，以及回忆师长的人生和重读他们的著作，以专论、对话和读书札记等形式撰写了一系列富有思想性、理论性的文章，“究其轨迹，颇有所悟”。这些立言也就是文化长河中的社会遗产，弥足珍贵。在他看来，反思、对话、补课是一种社会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文化自觉”一词，是费孝通在追寻现代化的历史长河和世界文化的新趋势过程中萌发出来的。1997年元旦后，他相继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和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理论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他认为，“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我们要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86]他在和学员的对话中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北大参加高级研讨班？我们来搞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需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参见本书第十八章）。他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87]

事实上，费孝通的学术反思早已是文化自觉的有效尝试。他认为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言的，文化自觉则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比较早的一个事例，1988年夏天，他从中国民族现状和历史的思考与探索中，检视自己和民族学界民族研究的成果与问题，一口气写就近30000字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不久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国际学术讲座进行了宣读。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文开拓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新篇章。民族学家林耀华认为“费教授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论证了‘多元一体’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

86 《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45页。
87 参见《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60–161页。

理解全局的钥匙。”[88]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是他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的杰出成果之一（详见本书第七章）。1993年秋天，他在第四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反思》，也是他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改变了他原来的一些片面看法，论证了社会与个人的辨证关系，认为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达到了提高认识的目的。可见，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

费孝通呼吁人们应当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局面。并期盼一个全世界人类能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和平共处的新格局。中华民族文化有其根基，在保根基的同时，不能忘记创新。应当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开创融通“中西古今”之学。从这个社会学角度，费孝通赞赏和肯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而批判了“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赞扬中华文化，不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的，而是认为它的特点对全人类的未来是有益的。费孝通认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批评美国权力格局的霸权主义，是因为费孝通认为“9.11”以后它采取“以暴易暴”，发动侵略他国实施反恐，做以力服人的霸主，是不可取的。他的文化自觉论，短短10年间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等中国学术界诸多学科的广泛共鸣和探讨。如哲学家汤一介认为，“费老是站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上，放眼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提出来这一完整的‘文化自觉’理论，这将对我们研究‘文化问题’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89]

五、“大树”与“富矿”

《乡土先知》（2006）的作者张冠生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该书的封面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学术大师的赞誉与敬仰：“费孝通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世人的心中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实践者，他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用如椽之笔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他的价值在于把学术研究与祖国的富强紧密相连，他的生命、学术和乡土凝聚，铸造了一座人格的丰碑。”人们比喻他的人格是“一棵大树”，赞他的著作是“一座富矿”。

为了佐证这座富矿的蕴函量，我们可以用现代网络搜索工具进行随机调查。2008

88 林耀华：《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页。

89 汤一介：《我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理解》，张荣华等编：《怀念费孝通》，2005年，第69页。

年7月16日，我们用中文网络搜索引擎Google点击“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村工业”、“乡村工业 费孝通”等关键词，进行了一个快速统计调查。现按费孝通提出和应用的概念、费孝通长期采用的概念、费孝通与学界同时代采用的概念三个部分列表于下。

表1 网络搜索有关费孝通提出和应用的概念情况

关键词				词(2)与词(1)之比(倍)
词（1）	条数	词（2）	条数	
乡土中国	905000	乡土中国 费孝通	25800	30.1
差序格局	38100	差序格局 费孝通	25600	1.5
礼俗秩序	459	礼俗秩序 费孝通	217	2.1
生育制度	750000	生育制度 费孝通	36700	20.4
社会继替	2330000	社会继替 费孝通	223000	10.4
☆社区	787000000	社区 费孝通	142000	5542.3
☆乡土工业	787000	乡土工业 费孝通	108000	7.3
☆草根工业	699000	草根工业 费孝通	82700	8.5
小城镇 大问题	2840000	小城镇 大问题 费孝通	214000	13.7
苏南模式	510000	苏南模式 费孝通	233000	2.2
☆温州模式	733000	温州模式 费孝通	10400	70.5
珠江模式	470000	珠江模式 费孝通	5220	90.0
民权模式	318000	民权模式 费孝通	27900	11.4
多元一体格局	1610000	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	19000	84.7
心态关系	14900000	心态关系 费孝通	272000	54.8
文化自觉	1340000	文化自觉 费孝通	316000	4.2
类型比较法	971000	类型比较法 费孝通	433000	2.2
从实求知	10300	从实求知 费孝通	1850	5.6

“☆”注：（1）“社区”一词是费孝通和燕京大学同班同学对英文community的中译名，随着社会学在1979年的恢复重建，特别是民政部门将其引入民政工作，广泛开展社区服务，遂使社区概念普及化，家喻户晓。

（2）“温州模式”一词最早出现在1985年10月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通讯上，次年2月27日至3月6日费孝通访问温州，对温州人走的富民道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不久他在《了望》周刊发表《小商品 大市场》一文，阐述了“温州模式”的性质和意义，从此肯定“温州模式”呼声日高，该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3) 在查阅的文献中，未发现费孝通之前有人用过“乡土工业”、“草根工业”概念。

表2 网络搜索有关费孝通长期采用的概念情况

关键词				词（2）与词（1）之比（倍）
词（1）	条数	词（2）	条数	
农工相辅	82900	农工相辅 费孝通	26700	3.1
农工混合经济	10500	农工混合经济 费孝通	988	10.6
社会制度	5100000	社会制度 费孝通	1430000	3.6
土地制度	1230000	土地制度 费孝通	749000	1.6
社会变迁	1600000	社会变迁 费孝通	46800	34.2
农村问题	1470000	农村问题 费孝通	620000	2.4
土地问题	1260000	土地问题 费孝通	965000	1.3
改革	158000000	改革 费孝通	216000	731.5
经济	482000000	经济 费孝通	1620000	297.5
政治	226000000	政治 费孝通	311000	726.7
文化	522000000	文化 费孝通	2390000	218.4
教育	607000000	教育 费孝通	2280000	215.2
生产	410000000	生产 费孝通	832000	492.8
消费	317000000	消费 费孝通	1160000	273.3
分配	79500000	分配 费孝通	483000	164.6
交易	580000000	交易 费孝通	101000	5742.6
世界市场	7790000	世界市场 费孝通	1300000	6.0
工业	298000000	工业 费孝通	1150000	259.1
西方工业	7770000	西方工业 费孝通	52500	148
中国工业	3760000	中国工业 费孝通	991000	3.8
乡村工业	4510000	乡村工业 费孝通	34300	131.5
中国现代工业	1740000	中国现代工业 费孝通	669000	2.6
农村社区	1520000	农村社区 费孝通	264000	5.8
城市社区	2580000	城市社区 费孝通	424000	6.1
农业	162000000	农业 费孝通	981000	165.1
农民	1010000000	农民 费孝通	824000	122.6
农村	1250000000	农村 费孝通	155000	806.5
村庄	16700000	村庄 费孝通	201000	83.1
地域群体	2350000	地域群体 费孝通	83500	28.1
家庭	3960000000	家庭 费孝通	240000	1650
婚姻	1050000000	婚姻 费孝通	89300	1175.8
妇女	594000000	妇女 费孝通	642000	92.5
区域	1860000000	区域 费孝通	105000	1771.4

☆城镇	43900000	城镇 费孝通	300000	146.3
城市	483000000	城市 费孝通	215000	2246.5
生活方式	22900000	生活方式 费孝通	1410000	16.2
实地调查	1950000	实地调查 费孝通	12000	152.5
社区分析法	865000	社区分析法 费孝通	243000	3.6
功能分析法	1090000	功能分析 费孝通	312000	3.5

“☆”注：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等早期著作中，“城镇”一词常与“市镇”、“城”、“镇”、“集镇”等交叉使用。

表3 网络搜索有关费孝通与学界同时代采用的概念情况

关键词				词（1）与词（2）之比（倍）
词（1）	条数	词（2）	条数	
社队企业	698000	社队企业 费孝通	61200	11.4
乡镇企业	6120000	乡镇企业 费孝通	178000	34.4
小城镇	5120000	小城镇 费孝通	270600	18.9
小城镇建设	247000	小城镇建设 费孝通	25200	9.8
城市社区	2580000	城市社区 费孝通	424000	6.1
区域发展	3110000	区域发展 费孝通	409000	7.6
区域经济发展	247000	区域经济发展 费孝通	42700	5.8
边区开发	221000	边区开发 费孝通	6030	36.7
西部开发	2140000	西部开发 费孝通	24300	88.1
西部大开发	5610000	西部大开发 费孝通	193000	29.1
长江三角洲	2380000	长江三角洲	9190	259.0
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	65800	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 费孝通	26700	2.5
珠江三角洲	3350000	珠江三角洲 费孝通	52000	64.4
珠江三角洲开发区	480000	珠江三角洲开发区 费孝通	32500	14.8
环渤海湾	55600	环渤海湾开发区 费孝通	1670	33.3
环渤海湾开发区	53000	环渤海湾开发区 费孝通	9490	5.6
产业结构	9700000	产业结构 费孝通	36900	262.9
产业结构调整	4280000	产业结构调整 费孝通	21100	202.8
城乡一体化	1740000	城乡一体化 费孝通	28300	61.5
城乡协调发展	1410000	城乡协调发展 费孝通	2190	64.4
外向型经济	1390000	外向型经济 费孝通	3980	34.9
自然生态	2960000	自然生态 费孝通	5240	56.5
社会生态	105000	社会生态 费孝通	53400	2.9
心态研究	907000	心态研究 费孝通	4780	189.7
社会心态	136000	社会心态 费孝通	2800	4.9

人与自然	1060000	人与自然 费孝通	1930000	0.5
精神世界	4520000	精神世界 费孝通	1510000	2.6
多元一体	6750000	多元一体 费孝通	156000	43.3
和而不同	1780000	和而不同 费孝通	139000	12.8
全球化	15200000	全球化 费孝通	36300	418.7

上述所列词、概念（学术术语）共有87个。其中，表1是费孝通提出并为学界、社会认可采用的概念，有18个。表2是费孝通长期采用并逐步为学界、社会广泛使用的，列举了39个，以经济社会分析的概念为主。表3是费孝通与学界、社会差不多同步使用的概念，列举了30个，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事物，新希望。其中在学科反思中采用的概念，如社会生态、人与自然、精神世界、和而不同等，是有待探源的新观点、新理论。总的来说，这87个概念大多是当前社会学界，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采用的重要概念。

将这些概念分别进行单独的网络搜索，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在学界和社会的认知度，以及普及和应用情况。将其分别与费孝通相连进行网络搜索，可以发现这些概念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关联与地位，以及学界研究和阐述费孝通学术思想，或以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解释某种社会现象的情况。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可以看到，（1）从词1的单项数据看，这87个概念的搜索条数普遍较高，超过百万项至千万项及以上的有46个，最多超过亿项以上的有17个，说明这些概念的应用范围较广，已经基本大众化。这些概念中有不少是由费孝通提出和经常使用的，他对社会学界，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可见一斑。（2）从词2的单项数据看，这些概念在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界和大众研究费孝通的思想，或以他的观点解释和分析社会时都用到这些概念。（3）从词2与词1相互比较的数据看，当学界或大众研究社会学涉及到上述87个概念时，引用、搜索或关联到费孝通的比例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的。这从侧面反映出费孝通在社会学学术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当然，上列87个概念并非社会学所独有，其中许多学科也在采用，只是各自从自身学科性质出发进行说明和运用。上述网络搜索的结果是相对的、动态性的。网上的信息每分每秒都在变动，网络搜索的数据只可作为时段一般性的参考。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些单独搜索，及其与费孝通相连搜索的结果，可以看出，费孝通对社会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学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和巨大贡献。我们为中国有费孝通这样的世纪学人而无比自豪！

人们说，随着费孝通驾鹤西去，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由费孝通及其前辈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的航道，将由后人继往开来，让社会学继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三章　家庭研究的理论贡献

费孝通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一代宗师，十分重视家庭研究，为家庭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的家庭社会学思想源自微型社区调查获得的知识积累，如早期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和张之毅合著）等，如后期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人口问题》(1979)、《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2)、《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3)、《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5) 等。但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7月出版的《生育制度》。“生育制度”一词由他提出，并构建了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在该书中阐述的家庭社会学理论，表达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和以“双系抚育”为中心婚姻家庭功能论。在论家庭结构的文章中提出两种家庭模式，是对生育制度有关理论的发展。本章就此进行阐述，从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一、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

人为什么要结婚，社会为什么要有婚姻家庭制度，一直以来人们对此有不同理解和解释，与那些认为婚姻家庭制度源自生理需要（性行为）和心理需求（情感）的理论不同，费孝通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婚姻家庭制度，是为了传宗接代。

1.婚姻家庭是生育制度。

费孝通说：“生育制度——包括求偶、结婚、抚育”[90]，就是人们所说的婚姻家庭。费孝通从制度论出发，将其论述婚姻家庭的著作起名为《生育制度》，是抓住要害，一针见血的。

费孝通阐述了人为什么要结婚，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家庭。他接受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给社会制度下的定义。他说：“社会制度‘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种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团集着的一群人

90)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2页。

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和技术；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设备'。"[91]在他看来，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为满足"生孩子，把孩子领大"的需要，因此在该书中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它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他说："为了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重要，社会上必须预备下这负责抚育的基本团体来完成这任务。每一个社会所容许出生的孩子必须得到有人抚育他的保证。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抚育团体必须先已组成。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92]

2.婚姻的基本意义不是限制两性关系，而是为孩子确定社会性的父母。

费孝通说："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这种说法也许和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时常会使人觉得夫妇关系是两性关系，婚姻是确定两性关系和个人开始性生活的仪式。可是在很多民族中两性关系并不以婚姻始也并不限于夫妇之间，而同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夫妇之外的性生活无论如何自由，并不会引起婚姻关系的混乱。这使我们觉得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因之，我们似乎不应把限制两性关系视作婚姻的基本意义。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到限制还是因为要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因素。"[93]这里深刻阐述了婚姻的本质。按常识，夫妇关系是两性关系，婚姻的确立标志着两性关系的合法化，限制两性关系是婚姻的基本意义，但费孝通用民族学的丰硕调查研究结果（如初夜权，宗教性的神女，成年礼时的性交，借妻，以妻待客，交换妻子以及情人制等，常是人们最乐于谈论的风俗）说明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并没有绝对的联系。他反对关于婚姻家庭的世俗看法，指出树立正确认识婚姻家庭本质在于传宗接代的科学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婚姻家庭的本质时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94]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

91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1页。
92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 29页。
93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 29页。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33页。

费孝通先生不仅从宏观层面上确认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确立一个基本单位来实现“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而且，从微观层面阐述了婚姻是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他把亲子关系区分为生物性的亲子关系和社会性的亲子关系，他说：“我们应当把生物性的亲子关系和社会性的亲子关系，在概念上加以区别。婚姻的目的是在确定社会性的父亲，对于生物性的父亲的确定，倒还属于次要，事实上父与子的生物关系的要求确定本身是一种社会的规定。”[95]这是典型的社会学观点。

3.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

正是因为婚姻与两性关系、与个人的情爱没有绝对的联系，而是为了完成人类的传宗接代而设立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以婚姻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

婚姻在表象上是个人行为，是说婚姻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即便是在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也是如此。今天实行婚姻自由的原则，一个人要不要结婚，和谁结婚，什么时间结婚都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决定的事，他人和社会都不会干预。婚姻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是说婚姻是一种承担重要社会功能的制度，为社会所关注、参与和干涉。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对于婚姻行为的社会性有十分生动的阐述，他说“结婚不是件私事”，“我说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有别人来干预。这样，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无理取闹，或是好事者的瞎忙，而是结合男女成夫妇所必需的手续，因为，让我再说一遍，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并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婚姻行为的社会性，使它被社会的法律、道德、舆论、宗教、习俗所干预，为公众所关注，费孝通先生生动地说：“婚姻在人类生活上既是这样重要，而同时又不常和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倾向相符合，于是社会得立下法律来防止越出、规范行为。单靠法律的制裁犹嫌不足，于是把其他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并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夫妇间一时感情失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致离异。可是这还不能使这种人造的办法根深蒂固，不易摇动，于是进一步，婚姻关系获得了宗教的意义而神圣化了。婚姻有关的法律、社会以及宗教的制裁，在它们功能上说是相同的，都是在维持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抚育作用。”“在西洋，婚姻仪式须在教堂里由牧师来主持，把婚姻视作一种向上帝负责

95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31页
96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33页

的契约。在我们自己，一方有月下老人的暗中牵线，一方有祖宗的监视，一方还有天地鬼神来作证，这样把确立个人关系的婚姻弄成了一件热热闹闹的社会举动，更把这和生物基础十分接近的俗事，转变成了好像和天国相通的神迹。”[97]他结合民间婚姻俗事俗风，用极其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婚姻行为的社会性，生动之至，入化三分。

二、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

和费孝通先生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相关的是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费孝通先生的家庭三角理论包括“两点成一线，三点成一面”的家庭稳定模式理论、“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的家庭关系理论和“世代间的隔膜和继替”家庭结构更新理论。

1.“两点成一线，三点成一面”的家庭稳定模式理论

“两点成一线，三点成一面”原本是几何学上的原理。通过一点的可以有无数条直线，而通过两点的只有一条直线，即两点成一线；通过两点一线的可以有无数个平面，而通过三点的只有一个平面，即两点获得第三点，三点成一面，结构就有了确定性和稳定性。费孝通先生借用了这个几何学理论，阐述了他的家庭结构论观点。

费孝通先生引用了雷蒙德·佛思的话说：“舞台上或银幕上的三角是二男一女（近来也有二女一男）间爱的冲突；可是从人类学者看来，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他说：“二点之间只能划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并不能固定任何一点的地位，两点尽管可以不改变这距离而四处移动。若要固定这两点和其间直线的位置，只须再加一点，划成一个三角。三点之间要能维持三条直线的长度就只有一个三角的形式。两点地位的固定得靠第三点的存在。这是结构学上的原理，在社会团体的形式中也常常看见，两人间的关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98]费孝通先生形象而巧妙地借用了几何学上的三角理论阐述了他的家庭结构思想，既男女结合成夫妻，还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还没有稳定的家庭结构，只有孩子出生，家庭中有了第三点、固定点，才有了稳定结构，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这个家庭结构的思想和理论与他的婚姻本质论是一致的，即婚姻家庭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生育和种族绵续，为此而造就了家庭这样的社会结构，它必然是三点的，而不是两点的，只有三点式结构，才有有效的家庭功能和稳定的家庭结构，符合社会传续的需要。

97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36~37页。
98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 65页。

2. “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的家庭关系理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是同义语。结构也称模式，常常是从关系的总体上说的；关系则比较具体，常常是指两种角色间的互动。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时，不仅从结构上阐明“两点成一线，三点成一面”的道理，而且论述了家庭三角结构中两种主要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说：“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能短缺的。”“从形式逻辑上说，先有夫妇关系，再有亲子关系，换句话说，先结婚产生夫妇关系，再生育，出现亲子关系。而费孝通先生却说，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亲子关系成为夫妇关系前提，夫妇关系只是亲子关系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逻辑，就是说，没有亲子关系的目的和结果（即没有生育），就没有夫妇关系，也没有所谓婚姻，再次从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婚姻家庭的本质。他列举了广西花篮瑶的例子，说那里“夫妇间的共同生活要到生了孩子之后才正式开始，在他们看来结婚到生孩子之间的一段时间是实现夫妇关系的预备。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把结婚的仪式拉得很长，要到孩子满了月才算结束。”“花蓝瑶不但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仪式上，特别强调孩子的出生是夫妇关系完成的条件。”[100]孩子出生后夫妻的婚姻关系才真正确立，夫妇才有了家庭中的地位和名分。

费孝通先生还从现代社会生活角度论述了亲子关系对夫妻关系的调适作用和稳定作用。他说：“恋爱可能促进男女之间的调适作用。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孩子给夫妇间调适作用上的帮助。”他引用了派克教授关于人所生活的世界是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度的观点，指出“两性的享受不带有对于将来的瞻望，各人为了自己的满足不易有个共同的憧憬，这种生活不是三度的，因之各自被习惯所支配，使他们不易和恰。要打破这历史的不同习惯的障碍，必须创造出一个共同向的向未来的投影。孩子不但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将来的展望，而且把这空洞的将来，具体的表示了出来。结婚若是只是指两性的享受，这种关系是不易维持的。可是结婚却开启了另一种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妇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给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使我们对于‘三角形的完成是孩子的出生’这一句话有

99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65-66页
100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66-67页

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了。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101]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番论述，不仅从婚姻的本质上进一步揭示了两种主要的家庭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且给现代那些把婚姻等同于如痴如醉爱情的人一种醒示。婚姻家庭中不仅有爱情，还有生活琐碎事物和生育抚育责任；婚姻家庭中不仅有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没有亲子的支撑，哪有长久的夫妻呢？

3.家庭在“世代间的隔膜和继替”中的结构更新理论

费孝通先生的家庭三角理论，不仅包含着结构稳定的思想，而且还有延伸的结构更新理论。在他看来，在父母的抚育下，家庭中的孩子终究要长大，世代间的隔膜客观存在，亲子间继替必然发生，在原有的家庭三角中会产生和分裂出新的家庭三角，这是人种传递中的新陈代谢规律。

费孝通先生说：家庭“这三角结构是一个暂时的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子方不能安定在这个三角形里，他不能永远成为只和父母联系的一点。他要和另外两点结合成新的三角形。于是原有的三角形也就无法保持它的完整性了。这并不是原有三角形的意外结局，而是构成这三角形的最终目的。三角形的破裂是他功能的完成。这有一些像是蚕茧。蚕茧不论怎样结实，怎样美观，它的目的是给茧内的蛹成长和蜕化成蛾的机会。茧壳的完整注定是暂时性的。若是为了要保持茧壳的完整，只有把蚕蛹烘死在茧内。可是杀蛹完茧又岂是作茧自缚者的本意呢”。[102]这里，他再次从结构学角度重申了他的婚姻家庭本质理论在于传宗接代，如果儿女永远依赖和依恋父母，离不开父母，就意味着他们不能独立完成人种传续的任务，就好比蚕蛹烘死在茧内那样，显然，不是人类设立家庭制度的初衷，只有分裂和更新，人类自身的传递和继替才不会中断。

费孝通先生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要飞的终于飞了”，生动地说明子女长大后，亲子隔膜（代沟）的出现，子代要求离开亲代自立的事实和不可改变的趋势，子女要独立，要成家，从旧有的家庭三角中必然要分裂和衍生出新的家庭三角，形成迄今为止人类自身传递和继替的链条。

三、以“双系抚育”为中心婚姻家庭功能论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生育是家庭的最基本功能。生育既是生理的，更是社会的。在家庭中的“双系抚育”是使孩子获得社会性人格的保证。而以生育抚育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不能不围绕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展开。

101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69页。
102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126页。

1.生育的社会性概念和目标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生育是生孩子，是生物性的行为，但在费孝通先生看来生育是社会性概念，有社会性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抚育和教育似乎更为重要。他说："从概念上，我们可以把生殖和抚育分得很清楚。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他不仅把生育分解成生殖和抚育两个概念，而且在此后的论述中，又增加了教育，即把一个生物之人转变为社会之人的过程，创造了社会性抚育的概念，指出了社会性抚育的目标。他说："……人类的婴儿不但所需的哺乳期特别长，能独立直接利用别种食料来营养的时期特别晚。即在断乳之后，生理上虽则可以说已经长成独立的个体，但是还要一个更长的时期去学习在社会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为方式。这是人类所特具的需要。社会知识的传递对于个人的生活是极关重要的，因为人不能个别地向自然去争取生存，而得在人群里谋生活，一个没有学得这一套行为方式的人，和生理上有欠缺一般，不能得到健全的生活，他也就没有能为人类种族绵续尽力的机会。把这套行为方式传授给孩子们的工作可以称为社会性的抚育。社会性的抚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新的社会分子的培养，以及种族的绵续上，和生理性的抚育有同样的重要。"[103]这里，费孝通先生阐述了生育制度中从生物之人转变为社会之人，即人的社会化过程。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以父母为代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力量，通过对孩子指导基本生活技能，教导社会规范，培养社会角色，指点生活目标等过程，将孩子培养为能在社会生活中独立生活之人，这是生育制度的过程，也是生育制度的本义。

2.双系抚育是孩子获得社会人格的保证

费孝通的家庭功能论是和他的家庭结构论密切相关的。家庭结构之所以是二维的，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结构才有利于家庭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换句话说，只有双系抚育才能使孩子获得完整的社会人格。他认为，抚育作用是家庭的稳定剂，能使男女长期结合成夫妇。这是因为人类抚育作用有两个特征，一是孩子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教育的过程相当的长。人从小到大的自立能力，自理能力，和他人交往与合作能力，适应和融入社会生活能力等都需要长期教育和培养。费孝通先生曾经举例生动地形容了父母引导子女的反复性、重复性："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一个早期大受父母干预的次数比一个成年人一辈子受他人干预的次数都要多。儿女最初的成长和社会化几乎都是在父母反复的指导和帮助下才完成的。他还阐述了家庭中双系抚育的重要性。他说："在人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分子所需的资格很多，一个孩子要获得这些

103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8页

资格非得有长期的学习不成。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里，生活上所需的知识，技术，做人的态度，在家庭里都可以学得到。反过来说，至少得有一个家庭才能得到这些资格。少于一个家庭的，不但日常生活不易维持，而且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一样得不到完全的教育。全盘的生活教育只能得之于包含全盘生活的社会单位。这单位在简单的社会里是一男一女的合作团体。因之，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一男单独负担，有了个母亲还得有个父亲。”[104]只有双系抚育才能使孩子获得完整的社会人格，这是极其深邃和发人深省的。

3.以抚育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费孝通在阐述夫妻关系时认为在家庭中夫妻之间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情感，二是家务，其轻重顺序依环境而定。他把这两件事情比做“鱼”与“熊掌”，理想的夫妇是“鱼”与“熊掌”两得其全，但这个理想常常不易实现，因此不能不退而求其次，择一而足了。他说：“依我以上所说婚姻的主要意义是在确立向孩子的抚育的责任。抚育本身是一件相当繁重的事务，基本上是柴米油盐的经济工作。夫妇间先得把这些基本事务打发开了，才有讲求兴趣相投的资格。换一句话说，若是一个社会生产技术很简单，生活程度很低，男女在经济上所费的劳力和时间若需要很多的话，这种社会里时常是走上偏重夫妇间事务上的合作，而压低夫妇间感情上的满足，再换一句话说，夫妇之间可以偏重感情生活的发挥，必须在一个生活程度较高的社会，其中具有各种设施可以减轻他们抚育的责任以及经济上的劳作。我们比较中国传统的夫妇生活和现代西洋都市里的夫妇生活就可以明白上面所说的话了。”[105]他从以抚育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出发，论述了先“家务”（以柴米油盐为中心的物质生活），后情感（爱的追求与调适的精神生活）的家庭追求顺序，是唯物的，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并带有普遍性的。在以抚育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中，排在首位的是家务的柴米油盐的工作，然后才是满足情感的需要。换句话说，在一个生活程度较低的社会里，主要是家务和柴米油盐，而到了生活程度较高的温饱和小康社会，才有普遍的情感需求。

无论如何，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阐述的家庭社会学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以上我们从婚姻家庭本质论、家庭结构论和家庭功能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概括，还远远不能尽含他的思想。他用生动、精练、准确和深刻的中华民族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不仅对研究传统的中国家庭，而且对思考当今的中国家庭问题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104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26页。
105 费孝通：《生育制度》，第52~53页。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两种家庭模式

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家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费孝通长期观察中国家庭的演变，分析和比较中外家庭的异同，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家庭模式，即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中国的“反馈模式”。

1.两种家庭模式的公式与内涵

公式有几个符号先予说明：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

“接力模式”的公式是F1→F2→F3→Fn；表示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反馈模式”的公式是F1⇌F2⇌F3⇌Fn，表示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的模式，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106]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在子女成年前，父母有权利有责任抚育他们、管教他们。最显著的不同是当孩子到了成人年龄，子女成了社会的一员，有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前者父母对子女的抚育责任完成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但其子女对父母在感情上和在经济的资助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而后者父母对子女还有许多如成家立业等等继续尽责的义务，在传统伦理和法律上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两种家庭模式各有其存在的条件，各有长短，在解决幼年和老年不能自养的问题上，都贯彻均衡互惠的原则。“接力模式是乙代取之甲代，而还给丙代，取予之间是均衡的。反馈模式是乙代先取之甲代，然后及身还给甲代，取予之间也是均衡的。”[107]也都会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彼此也会学习借鉴对方的积极元素完善自己。

2.三个连续的时期

费孝通从个人的人生历程进一步分析，将“接力模式”分出三个连续的时期：第一期是被抚育期，他和父母构成一个生活单位，第二期是抚育子女期，他和子女构成一个生活单位，最后就留着一段空白期，由夫妇构成一个生活单位，即所谓“空巢”期。同样，中国的“反馈模式”也可分出三个连续的时期：第一期是被抚育期，第二期是抚育子女期，第三期是赡养父母期。[108]由此可见，亲子关系的反馈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套传统伦理维系着这种模式，如“多福、多寿、多男”的祝词，上一代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训，下一代以“光宗耀祖”为奋斗目标，“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是反馈模式的基础，其意义在于取

106 参见《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40页

107 参见《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42页

108 参见《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40页

予达到均衡，为解决抚育幼儿和赡养老人提供了保障，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撑。

两种家庭模式是费孝通在新时期家庭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对生育制度社会绵续和社会继替理论的发展，值得进一步学习和探讨。

五、现代婚姻家庭建设的科学发展观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带来了婚姻家庭领域的巨大变化，进步和问题相伴而生。认真研读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理论，建立现代婚姻家庭建设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正确认识今天婚姻家庭的变化和问题，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建立现代婚姻家庭建设的科学发展观包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存在的基本根据，保证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维护家庭结构的完整和相对稳定。

1.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存在的基本根据

费孝通先生的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不仅适合于传统社会，而且适用于现代社会。它是今天婚姻家庭仍然存在，而且还要绵延很长历史时期的理论根据。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先生所说的，“在绝大多数部落社会，亲属关系模式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小部分。不过，家庭在这种社会中也仍处于关键的地位，特别是将个人与其他社会结构如教会、国家或经济机构联系起来。假如没有这个看来原始的社会结构所作出的贡献，现代社会就会崩溃，这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它有复杂而先进的技术和训练有素的科层组织”。[109]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初的社会关系、基本的社会群体和普遍的社会制度仍然保持它存在和发展的最初根据。今天，社会之所以还有婚姻制度，还要设立家庭，是因为它仍然还需要一个基本单位来完成以生育、抚育、教育为中心的人类种族传递，即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设想，只有未来果真有了新的办法来代替现在的人种传递链条时，婚姻的存在才没有必要，家庭也才会崩溃。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遗传技术和工程得到了很大发展，诸如人工蛋白的合成、克隆技术的出现等，有人据此推断了未来人造生命、造人的前景和可能。从简单的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是从科学发展观角度可予以置疑。20世纪人类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挑战大自然，违背自然规律，诸如污染环境、乱砍乱伐、过度

109 古德著，魏章玲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4页。

采掘资源、盲目崇拜增长等，结果受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它使人们不得不乖乖回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按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上来。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教训。人类自身繁衍的规律是大自然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天体造人，有男有女，男女交合，父精母血，产生新的生命，这是不能违背、不能随意改变的自然规律。人降生到世界上，还只是生物之人，而非社会之人，子体需要母体的较长时间的呵护、不仅要养，还要教，才能从生物之人转变成为社会之人，这是社会规律。如果人们一定要改变这些规律，必将受到报复和更严厉的惩罚。传统中国有句谚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讲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社会中大多数人到一定的年龄都结婚成家、生儿育女，重复自己的父母长辈做过的事情，但却很少有人思考过人类为什么要有婚姻制度，要设立家庭。今天从科学角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婚姻家庭制度和它存在的客观根据，建立起全社会的婚姻家庭科学发展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2.保证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

今天，包括中国这样的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婚姻家庭都有了很大改变。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活程度较高的社会"（普遍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家庭进入了小康），可以撇开"柴米油盐"问题，追求"感情上的满足"，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现象，诸如：独身主义、丁克家庭、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插足、闪婚、短婚、一夜情、同性恋等等。对这些现象人们褒贬不一，但应该有科学的价值判断，因为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现存的婚姻制度，改变了家庭秩序，影响了家庭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

其实，今天中国婚姻家庭领域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在发达国家都曾经出现过，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包括那些发达国家）对此都很关注，都不希望现有的婚姻家庭制度从根本上被摧毁，原因很简单，现在人类还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机制来解决人类自身传递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从私生子角度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担心，他说："社会对生私生子看得比婚前性行为还要严重，即使后者也被看作是不合适的。任何社会对于谁同谁结婚都是有所控制的。也有一些规定用来反对随心所欲的生育态度。换句话说，社会对婚姻所采取的控制主要不是由于担心人们的性行为，而是由于担心人们生孩子。"[110]这些议论和费孝通的看法是异曲同工的。不仅学者如此，政府也是如此。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曾经聘请了当时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哈利文为白宫家庭问题顾问，要求她帮助研究和重建美国支离破碎的家庭。卡特总统还亲自对在白宫的工作人员讲话说：你们尽管工作很忙，但

110 古德著，魏章玲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48页

回家要规规矩矩地作好丈夫和妻子，不要做现在流行的那种未婚同居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从传统的家本位向人本位转变，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伸张，集体观念淡化，幸福享乐思想流行。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既要尊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婚姻家庭的选择，也要宣传婚姻家庭的科学理念，还要用法律、道德伦理、大众传媒和风俗习俗等多种社会手段维护它的正常秩序，引导人们自觉履行婚姻家庭义务，夫妻和睦相处，教育好子女，赡养好老人，以保证家庭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

3.维护家庭结构的相对完整和相对稳定

要保证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维护家庭结构的相对完整和相对稳定。从社会学结构功能论的角度上说，功能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如费孝通所论述的家庭之所以是三角型结构，是由家庭的生育抚育功能决定的，而家庭三角结构的完整又是家庭功能有效发挥的保证。费孝通用双系抚育观点从人类代际传承的深层次阐述了维护家庭结构的完整和相对稳定对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的重要性。这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与家庭建设有实际指导意义。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一个离婚率显著增加的事实与挑战，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使社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包括离婚自由在内的婚姻自由原则，保护个人的婚姻家庭权力；另一方面，显然不希望家庭的普遍解体和大规模动荡，因为它将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威胁社会的未来。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还是要维护家庭结构完整和相对稳定，不希望离婚率过高。

1933年，费孝通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65年后，他以《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为题更直接言明家庭的地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111]他在2000余字的杂谈中概要地叙述了自己从具体到抽象创立生育制度的经过、方法和意义，对学习《生育制度》一书很有帮助。他在文中最后说，“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关注‘家庭’问题，培育出健康的‘社会细胞’，使我们的肌体更结实、更完美。”[112]这是对我们后辈的期待，我们当为之努力。

111 《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250页。
112 《我从家庭入手认识社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253页。

第四章　从实求知的社会研究方法

“从实求知”，既是费孝通实地调查（field work）的升华，学术实践的总结，又是他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不唯书、不唯洋，也不唯师、不唯派，他接受了功能主义的积极内涵，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工具，并在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创新，形成了他的具体社会研究方法。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融合在《伦市寄言》（1936~1937）、《亦谈社会调查》（1947）、《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1981）、《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1982）、《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1982）、《怎样找问题》（1983）、《社会调查自白》（1985）、《关于学风和田野工作》（1995）等著作，及诸多著述之中[113]，内容丰富，很有特点。

一、走向社会，实地调查

1993年9月，费孝通在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时发表演讲，总结了自己治学的经验，他说：“我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认识中国社会，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趋势。”又说，“我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材料，进行分析取得理解，进而按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114]这种开创性的治学之道，是他用毕生事业换取的，反映了社会学植根中国的成长历程。

1.走到实地去，躬身实践

产生于欧洲的社会学传入中国后，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一些大学先后兴办了社会学系，留学欧美、日本等国学习社会学的一批青年学者陆续回国任教，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力量。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学基本上还是

11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社会调查自白——怎样搞社会研究》一书，选编了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论著，共46篇。本章写作参照了刘豪兴的《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一文，载乌戈等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82-501页。

114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35-36页。

作为西方学科的一门知识在传授，他们照搬照抄照讲美国社会学的东西更为突出。1937年，曾留学美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瞿同祖指出："美国色彩甚重，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115]社会学教授在课堂上、文章里可以滔滔不绝的引用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更谈不上引导学生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深入实际体察国情民意，致使学生学习社会学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要领。费孝通认为，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式"的社会学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的贡献，社会学的肤浅和空虚，早已注定要受社会怀疑的命运，甚至学术界的信用，连喘息在大学课程里的机会也发生了问题。因而有的大学取消了社会学系，有更多的大学减少了社会学课程。[116]学社会学的学生陷入了苦闷。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二是缺乏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观念和方法，话愈多而视听愈乱。因此，当193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派克应邀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集体行为"和"社会研究方法"两门课，指导学生运用人类学方法深入实际考查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最底层的社会阶层时，无异给学生开启了观察社会的途径，深受学生的欢迎。如久旱逢甘露，费孝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回忆道："派克不仅在班上讲解人类集体行为的性质和社区结构，而且特别引起我们这些学生兴趣的是他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北京各种类别的居民区。把我们带出了风光明媚的未名湖的世外桃源，看到了天桥的贫民窟，甚至八大胡同的红灯区，这真正打开了我们这些象牙塔中的小青年的眼界。世界上原来有和自己生活区别如此之甚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和思想类型，真是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我们这辈学生真心感激他，把我们带出了书本，进入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117]他和同学廖泰初等从派克的带教中学到了怎样了解社会，怎样认识社会的初步知识，大声疾呼，要研究社会的人走到实地研究的路上去，开展社区研究。[118]

社会是客观存在，各种社会现象有不同的层面，关系纷呈复杂，人们只有亲临其间，进行实地的亲身体验、直接观察、与实践者交朋友、平等交谈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1933年夏，费孝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考进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攻读硕士。这年，他利用假期前往山东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访问，实地考察了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亲身体验了兴起多年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这之前，他曾多次去江村访问，对姐姐在农村进行养蚕和兴办乡村工业的实验事业有所了

115 瞿同祖著：《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116 参见《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92页。
117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8页。
118 参见《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92页。

解和感悟。不久，如第一章所述他代姐姐费达生撰写了《我们在乡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两文，前文将费达生在开弦弓村推广科学养蚕、创办乡村工业的实践纳入乡村建设事业进行分析，后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作为进行了评论，特别对“以为‘中国问题’是一个乡村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批评“乡村运动”忽视都市作用的趋向，[119]提出了城乡相辅相成的观点。1935年，他获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硕士学位，并考取庚子赔款英国留学。他遵从导师史禄国的要求，在老师吴文藻的支持下，出国前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调查研究。这是他们有计划走向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的首次尝试。他希望通过这种实地调查，“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120]

费孝通选择研究社会学道路之后，从不动摇。广西大瑶山民族调查一死一伤，打击无异万分巨大，但他以一个人承担两个人未竟事业的毅力挺了过来。他对“到实地去”治学之道不因此而退缩，在多篇文章和书信中一再鼓励朋友在实地调查这条道路上朝前走。[121]悲痛之余，他说，“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122]

1937年5月，他为纪念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专栏复刊一周年，从英国伦敦寄回《复刊周年通讯》专文，也表达了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坚定信念。他写道：“我们念社会学的人没有懊悔走上这条路，我们不要改行，我们深信这门学问有它时代的需要，而且值得我们贡献我们的血汗。”[123] 1938年秋天，他校对完Peasant Life in China清样后辗转回国，到达抗战的后方昆明，仅仅休息安顿两个星期就扎进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他有一股劲和坚毅不移的意志，在同辈人中是一位自然领袖，因而社会学社的朋友在《送行》中诙谐地说，他是“一只陷阱压不死的活老虎，到处给人奇特和惊奇的能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还有那看不见的能量，朋友都敬重他”又明确地说：“他的继续不断的努力成了同人兴趣的中心。”他的这种人格和精神由此而延续一生。1978年，国家需要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时，他虽然曾经身受其害，心有余悸，但是当任务落到他头上，他还是挑起了这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担，一方面，

119 参见《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11页
120 《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477页
121 参见《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92—421页
122 《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480页
123 《复刊周年通讯》，《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537页

他组织动员老一代社会学家出谋划策，积极参与，共同培养社会学人才，另一方面，他率先垂范，脚踏实地，躬身实践，带领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学习社会学基础知识，积极地投入到变动中的社会实践中去调查，总结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求得对社会的真实认识。

2.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

费孝通在《禄村农田》的导言和《乡土中国》的后记把社区研究称社会学调查和社区分析，以区别当时流行的社会调查。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他解释说："社会调查者记录所观察的事实之外别无其他责任，而社区研究者则还要用理论来解释所见的现象。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124]费孝通在江村近两个月的调查中体会到，实地是"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125]他一贯主张实地调查，反对脱离实际的抄袭、空谈。"实地的，是和凭空的捏造的、抄袭的、不足考实的、雇用'劳工'间接搜集的相反，对于本国的是和对于外国的相反。最后一项是暂时的矫正……我们要外国材料，不过是做比较之用，着重还是'自己'。"[126]他运用实地调查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获得的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写出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一批著作。后来他重获学术生命，坚持的仍然是实地调查，也"就是从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去理解他们怎样适应和利用具体的客观条件，通过人际关系，依靠上辈传下的知识和自身创造的办法，取得生活上的需要和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从而形成的一套物质设施和社会结构相互结合的体系；并在时间中观察其社会经济上的变动，从其效果上辨别出是发展还是倒退。"[127]他紧紧追随我们民族在本世纪内的现代化过程，一边调查，一边记录，认识，思考，从实求知。他在这20多年中继续采取这个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办实事"，帮助各族人民脱贫致富。他社区研究的论著理论与实际紧密相结合，主要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客观情况的概括，对老百姓实践经验和创造的总结。因而，他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草根工业"、"庭院经济"、"边区开发"、"区域发展"、"人文生态失调"等概念、理论、观点，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总是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在1985年为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写的"序"所说的："更值得推荐的是他治学的方法。他彻底抛弃锁在书斋里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到现场去到实践里去

124 "《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163页。
125 《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3~44页。
《江村通讯》，《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91页。
126 《伦市寄言》，《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401页。
127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89页。

调查，坚持把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探讨。几年来不辞辛苦，五下江苏，悉心考察大江南北一处又一处的小城镇。着力掌握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生活中捕捉新鲜的信息，追溯历史，预测未来，给社会学这门科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也为国家解决当前迫切的建设课题提供科学基础。研究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其中如费老和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们所用的方法，应算作一种比较实在的科学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方法。”[128]

3.认识中国社会，首先要认识农村、认识农民

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是从农村开始，并一直以认识农村社会为他社区研究的主体的。他认为认识农村社会，弄清中国农村社会有哪些基本特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一条入手的门径。他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补充论证说：“农村研究实在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工作，只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住在农村里这一事实就足够作为这句话的根据了，而且还可以说即是那小部分不住在农村里的人，他们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部分还是等同于农民或是从农民的型式中发展起来的。”[129]过去的中国实质上是个农民社会，现在依然没有根本转变。除非80%在小农经营中的农民改变他们的职业，并离开在土地上劳作的老路，农民不再是农民了，否则，中国将继续颠簸难行。农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认识中国社会。他在《社会调查自白》中说：“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130]他一生要写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两篇文章，其实也就是在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章，是通过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变化，探求农村社会发展大势与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案。

4.认识的立场是尊重群众的创造

历史在变化，时代在进步，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我们只能创造条件去推进客观事物向高一级演变，来消除矛盾。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必须紧跟上实践的步伐，去深刻地认识它。认识的立场应当尊重群众的创造；认识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实事求是地作分析，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问题，不可能在原有的本本上找到现存的答案。”[131]费孝通这样说，也这样去追求、实践

5.行行重行行，学术研究的遗愿

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费孝通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除了西藏和台湾

128 杜润生：《小城镇四记·序》，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

129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2页

130 《社会调查自白》，《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2页

131 《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70页

没有去考察外，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260余个县、市、区都留下了他的行行脚印。在现实生活中，他倾听实践者的心声，总结和传播干部群众的实践创造，探寻未来。同时，不断地为学界后辈的研究创造条件，开路和破题。2003年开春后，93岁高龄的他就到苏南进行考察了，“非典”过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计划下半年的考察活动。8月下旬，他先到黑龙江大庆考察，接着转向西北第十一次访问甘肃、第七次访问甘肃定西；9月，他南下到广东考察，热情高涨，希望对“9+2（“9”指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四川、湖南、云南、贵州九个省（区）。“2”指香港和澳门特区）“泛珠三角”继续进行探索。他企盼着我国的“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能尽快地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两个翅膀，使国家富强起来，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之上。[132]这是费孝通生前行行重行行，进行实地考察的最后一站。他回到北京后不久，身体不适，有多个计划安排的活动，都未能参加。2004年12月28日，他住进了医院，直到与世长辞。“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的社会学研究，无疑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最后遗愿。

二、功能主义方法论

如第一章所及，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个流派，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费孝通接受了功能主义的积极内涵，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工具，自如地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创新，使之更适合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规律。

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学习了人类学有关课程，阅读了马林诺斯基等学者的著作，撰文介绍人类学功能学派等四大流派和马林诺斯基的著作《野蛮人之性生活》，已经对功能主义有所了解和认识。他在清华大学专攻人类学，导师史禄国的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并运用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撰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 一书。他认为，“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从我对体质类型研究——从体质人类学自然出现的方向。我随后把它应用于人类文化类型。因此我要说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30年代早期已经形成。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133]他在英国留学过程中，亲身体验导师马林诺斯基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掌握了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同时也学习和吸取了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观点，使自己的功能理论和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但他没有照搬照抄老师们的东西。他是怎样理解功能和功能主义的呢？他在社会研究的实践中是怎样创造性地运用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呢？他的功能主义方法论与

132 参见《我的思路框架》，《费孝通文集》第16卷，第196页。
133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50页。

他的前辈们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人—社会—文化连续体是一个整体。他从整体和系统出发，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的每个部分各有各的功能，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的组成部分是各个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如生育制度是对求偶、结婚、抚育和性生活等人类活动及其需要的一套规定。整体观（Holistic View或Holistic Approach）认为任何地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都是有整体（整个）性的，强调在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时，必须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体系进行分析，探讨各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获得对该现象的全貌认识。如费孝通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农村及其发展趋势，“更上一层楼”，研究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小城镇。费孝通的整体观不局限于如村落社区等微观层面，而是从“全国一盘棋”视角，广泛地运用于区域经济开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宏观层面的描述和分析。

其次，功能是一种关系。马林诺斯基的功能（function）认为文化是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所以都是有用的手段。功能就是满足需要的能力，是有用之意。费孝通接受功能是有用的观点，但他认为所谓功能是指一个系统的整体之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功能关系是指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和各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例如，他在描述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关系时，把两者比喻为母子关系，农业是母亲，农村工业是农业的儿子。农业发展支持了工业，农村工业的壮大“反哺”农业，为使农业现代化，我们必须依靠农村工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也是这样。他在分析草根工业的发展进程时说，在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变着农村的面貌。但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最终还得去适应自己创造的工业的发展，并转变角色。同样，我国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在“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理念指导下，城市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支援农村发展工业，使乡镇企业得以“异军突起”，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第三，整体是有层次的。他认为一切概念上的整体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任何整体都是一个经常在变化中的系统。例如，他认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乡镇是个整体，一个省、全国乃至全世界也是个整体。不同层面的整体彼此互动，互相联系，构成更大的一个整体——“全国一盘棋”。有不同经济区域布局，全国是一个整体，各个社区或经济区域也是一个个的整体。不同层次的整体地位不同，各具个性，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诚如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1980年3月在主持授予费孝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仪式上所说，费孝通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模式，即怎样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辛

格尔顿评价说，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34]

第四，历史和科学的一致性。他的功能观点与马林诺斯基有所不同，马林诺斯基受马赫“需要本位”哲学的影响，着重文化的生物基础，把一切文化和人的基本需要相联系。费孝通不愿过分强调个体的基本需要，认为社会是与生物有本质区别的实体，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联合。在社会里人与人的结合，建立了新的整体，功能更大，也即一加一大于二。马林诺斯基强调科学精神，但却把它与进化论的历史观相对立，在实地研究中拒绝进行历史的思维方式。费孝通认为历史和科学是可以相一致的，在实地研究中常常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用以解释现实发展的缘由。他对农村工业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地位的分析，密切联系了农村传统的手工业，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令人信服。他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区域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研究，更是纵横中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分析的。马林诺斯基实地研究的志趣是异域人的生活和文化，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志趣是本国的乡村，因而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关系的融合程度，以及调查者对被调查者所持的态度，二人是不同的。

第五，社会与个人的辨证关系。他在《个人·群体·社会》论文中反思自己过去在《生育制度》中强调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认识，把社会而不是把个人的需要看作起点。他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社会，他就得牺牲自己一定程度的需要，以便他能在社会里生活。个人必须依靠社会完整而存在。例如，他认为婚姻不是当事人间个人私事，而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为了社会的继替和完整，才有婚姻，才有性行为的禁忌。[135]他接受了潘光旦的批评，把生物人和社会人结合起来，回到人是本位，文化是手段，建立了人文世界的观点。个人固然跳不出社会的掌控，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136]

第六，调整社会系统的运行。他认为在任何系统中都有潜在的矛盾，但它们总是以某种方式被调整使系统继续运行。例如，在边区以前农民侵占牧人的土地，结果引发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实行“退耕还牧”，农民为牧民种饲料，农业可以为牲畜服务，矛盾也可以消除。社会在继续运行重新组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局面，使社会产生倒退；也可能是建设性的改革，使社会前进。前者如“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者如改革开放的推行。改革可以和稳定结合，中国当前注意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可以促进稳定。

第七，垂直的人际关系。他认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是一种平面的人际关

134 参见辛格尔顿：《应用人类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1页。
135 参见《生育制度》，《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0页。
136 《个人·群体·社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85页。

系，但他在现实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代际关系及其延扩，其整合观念是垂直的，应把这个概念转成垂直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责任。这是一种代际的整合。中国人在交往中常常以兄弟相称，不经意间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聚合力增强了。虽然其利弊并存，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在生活中流传着。因而中国的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是这一观点的概括。

费孝通对功能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远不止这些。他对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认同的，但他不唯书、不唯洋，也不唯师、不唯派，而是不断完善、发展新的观点和方法。他把它作为方法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到现实，运用自如。他从不回避自己的学术价值取向，“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他对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描述分析十分生动、深刻，很有创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的这种功能主义方法论，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有许多有益的启迪。

三、“逐步”、“接近”认识中国社会的具体研究方法

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呢?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而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生命有限，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怎样才能认识中国社会呢?或者如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E·利奇所诘问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呢?费孝通深知通过有限的研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是艰难的，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步”、“接近”对中国的认识。

纵观七十年来，费孝通为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他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十个方面：

第一，理论指导。社会学调查或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自觉地、有针对地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建立假设，用实证资料进行检验，进而提出新的理论。费孝通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在广西大瑶山和江村调查时，认为实地调查者只要事实不需要理论，尤如照相机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因而埋没了许多有意义的发现，或缺少主线的表达。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认真地总结了这两次实地调查的经验教训，诚恳地接受黄迪（兆临）学友的批评，认识到“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江村经济可以说是我个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137]他从英国回国后的禄村调查，开始注重理论的指导，

137 《禄村农田》，《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224-225页

以现代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变迁为主题，并将这个主题限于土地制度变迁。在《禄村农田》一书中，采取解释和叙事并重，以理论为经，事实为纬，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较之《江村经济》有了更大的提升。他主持的“魁阁”学术团队，同样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说，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黄金期。他深有体会地说：“……理论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由已有的理论发生许多联想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去考察事实，目的是在我们所持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些事实，若是不能的话就在实地观察中去寻求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以前我们所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忽略了把我们研究经过描写出来，并说明我们带了什么理论下乡怎样修改和怎样充实我们的理论。”[138]他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进行江村再调查，以更大规模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边区开发和区域发展等研究，在整体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现实与未来相结合，中国发展与全球化相结合，相继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学术成就，令世人瞩目。

等二，建立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合作关系。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应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在实地调查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呢？费孝通在谈及社会调查时认为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应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正常与否关系到社会调查的成败，是社会调查进程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他从自身的调查经验认识到，仅有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调查者和被调查者而大家共同讨论分析问题。这样才能避免“骗取口供”之类的调查技术，使理论和事实融合在一起。怎样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呢？费孝通认为，一是社会研究必须是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实践者和创造者，不要把调查获得的知识变成“纸上苍生”。[139]费孝通志在富民，他的各项农村研究都是为了农民怎样走上致富道路，因而农民信任他，乐于和他谈问题，反映自己生产和生活的境况，道出自身的实践经验和要求。“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农民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能相信你。”[140]在我们国家，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利益应是一致的，这是建立两者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二是态度上尊重对方，“执疑待决”。“研究者是在别人的叙述中去知道自己没有直接观察机会的现象，所以他是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这种态度必然会引起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141]他从这种真诚合作中获得了真实可

138 “《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164页。
139 参见《社会研究能有用么》，《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67页。
140 《亦谈社会调查》，《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23页。
141 《亦谈社会调查》，《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23页。

靠的第一手资料，使他的调查客观、准确，更有科学性。费孝通建立的这种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尤如鱼水关系，调查者不但能得到被调查者的真诚帮助，而且身心愉愉，不会产生马林诺斯基实地调查中那种对土著人（被调查者）的愤恨和不满。[142]

第三，从微型社区研究入手。微型社区研究的调查区域以多大的规模为宜呢？A·拉德克利夫·布朗、吴文藻和R·弗思讨论了这个基本问题，一致认为，这种研究的最初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调查单位最为合适。费孝通赞同这些老师的意见，认为村庄是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把它作为微型社区研究的调查单位是切合实际的。它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便于调查者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微型的含义是什么呢？费孝通说，“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进行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进行解剖，以了解其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认识其特点及与其他麻雀不同的缘由。什么是微型研究呢？“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143]费孝通的学术研究是从江村这个微型社区研究入手的，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叙述了江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状况。但他的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144]江村调查是他整个学术旅程的开端，[145]日后，他和张之毅选取了禄村、易村、玉村等微型农村社区进行研究，近二十年来，他对小城镇和边区的村庄、乡镇进行了更多的实地调查。如小城镇研究是从江苏吴江的七大镇开始扩展到苏南、苏中和苏北，然后逐步扩大研究范围，从一省到几省以及全国。但相对于中国数万个村庄、乡镇来说，这仍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提出诘难的问题是怎样通过个别可以认识一般呢？“将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将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sui generis），也是不对的”[146]。微型的个别农村是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别（部分）与整体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个别离于整体之中，整体总是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的。因而通过描述、分析具体的村庄，也就可能为揭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资料，积以时日，将认识累积起来，将会增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

142 参见马林诺斯基：《南海舰人》，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第23页

143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165页

144 《社会调查自白》，《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4页

145 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的社会调查是他们进行的首次实地调查，但其研究的主旨不是对所研究地进行全面深入的社区研究，其学术成就与影响也不及江村调查，因而一般认为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以江村调查及《江村经济》为起点

146 《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6页

和比较而获得的。

第四，运用类型比较法。费孝通不满足把认识停留在个别社区的范围内，而是要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社会。但中国这么大，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是调查不完的，所以要建立类型。建立类型就是要掌握个性和共性。类型是分层次的，可参照研究所关注的特定问题和兴趣作为界定类型的标准。如关注家庭关系研究，可以社会组织作为区分类型的基础。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区分不同的类型来。在寻找不同类型的基础上，费孝通自觉地将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比较研究是辨别异同以校正一般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个体。"[147]据此原理去观察社会，费孝通发现江村虽不能代表中国农村，但江村能够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具有江村相同环境与条件的农村就可能形成一个类型。同样，禄村、易村、玉村也能够各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产生不同的农村类型。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各地方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乡镇企业或庭院经济的不同发展"模式"。"模式"作为一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充实了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论。他认为"模式作为一个研究人文世界方法论上的概念，我是在过去有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中逐步取得的，而且觉得行之有效。所谓'有效'是指对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有其实用"[148]。在认识上，通过社区比较方法，逐个研究不同的农村，我们看到不相同的经济条件发生不同的社区模式，从而识别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如果我们能这样研究下去，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我们就能够接近认识某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全貌和发展过程。近七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费孝通以"模式"为导向，运用类型比较法由个别农村社区的认识，逐步扩展到对经济区域的认识，达到了对"全国一盘棋"的构架设想。运用类型比较法有四点值得强调，一是一定要先承认中国各地的乡村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二是要发现类型，在实地的观察中把它的状态逐个地加以系统的描写叙述；三是要善于鉴别不同的类型，从比较中区别个性，并找出其共性；四是在动态中加深认识，如同世界万事万物一样，类型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研究者应追寻它的变化发展轨迹。

147《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6页。
148《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424页。

第五，进行追踪调查。所谓追踪调查就是对别人或自己已进行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再调查。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R·葛迪斯（W·R·Geddes，又译为格迪斯）在评论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学术地位时说，“然而，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149]。葛迪斯认为，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作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如果研究是孤立的，这样，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是有限的，对科学的分析也是有限的。但如果后来，同一学者或其他学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对象进行追踪调查研究，情况就会大不同，从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就可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费孝通明白，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只有对原有的认识对象进行再认识，才能接近于对于该对象的认识，才能逐步接近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了解。他追踪调查江村近七十年，对江村进行了26次访问，提高了对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变化发展轨迹的认识。近二十年来，他行程表上出现的：重访广宗、云南三村……，三访赤峰、临夏、温州……，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等等，是他追寻调查的一部分记录。他提出的并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重视的“关于建立临夏（甘肃）—海东（青海）经济协作区的建议”、“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和“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等10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或设想都是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才提出来的。《志在富民》一书记述了他对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高度。追踪调查，及时了解、反映社会的变动情况和人民的心声，使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动态中加深、完善。他在追踪调查，还修正了自己先前的一些认识偏差。

第六，带着问题。我们把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怎么去调查呢？费孝通的回答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带着脑筋，带着问题去看。这里说的问题就是未知，即希望去探明的事物。研究者怎样才能带问题？他认为，第一，研究者要自己有问题对客观存在的东西，多问几个为什么？第二，从比较中发现问题。要对生活在身边的客观存在多问几个为什么，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都习以为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了。要发现问题，最好是用比较的方法，比较不同的客观事物，就容易引出问题了。第三，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会问为什么，而且要会钻下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的社会调查就能不断地深入了。费孝通的各项调查及其研究范围由村庄扩展到区域，都是这样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调查，把研究推向

149 W·R·葛迪斯著，戴可景译：《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见费孝通：《江村经济》新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268页。

深入的。

第七，注重历史的考察分析。如前所言，费孝通与马林诺斯基反历史主义的功能观点不同，他从不排斥历史，而是十分尊重历史，认为历史与现实是可以统一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无论是农村、小城镇的调查研究，还是边区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查研究，他都关注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用其文化传统作为论据，分析说明现实的渊源，预测前景。例如，他在比较分析“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异同时，从历史的必然联系中找到了各具特色的关键。“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与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浙江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副业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出工业，以工扩商”[150]。当然，历史传统的现实体现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现，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并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又如，他在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地区考察时，发现河州地区的回族历史上有“茶马互市”的经商传统，认为处在农、牧中间地带的陇西走廊，应当自觉地抓经济地理授予它的特殊地位，来发展自己的优势，建议“以商带工”，重开丝绸之路，开辟东亚西部市场。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及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实施，为这构想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八，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费孝通的各项研究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但也结合了定量分析。例如，他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对家庭人口规模的测算，对人地关系的数量分析和对农民收支状况的分析等都是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在《禄村农田》中，他更是以大量的数量分析作为验证整个理论假设的基础的。在以后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中都十分关注有关数字，把统计数字作为论证的科学依据。他从不反对量化分析方法，也不一般反对问卷（“表格”）调查方法，他对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自己的看法。他质疑的是那种不恰当的“分工”，以及把“社会调查和研究”看作“填表格—统计—写报告”的机械工作。他在《禄村农田》评论当时云南农村调查的缺陷，是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1987年10月，他在回答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人类学教授巴博德对问卷式调查的看法时说：“请注意，我并不反对定量分析的价值。我一生使用了定量方法以加强我论据的精确性。但定量分析应该在定性研究

150《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56页。

之后。正是有了定性研究之后，我们才想要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覆盖面有多少。那是定量调查的适当用处。我使用了并继续使用这种问卷调查方法。”[151]在他主持的研究如知识分子调查、江苏小城镇调查和边区开发调查等课题，都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他主张的工作程序的特别之处是，问卷中包括的项目是在定性工作之后进行设计的。他一再强调说：“定量工作提供精确性数据，但它应该放在定性研究之后进行。”[152]

第九，依靠科研群体。过去，费孝通从事的江村社区研究是单枪匹马，抗战期间他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开展的禄村、易村、玉村和昆厂、棉纺女工等实地调查和写作虽然基本上是一个人独立完成，但研究计划和研究成果大多在研究室这个学术群体里进行了集体讨论，集思广益，得到了深化和提高。1957年，他重访江村时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只因反右运动未能形成集体成果。1982年小城镇研究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改变，组织课题组进行集体研究，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新的水平。他组织的科研群体不仅有社会学专业人员，而且还有各级领导、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在课题研究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一是学者与领导相结合；二是研究机构与党政实际部门相结合；三是专业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四是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小城镇、边区开发和经济区域发展都是综合性的大课题，单枪匹马不行，靠少数人无济于事，社会学单门学科也难以包揽。费孝通在组织这些课题研究时，调动地方积极性，协调多学科参与，发扬团队的分工合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对他提出的设想和建议也能很快得到反馈的信息。由他主持、担任学术指导出版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苏北初探》和《小城镇　新开拓》等，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周尔鎏、张雨林主编）、《边区开发论著》（潘乃谷、马戎主编）等，就是集体研究的成果。由民盟中央提交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十多个经济区域开发的建议，也是由他主持、集体研究的成果。这些集体研究成果，从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集体研究，实现了他培养年轻一代社会学、人类学人才的意愿。

第十，回到实践中去。费孝通在社区研究中深知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不是写出了文章，提出了建议就结束了。“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检验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我

151《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7页

152《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7页　153《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答巴博德（美国）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9页

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正是改善人民的生活”[153]。他在《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中进一步写道：“一种意见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考验才能做出结论。如果确有几分经得住考验的内容，更应当对这项意见怎样得来，怎样发展，进行认真的反省。更重要的也许是应当回头看看，有什么缺点，为什么发生这些缺点。”[154]“走一趟，写一篇”。他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新的认识，对当地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然后将这些建议提供给当地领导参考，如果采用了他的建议，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建议实施以后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是否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是否增加了，生活是否改善了。他认为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尺度。《犁过的土地——记“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教授》（群言出版社出版，1996）一书，由一些省、自治区、县（市）的领导记录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业绩，说明他的小城镇（乡镇企业）、边区开发研究的许多认识是正确的，并在实践中结出了果实。这是一个侧面。另外，他通过实践的检验或比较研究改正了某些看法，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他1983年提出“苏南模式”，认为其他农村今后会走上苏南一样的路子。但经过“温州行”，发现温州的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它的经济起飞的主导是私营经济，与“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导截然不同。他进行了反思，修正这个片面的认识，并对“温州模式”的性质、特色及其发展进行了科学分析。“两个地方由贫致富是一致的，但是境遇不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结果两地的经济结构也各有特色”[155]。由此逐步形成了“因地制宜，多样模式，随势应变，不失时机”这样比较全面的“模式”比较指导原则。又如，他经过十多年在传统农业地区的反复观察、思考，概括总结农民“庭院经济”的经验，论述了“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还有致富的空间”的观点，并从中发觉他过去概括的“无工不富”观点不够全面，应补充加上‘有工不一定富’，工厂办不好会赔钱，‘无工也能致富’，在农业里，靠发展种养加，照样可以发财”[156]，这样，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开拓了新的路子。在研究方法上，他对早年认为实地调查只要事实不需理论，以及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没有理论作指导，结果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中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江村经济》全书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他认为这是无可讳言的缺点，在日后的实地研究中得到了克服。例如，禄村研究就明确以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变迁为主题，以土地制度为中心进行分析，理论分析与事实有机地相结合，提高了《禄村农田》的研究质量和学

153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巴博德（美国）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9页。
154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23页。
155 《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9页。
156 《广宗扶贫》，《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86页。

术水平。他对晚年肩负过重，自加压力过大，开了题而无暇深入研究，由于工作和身体状况等原因，不能像早年那样进行实地调查，有着清醒的认识。

费孝通在运用各种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的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风土人情及全球化的端倪进行观察、比较，先后发表了《初访美国》、《重访英伦》、《访美掠影》、《港行漫笔》等著作，但他没有在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从事过长期的、广泛的实地调查。他这种选择不是为方便，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中国有责任。“老实说，我集中精力在中国的理由是我一直想要看到一个更好的中国”[157]。他认为，“研究者不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158]，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首先应为国家尽职尽责。费孝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一位杰出的人民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欣慰的，在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坎坷后，看到了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奔向小康。通过他的著作，人们逐渐了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是有用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重要的、紧迫的问题。

157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巴博德（美国）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98页
158 《社会研究能有用么》，《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66页

第二篇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民族研究

第五章 从大瑶山出发的民族研究

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一直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呕心沥血。他在九十岁高龄时，深情地回忆道："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1]

如第一章所述，1935年秋天，费孝通和志同道合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不远千里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为这对"能说能做"、志同道合的夫妻叫好。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2]。然而，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他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梦"，大瑶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六上大瑶山，直到他九十高龄，还一直惦记着重上大瑶山。2005年4月24日他逝世以后，他的家人、学生一直与大瑶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做着大瑶山的学术研究。

一、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

圣堂山是广西第五高峰，海拔1979米，是大瑶山中的第一高山。当年费孝通和王同惠的主要调查地，就是围绕圣堂山周围的村寨展开的。圣堂山下的学术和爱情，始终贯穿在费孝通以后的七十年人生中，一直在老人心中萦绕。1988年12月16日，他拜谒王同惠纪念亭后写道："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坎

1《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第128页。
2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

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九洲将历遍，肺腑赤心驱。彼岸自绰约，尘世惟蚁聚。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偎远墟。”[3]反映出他对王同惠终生的怀念和牵挂。

费孝通所说的“圣堂山下盟”，显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儿女情长，海誓山盟，在对王同惠深深的爱情和思念以至疚歉上，他在1936年5月为王同惠所立的墓碑上，有着更加充分的表达：“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搜遍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一句“萦回梦祈”，一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再加一句“速召我来”，我们已经无法用其他的语言来形容和表达他伤痛的心情。

据费孝通自己的回忆，当他得知王同惠牺牲的消息后，怀着绝望的心情，将带去的药品，包括消毒水都全部吞下，只求与王同惠同路，但求死不得。我们在大瑶山下古陈村访问村民时，他们也谈到当时村里最担心的就是费会寻短见，是否将噩耗告诉他很用了一番心思。果然在费见到王的遗体时，他挣脱搀扶的人决意将头撞向放遗体的大石头，幸好村民早有防备，以后每天都派专人守护着他。他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也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

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是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4]。

吴文藻先生赞叹道：“孝通真镇定，真勇敢，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责，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这几句话何等

3 费孝通：《费孝通诗存》，群言出版社，1999，第64页

4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第67页

沉痛，何等正大，又何等理智？读信至此，使我忍不住流下了悲哀钦佩的热泪。”[5]

费王谈恋爱时，费孝通已经在清华大学跟史禄国念人类学的硕士研究生，王同惠则在相距不远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三年级，他们通过探讨学术，共同译书不断加深感情，在清华和燕大之间来往穿梭。两座校园、宿舍、实验室以及周围的圆明园、颐和园公园，都留下了他们美好的记忆。他说“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6]。到广西做特种民族的调查，使他们决定迅速结婚，在师友们的衷心祝福下，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踏上了改变命运的旅途。

但是，费王的恋爱和结婚，比人们通常理解的罗曼蒂克要深刻得多。“圣堂山下盟”，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他在为王同惠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作序时，深情地回忆了他们恋爱的经过和感觉：“这段姻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得之偶然。因为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以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两个书呆子碰了头，没有男女之情。如果连这点基本的人情都没有，那就成了图书馆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同伴了。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7]

其实，这条牵着他们、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的线，不仅是求知上的共同追求，本质上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相传的社会责任感。当年费孝通从东吴大学转学燕京大学时，看似无意地从医预科转到了社会学专业，绝不仅只是当时系主任许士廉的口才和吴文藻等杰出老师的人格魅力，费孝通的内心一直在找寻救国之路，想从医治个人的痛苦升华为医治社会的疾病，让中华民族尽快地强大起来。

这是一代有志青年的抱负，王同惠也是这么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老师吴文藻对她向来赞誉有加：“二十四年八月，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成终身同心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的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果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

5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4页。
6 《青春作伴好还乡》，《费孝通人物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第195页。
7 《青春作伴好还乡》，《费孝通人物随笔》，第192页。

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8]

王同惠在和费孝通合作翻译比利时神父许让写作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就提出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的疑问，急切地盼望实际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因而主动要求和他一起去大瑶山做调查。在大山里的生活，费孝通用了“兴奋”一词来形容，“我们已经忘却了一切生活上的困苦，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但是我们有希望，有成绩。一直到我们遇难，一死一伤，三个月中，我们老是在极快乐的工作中过活。在遇难前一日，我的妻还是笑着向我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9]。我们在读费、王的《桂行通讯》时，不难感受到这对急于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年轻人的辛苦和快乐，特别是当费孝通从别的村子测量人体归来时，留在六巷村的王同惠总会说“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兴奋地将新的收获告诉费。老乡们也回忆当时作为北方人的王同惠，吃不惯山里的饮食的事情，甚至连生火做饭，他们也得从头学起。

王同惠的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巨大。几十年过去了，他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痛心疾首：“我们的相识只有两年，结合只有108天，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得令人难以忍受。天作之合，天实分之。其可奈何？”他在当时不仅是痛失亲人，也感觉痛失同工，他在广州养病时给朋友们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若是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并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两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里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10]

这就是费孝通与王同惠的“圣堂山下盟”！为了这一个庄严的承诺，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酷环境，“多经暴雷雨”，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坚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他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我

8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第2页
9 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第67页
10《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61页

是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11]

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王同惠的牺牲，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使他义无反顾地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两人的工作”，造就了一个不平凡的费孝通。

二、类型加比较，行行重行行

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12]

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专门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在谈到如何认识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时，他特地回忆了在花篮瑶的调查经历。当他和王同惠到达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在语言不通、风俗不明的情况下，他们被友爱而好奇的瑶民所包围，“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那里呢？”他们按照自己文化中的友好交往规则，努力与唯一懂汉语的房东蓝济君接近，特别是王同惠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很快和当地人建立了亲近的关系。“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没有去伦敦接受过马老师的‘文化论’。但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自动地并非有意识地跟着马老师当时正在构思的《文化论》和‘文化表格’所指导的方向行动了”[13]。

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不仅确定了费孝通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发展方向，也确定了他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以不到六万字的篇幅，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花篮瑶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吴文藻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14]以后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棵老根上发的芽。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表的《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

11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第11页。
12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第2页。
13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65页。
14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9页。

本著作，是他前半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15]从中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研究的痕迹。

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里，费孝通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述分析家庭，占了全书的一半。对花篮瑶婚姻家庭的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在《生育制度》里找到进一步的理论解释。通过花篮瑶的调查研究，费孝通体会到：“我认为性的满足和生育孩子应当是可以分得开的两件事，不仅在现代社会里实际上早已分开，即使在许多经济文化不太发展的民族里，如我所调查的花篮瑶，和尚未受现代化较深影响的农村如江村，性交和生育事实上是可以脱钩的两件事。”得出了“文化不仅是用来满足人的生物需要，而且可以用来限制人的生物需要。于是（《生育制度》）走出了单纯满足‘生物需要’的老路”[16]。特别是它的核心观点“三角结构理论”，认为父母子三角才能构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而这正是大瑶山花篮瑶不重结婚仪式，更注重长子出生后的“双喜酒”给他的启示。

在谈夫妇关系时，他也引用了坳瑶的情人制度的事例，说明乡土社会的家庭是一个抚养的事业单位，“在夫妇间没有互相满足对方感情的义务的地方，各人去找各人的情人，并不对夫妇关系有什么冲突，反而他们可以因之而得到配偶的情人在家庭事业上的协助。同时我也得补充一句，不讲感情的合作并不是感情的破裂，或是有恶感之谓，不讲爱，也没有恨；两人在爱恨之外，还是可以相处得很和睦，共同担负这家庭的事业”[17]。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大瑶山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诸如“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概念，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比较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恢复社会学学科，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社会学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他从宣传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入手，面对当时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待业问题、住房紧张、家庭关系等人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社会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学的意义和作用。按照类型加比较的基本思路，他从重访大瑶山和重访江村开始，通过不断地认识新问题和新矛盾，逐渐在层次上加以上升和比较，从村到镇，再到区域比较，形成他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问题，为富民强国服务的社会学思想体系。这套体系形成的基础，依然可以追溯到大瑶山的调查。花篮瑶主动控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4版，第94页。
16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60页。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150页。

制人口，每对夫妻只能生育两名子女，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使其种族在贫乏的山区得以顺利繁衍生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春正式提出了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理论：“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我家乡的农村，又访问了广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18]从此以后，他就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从各种“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再到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不断丰富。

三、六上大瑶山，不解终身缘

大瑶山调查遇到的不幸，使得费孝通和大瑶山人民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他特别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中说：“我在此得附带说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的‘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们，能不住地在这条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在内心深处惦记着大瑶山的发展，先后于1951年、1978年、1981年、1982年、1988年重访大瑶山，不断为大瑶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主意、想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多民族国家建立人民共和国，就必须看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并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和拥戴。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1951年7月，费孝通担任中央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带领中央访问团第二次踏上广西大瑶山。访问团在广西一路走村入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访贫问苦，送衣送粮，同时调查了解少数民族族称、人口数量、语言、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访问团在广西调查时，大瑶山的剿匪工作尚未彻底结束，残余匪患经常祸乱黎民百姓，这给访问团入村调查增添了危险。然而，大瑶山匪患和大瑶山瑶族的善良正好形成鲜明反差。访问团走村入户，每到一个村寨，都能得到瑶民的热情礼待。访问团在大山里经过近两年的宣讲和调研，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效地送下瑶乡，大大提升了瑶民的国家意识。

18 费孝通：《社会学的再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第240页。

大瑶山瑶族虽然有“过山瑶”和“长毛瑶”族群差别，但族群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剥削关系。拥有土地的长毛瑶虽然租让土地给过山瑶，每年获得一定地租，但是长毛瑶本身也耕田种地，并不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依靠收租生活的剥削群体。费孝通领队访问团，结合大瑶山客观历史实际，在当地，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商议和平解决瑶族内部矛盾的问题。同年，《大瑶山团结公约》颁布实施，使得以团结公约的形式化解族内隔阂的设想成为现实。对于过山瑶来说，团结公约结束了一百年多年来无地、受剥削的被动局面，因而，他们倍加珍惜土地，勤俭持家，精心种植农业生产。长毛瑶主动放弃土地特权，收租的好日子不存在，也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生产劳作。因此说，团结公约不仅有效地消除了民族隔阂，而且大大激活了瑶族族群的生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访大瑶山，费孝通特意在广西龙胜了解民族区域自治试点工作情况。作为广西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龙胜民族自治区于1951年8月19日成立。经过调查，他在总结龙胜建立自治区的经验基础上，写出《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一文。他指出，只有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要求，各民族才会更加相信和依靠党和人民政府，民族群体之间也才会更加团结。龙胜区域自治县的试点工作，为大瑶山瑶族区域自治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经验基础。在中央访问团的协助下，一年之后，广西地区又陆续成立大瑶山瑶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区、大苗山苗族自治区等区域民族自治区。地方政治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铺就了道路。

197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费孝通作为自治区政府特邀嘉宾，第三次回到阔别43年之久的大瑶山。今昔对照，变化之大，先生慨叹瑶山“换了人间”。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一文里这样写道：“瑶山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也许就可以从此说起。这次进山，我乘坐舒适的国产上海牌小轿车，从广西的首府南宁直达43年前我始终没有到达的目的地：大瑶山的中心——金秀，一共只花了六个小时。这和我过去步行爬山相比，真有隔世之感。”[19]时间跨越四十多年，过去走路进山，而到现在可以乘汽车直达。过去瑶山的黑夜只有松木片照明，而今天电灯、电影、电视等现代化的东西在瑶山都已经出现。这些变化让费孝通先生看到了大瑶山瑶族的大好前途。

然而，改革开放前夕的大瑶山，“农业学大寨”运动尚未平息，“以粮为纲”的口号响遍整个瑶区。费孝通此行后认为，金秀瑶山的水田都是沿河而造的，面积狭窄，数量有限，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山区的水田不过1300公顷，大多数瑶民住在高山

19 费孝通：《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六上瑶山》，民族出版社，2006，第140-141页

上，刀耕火种，经营旱地作物，粮食生产极为有限，“以粮为纲”并不符合瑶山实际。瑶山应该发展林业。大瑶山层峦叠翠的千山万岚是个育林取材的“聚宝盆”。茫茫林海，一望无际，每年能为国家提供大量木材，也可以用这些木材作原料，发展新工业，生产各种器材赚钱。另外，金秀大瑶山的这些林地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每年蕴藏24亿立方米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水库。在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抹煞山区特点，强迫命令以森林为主的山区也必须实现粮食自给，结果造成严重的林木破坏，水土流失，附近七县农田所依靠的水流干涸，农林两弊。他参观完金秀中心发电厂和海拔1400多米的林场后，在他的思维里早已绘制出金秀瑶山社会发展的绿色蓝图。大瑶山山岭起伏，山涧急流到处都有，大瑶山只凭这一优越条件，就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潜力。他坚信，要真正解除瑶山人民的贫困状态，就必须利用大瑶山森林植被和水利优势，走“木材+水电”的经济发展模式。

1981年8月19日，龙胜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费孝通受邀第四次访问大瑶山。大瑶山有花篮瑶、茶山瑶、坳瑶、山子瑶、盘瑶五个瑶族支系，为了能够深入调查每个支系的情况，先生此行，便把中央民族大学的胡起望、范宏贵和刘玉莲三人带上瑶山。盘瑶人口较多，解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也较为明显，因而他选择了盘村瑶族作为他们的调查对象。在他的指导下，三人不负重望，前后在盘村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调查，1983年出版了《盘村瑶族》一书。费孝通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在充分肯定他们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进一步指明了瑶族研究的新方向。

龙胜瑶族自治县经过几年的发展，居住在河谷一带的瑶族，依靠勤劳的双手已经生产富裕起来。但高寒山区的瑶族和河谷地区的瑶族相比，差距却依然很大。费孝通认为，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没有河谷地区的优势，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山区特有的经济作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在龙胜地区并不缺少土特产。猕猴桃就是其中一种可以大力发展的经济作物。如果猕猴桃真能发挥出经济效应，那么，它就可以给周边市场提供高营养价值的果实及加工品，大大提高深居高寒山区的瑶族的经济收入。这是他在接受当地瑶民敬猕猴桃酒时，所想到的山区财富增长的新亮点。为了帮助龙胜县发展猕猴桃酒，他回到北京后，欣然提笔写下《龙胜猕猴桃》一文，发表在天津《八小时以外》杂志上，向人们力推猕猴桃。

参加完龙胜庆祝活动后，费孝通特意到金秀县了解自治县成立之后的社会发展情况。大瑶山解放初期，通过实施团结公约和土地改革，瑶族内部基本上实现了平等，瑶族各支系、瑶族与汉族、壮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然而，他同样看到了金秀瑶族自治县存在的许多问题。大瑶山自治县组建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充分考虑平原地区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便以山区为线划分县界，使金秀成为一个山区贫困县。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建县之初，主要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依

山划县”，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正确的思路。但是随着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无粮无地现象较为突出，自治县画地为牢的状态严重束缚了大瑶山的经济发展，要改变大瑶山贫困落后的社会状态，就必须考虑交通、贸易渠道、粮食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问题，而要改善这些问题，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改变大瑶山现有的行政区划。因此，他回到北京后，及时向中央反映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行政区划不合理的现状，提出重新调整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县域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根据费孝通的提议，1984年7月，国务院经考察核实，正式批准将大瑶山脚下原属鹿寨县管辖的桐木和头排两镇划并到金秀县的管辖范围。桐、头两镇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经济发展远快于山区，这次行政区划调整，激活了金秀大瑶山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有效解决了山区用粮、平原用木、工业用地问题。单桐木和头排这两个乡镇，每年就可以为大瑶山自治县增加近一倍的财政收入。

1982年8月，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费孝通应邀第五次到大瑶山访问，从北京启程到金秀，前后仅用9个小时。费孝通回忆起四十七年前，单从上海到大瑶山，他和前妻王同惠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感慨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海之变。在金秀县县庆大典上，他以一个瑶山巨变见证人的身份，饱含深情地祝愿瑶山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然而，在惊喜之余，他也看到金秀瑶山经济发展的“伤疤。”他初次到瑶山调查所见到的绿茵山场，早已变成一个个光秃秃的山顶。大瑶山多山少地，长期以来，山民食粮一直依靠周边区县供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为了结束粮食短缺的局面，大瑶山瑶族喊出“不吃亏心粮”的号召，决定向大山要粮，人们开始伐林开荒。据当地资料记载，1952年大瑶山水源林面积为79万亩，而到1982年则速降为50万亩，这种毁林开荒、初放型的农耕方式，完全背离了当地客观实际，传统产业结构遭到彻底破坏。他指出“在这地无三尺平的山区里搞‘以粮为纲’，人们只有砍树开地，在贫瘠的山坡上长粮食，几年连种子都收不回，不得不丢荒另辟，把郁郁葱葱的山岭，刮成一片片的秃顶。山内的人劳动终日不得一饱。山外却因山上林少蓄不住水，多雨发山洪，少雨河成溪，涝旱相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20]，林粮矛盾使大瑶山瑶族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必须刹住要粮毁林的错误思路，充分发挥大瑶山的林业优势，走“林粮相济”的路子，瑶族人民致富才会有希望。在他的指引下，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及时改变工作方针，实施“以林为主”的经济发展决策，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大瑶山瑶族种植八角和杉木。由于思路正确，金秀县林业逐步得到恢复。“1987年底，全县共造林168万亩，平均每年4.8万亩。林地面积196.93万亩，森林覆盖

20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第495页。

率达52.62%，农业人均有林15.98亩。林业生产产值87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4.34%。林业产值分别比1978年和1952年分别增长2.75倍和27倍”[21]。大瑶山生态环境得到逐渐恢复。

1988年12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78岁高龄的费孝通应邀第六次访问大瑶山。在参加完自治区庆典之后，他便专程前往金秀，坚持要亲自到53年前的田野点六巷，向当地瑶胞面谢当年欠下的感情账。12月19日，汽车经过两个多小时颠簸，把他带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他刻骨铭心的六巷。六巷瑶胞沿路跳起欢快舞蹈，隆重而真诚地欢迎先生到访。当他和年高94岁的房东蓝妹国见面时，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荣辱得失，在两位老人亲密握手的瞬间都化成了绵绵细语。大家泪水湿透眼角，静默无声。稍作休息，他便来到六巷村北的王同惠纪念亭。

1985年11月27日，六巷瑶族同胞在这里修建了该纪念亭（2002年7月扩建），以纪念为了瑶民福祉而殉难的王同惠女士。纪念亭左侧的碑文记载：“王同惠女士为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把芳年才华献给了瑶族人民。兰摧玉折，淑德常昭。我乡瑶族人民，为纪念其高尚精神，特建亭树碑铭志，以流芳千古。”在王同惠纪念亭前，费孝通带着外孙女，沉默致敬，许久不舍离去，悲情依旧。从六巷回桂林途中，他便提笔写下那首著名的纪念诗文，感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以表达失妻的沉痛心境。第六次瑶山访问，他在广西停留了整整15天时间。他先后到南宁、贵港、梧州、玉林、桂林等地慰问群众，行程达2000多公里。当看到全区各地民族团结，互帮互助，社会和谐发展的势头，他高兴之余，也对当地干部就如何用足用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优势产业、搞好西江走廊开发、扩大乡镇企业规模、发挥农村富余劳动力作用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提出许多独有的创见。

离开广西，费孝通踏上湖南江永、江华及广东连南三个南岭山脉地带瑶族比较集中的县域。他在走访中发现，广西恭城县利用山区特有的地势，安置小型发电机，解决了瑶民的照明和烹饪燃料问题，已经走在全国农村电气化发展的前列，是一个依靠林业发展起来的示范县。湖南的江永和江华两县，虽然都以瑶族为主体民族，但发展的情况却不一样。江华县把林地承包给当地瑶民，不但森林得到有效看管，而且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但江永县政府则把大部分森林划给国营林场，把当地瑶胞搬迁到贫瘠的山区，从外地吸收林农来看管。由于生活区域被政府划为自然保护区，当地村民完全失去林场。山里要护林不能进，山脚良田又不划分到户，人们只能依靠临时分到的少许瘦薄山地种植五谷勉强维生。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南岭经济

21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金秀瑶族自治县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第164页。

协作区”的战略构想。他建议南岭瑶区仿照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协作区的发展模式，在南岭瑶族聚居的地方试行经济协作区。初办时，范围可以适当小些，试行一个时期，有了成效再逐步扩大范围。这是他站在“南岭走廊”的宏观区域科学提出智慧方略，完全符合南岭地区的客观实际。十六年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环境的改善，南岭瑶区的地方实践再次证明搞经济协作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4年11月，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区代表聚集到湖南江华县召开“南岭瑶族地区经济协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会议通过《协作发展：南岭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宣言。自此，南岭瑶区真正步入资源互补、区域协作快速发展的轨道。

第六章　解放初期的民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参加了中央的民族访问和民族识别调查工作，成绩卓著。

1950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1952年，他调动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因而在1956年，费孝通亲自参加了由他倡议的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我们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22]。可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他沉寂了20年。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1984年他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著重做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两个题目。他不顾年事已高，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机会在祖国南北东西穿梭不息。除台湾和西藏外，他走遍了各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森林，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至海拔3000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费孝通的民族思想，起始于他在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心得。在他和王同惠的《桂行通讯》里，就记述了广西北部特种民族杂居区在1932年2月19日~3月25日发生的变乱，“经驻军全力扑平，死亡土人达一千多”。他当时就评价道：“若是多用武力镇压，在剿匪的名义下大规模地减少他们的人口，既和政府所采取的优待同化政策相背，而且反而增强他们与汉人相对立的民族心理。”[23]再加上他在大瑶山的实际遭遇，他非常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在他看来，“当前地球上各地的居民，尽管由于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差别，经济

22 费孝通：《暮年漫谈》，载《中央盟讯》2005年第5期专刊，第32页。
23《桂行通讯》，《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11页。

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有所殊异，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所共有的发明创造的才能，都具有发展进步的资质。他们都是通情达理、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24]他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看待少数民族。在他文章里，随处可见到用他生花之笔，传神地描绘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讴歌少数民族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同时他又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而忧心忡忡。

一、参加中央访问团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以及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等全新的民族政策。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关系的新时代正式开启。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25]成立，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兼任中央民委主任。1950年春，周总理指示可以先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于是，中央民委决定开展了“上来下去”为主题的民族工作。所谓“上来”，就是请地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联络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况。所谓“下去”就是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访问，传达中央和毛主席对各族同胞的关怀和慰问，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26]中央民委首批派出的西南访问团由中央民委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的120余人组成。由于费孝通有人类学的学术背景和社区调查的实际经验，中央民委也邀请他参与这项工作，并委以西南民族访问团副团长之职。自此以后，他正式加入了新中国民族工作者的行列，同时将个人对民族的认识与研究置于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体系之中。

西南访问团全体成员在北京国子监集中学习一个多月后，于1950年7月2日正式启

24 费孝通：《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67页。
25 简称“中央民委”，现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即“国家民委”。
26 江山：《我的西南访问团之行》，载《民族团结》1999年第2期。

程前往西南地区。到达重庆后，访问团得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邓小平等人的热情接待。之后，西南访问团分为三个分团，分别前往川、康、滇、黔地区。费孝通兼任二分团团长，前往贵州地区。访问团为各族人民带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问候，并向他们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访问团不但和贵州兄弟民族同胞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贵州各地工作的同志们也树立了深厚的感情，圆满地完成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巩固民族团结的政治任务。

1951年6月20日，中南访问团一行七十余人离京前往中南地区。李德全团长因公缓行（后赴广东兼任广东分团团长），由副团长费孝通代理团长。中南访问团出发后分成三个分团，分赴广西、广东、湖南三地，费孝通先生兼任广西分团团长。7月3日，中南访问团第一分团一行五十六人到达广西南宁。7月13日起，访问团一行从南宁出发，先后到义宁（今属临桂）、龙胜、三江、金秀、西隆（今隆林）、防城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慰问，前后达三个多月的时间。访问期间，访问团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民族代表座谈会，举行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和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展览会等形式，宣传民族政策，密切了中央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27]

事实上，访问团还肩负着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的任务。1951年4月，费孝通完成了贵州分团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6月，他又完成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文。他在报告中坦言，调查团在贵州的调查中有很大收获，但对当地各民族的情况仍然不太清楚，就连贵州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人等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对个人而言，他认为此行更多的是学习，是“从头学起”。在自广西返京后，他分别于1951年11月、12月完成了《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两篇文章。

二、参与民族识别工作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各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最多的是云南，有260多种；其次是贵州，有80多种。由于1954年要召开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认数百个名称是否为单一民族，是向各少数民族分配代表名额的基本前提，因此党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识别的任务，民族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工作方面采取的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举措，也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重要前提。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

27 覃世进：《中央访问团与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载《当代广西》，2008年第14期，第23页。

总结》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民族识别的总原则。他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28]根据这一指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加以区分，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统统都称为民族，一律平等。以1953年8月中央民委派出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为标志，民族识别工作正式开始。同年，还对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湘西的土家族进行识别调查。到1954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公认的少数民族外，又识别出壮、布依、侗等28个民族。1956年到1964年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到1964年，新确定15个少数民族，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1965年确认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确认了云南攸乐山区的基诺族。截止1982年7月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55个法定的少数民族。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作恢复、更改和对一些族体进行归并工作，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

1955年，费孝通主持了贵州地区穿青人、穿蓝人的识别调查工作。[29]在《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中，调查组的结论是穿青人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1956年10月，他带领研究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综合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德宏、怒江等地调查。[30]1957年1月，费孝通先生赴西南地区调查民族社会史和知识分子状况，留有《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查访》一文。[31]

经过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在科学分析、充分尊重本民族意愿的前提下，1970年代末，我国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分，并确定了各民族的族称。民族识别工作梳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和现状，科学地鉴别了我国现实的民族成分，基本上认定了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进行民族工作的具体对象，确认了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坚实基础，为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创造了前提条件。民族识别是我国民族工作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三、培养民族干部

1950年，党和政府为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确保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决定在北京创建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受命参与创建，他对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宗

28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276页

29 费孝通、王静如在195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术报告会上提出的《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

30 云南民族工作大事记，http://www.ynethnic.gov.cn/Info.aspx?infoid=1051

31 《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1-17页

旨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费孝通担任副院长。此后，他与中央民族大学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之初，他敏锐地意识到，推动民族问题的研究，学科人才的汇集极其重要。

1952年9月，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高级专门人才，费孝通借助全国院校调整的机会，将“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单位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等专业研究的一流学者大部分调来民族学院，集中于研究部”[32]，这批学者构成了当时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的主力。他们中有潘光旦、吴文藻、翦伯赞、吴泽霖、翁独健、冯家升、杨成志、林耀华、王钟翰等人。这些著名学者对我国的民族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史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

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行政事务更加繁忙。但他参与的这些行政工作仍然是新中国民族工作体系下的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学历简述》中坦言，自己在1950年到1956年间由于“行政组织任务较重，写作不多”[33]。1957年7月的反右斗争中，他和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等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他在民盟中央盟内的一切职务及国务院专家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学院的行政职务均被解除，仅保留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1959年10月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由于民族问题在“文革”期间被忽视，民族工作机构也被取消，他无法继续从事行政或研究工作。

四、提出不同时期民族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马林诺斯基名誉奖时谈到：“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34]这是他研究民族问题的一贯态度，强调理论研究密切结合社会需要。回顾一下他的民族研究，就会看出他在每一阶段都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民族问题实际情况，提出民族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从而不断推进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956年，他和林耀华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把民族研究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任务结合起来，提出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

32 杨圣敏：《研究部之灵——几个片段的回忆》，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33《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5页。
34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9页。

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35]并就民族研究上的四个方面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1.要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国究竟存在多少个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研究。民族识别必须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基础上，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

2.解放初我国各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上，几乎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必须尽快将这些宝贵史料记录下来，但应当注意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反对片面教条的研究。

3.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并不能凭空创造或完全从外界输入，而是一个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民族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并帮助各民族人民促进这个过程。

4.我国各少数民族有着复杂的宗教信仰，而且往往和民族心理、政治、国际斗争等因素搀杂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及民族关系，是必须重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费孝通及其同事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各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对指导民族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学在中国是比较年轻的学科，费孝通和林耀华特别指出，上述任务都是属于少数民族研究的范围，不要引申为民族学是一门只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民族，“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3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民族工作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费孝通又适时提出：“当前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研究工作必须从这些主要任务出发，实行实地调查和理论阐发。”[37]

35 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510页
36 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538页
37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70页

第七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民族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缓慢。费孝通在自己多年来从事民族研究的深厚学术积淀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该理论的提出，对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产生了重大意义，为我国各民族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为我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对话顾颉刚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沙俄趁机支持外蒙古独立，英国也极力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日本不断扩大侵略，并尽可能地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在日本的支持下，1932年“满洲国”建立；1933年内蒙古各盟旗王召开“自治筹备会议”，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培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爱国知识分子对此痛心疾首。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以求认识边疆、共同抵御侵略。1939年1月1日，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揭露“中国本部”一词隐含的分裂边疆地区的政治意图。傅斯年看到后，向顾颉刚写了一封信，他认为：“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疆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38]顾颉刚遂借题发挥，写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顾颉刚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认为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外国所称的秦人、汉人、唐人，血统不是一源的，文化也

38 引自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12月13日。

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他还指出，“五族共和”思想中的“五大民族”之说也同样具有危险性，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他同时也认为，为了避免日本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应当慎用“民族”一词。

顾颉刚的主张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也有一些质疑者，费孝通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1939年5月1日）一文中。费孝通认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这种差异性是社会分化的基础。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不同团体间会发生文化、语言、体质上的混合，但这种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的。因此，在费孝通看来，谋求政治的统一，重要的是“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39]。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40]。

顾颉刚写了两篇文章回应费孝通的质疑。“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急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41]

在这场辩论中，顾颉刚从时局出发着重建构中华民族一体性，而费孝通从学科角度论证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与政治上的统一之间的张力。研究者认为，顾颉刚关于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对费孝通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42]

二、对民族调查研究的梳理和思考

1978年，费孝通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他希望自己从此可以“集

39 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102-109

40 周文玖，张国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史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20-30

41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6-27页

42 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中力量搞民族研究”[43]。1979年春节，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要求费孝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这个任务上。费孝通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行政工作上，但这些工作并不妨碍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

在1978年全国政协民族组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的民族识别还有一些遗留“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因此，他提示服务于民族识别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44]。

1982年，费孝通在回忆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时说：“民族是不断变动的……变化最大的是汉族，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人进去，现在还没有人把汉族的形成过程搞清楚。我们要把中国民族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的、不断变动的构成。我当时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想法，但1957年后我不能出来搞实地调查了。”因此，他期待研究研究者：“进行宏观的研究，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态和趋势，不要仅局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分别研究。今后中国的民族还是要变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呢？”他还建议：“民族研究一定要把考古、历史、语言、社会调查结合起来。”[45]

1983年，费孝通在短文《论“民族”》中提到，虽然新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很好地界定过“民族”的概念，但还是通过民族识别工作界定出很多民族。而且还有一些族群要求政府确认他们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要不要把他们识别为民族，绕不过民族的概念。“我国的民族事实上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不可能完全相合。可是过去却总是想套用‘民族四要素’，也没有人敢进一步去作历史分析，于是含含糊糊地混到目前”。因此，他希望提出一个适合中国现实的民族概念。他在这篇短文中简要地梳理了“华夏”到清末“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历史过程之后，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层次化的民族概念：“在民族这个概念上是否可以设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藏、蒙、回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等等。”[46]这些对新中国民族研究与民族政策的反思，为他对相关问

43《费孝通选集》，第6页。
44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45《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274页。
46《谈“民族”》，《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94~395页。

题作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埋下了伏笔。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费孝通应邀前往，顺路重返金秀大瑶山。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大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一文中，用“换了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他还专门委派胡起望等学者到金秀继续进行瑶山调查。1981年，费孝通三上金秀瑶山，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六七十年代的“以粮为纲”，对大瑶山的生态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破坏。片面的民族区域制度政策，也带来了“画地为牢，划山为牢”的后果，阻碍了山区和平原、瑶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通过几次大瑶山的调查研究材料，对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议：“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样对汉族，对少数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47]1982年，费孝通参加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的大庆活动，第四次上金秀瑶山，在《四上瑶山》一文中表达了对大瑶山发展多种经营和科技致富的赞许。1988年，费孝通五上金秀瑶山，这次不仅是到金秀县城，而且直接乘车到了当年调查地六巷，见了当年的老朋友，也拜谒了王同惠的纪念亭。

通过五上金秀瑶山的调查研究经历，引发了费孝通很多的思考。他认为要发挥民族优势，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在观念上加以变革。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比较容易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水平。自足自满心理必然会带来保护现状，抗拒外来影响的反应，而封闭和拒外，实际上会保护落后，使差距越来越大。依赖心理的形成，会使一个民族失去自信和自尊，变得毫无活力，这个民族必然衰落。要防止这些不宜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先要搞好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其次，对于还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要靠商品经济来冲击其旧有的经济结构，打开封闭的大门。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引导他们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不同时间、不同路线、讲着不同语言的五个瑶族支系，长期共同生活在大瑶山，逐渐认同瑶族这一共同称呼的现象，也引起了费孝通的深思：“大瑶山的具体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过很多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

47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第87页。

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里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了。”[48]

费孝通在晚年回忆道：“30年代我所调查的花篮瑶就在今金秀瑶山，当时称大瑶山。金秀瑶山里现在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这个山区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足的土著民族，进山之后这许多人凭险恶的山势，得以生存下来。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即维持至解放时的石碑组织。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后来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多了，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知识也多了些，又联系上汉族本身，感觉到由多元形成一体很像是民族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49]

从大瑶山的调查，再到50年代参加少数民族慰问团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费孝通为了解决教学需要而编写了一本《民族历史概论》，将各民族的历史综合在一起，亲自给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初步奠定了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广大的民族地区来往穿梭调查，进一步完善这一思想。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文资源保护

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东西部的平衡问题。2000年，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以前只看到西部贫穷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它富有的一面，没有看到它有那么丰富的人文资源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50]他还注意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人们对西部落后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谈得很多，对西部丰富的人文资源讨论得少；注重开发中的物质与经济层面，而较少关注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西部地区因为气候、地理、交通方面的情况，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少，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保护得相对完整。在西部大开发掀起的现代化浪潮中，历史文化遗迹可能遭到破坏，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能会消失。“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

48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第88~89页。
49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64页。
50《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65页。

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51]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非常清楚，工业化、城市化的洪流将对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带来强烈冲击，经济开发也不免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因此，他希望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将这些文化保存下来，而使其获得现代社会中的有用性、稀缺性和现实意义是保存它们的前提。他认为，经济发展不能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唯一目的，经济发展只能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这里所存在的精神问题，就是人文资源的价值所在。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一样，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祖辈留给我们的财富。

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有很多是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费孝通谈到：“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们认为西部曾有一度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先进的代表，但后来其经济落后了，其文化地位也跌落下去了。但其实不是它的文化从此落后了，而是我们对它后来的文化认识不够了，主要是我们认为它不是主流的文化，就不再去认识它。我们现在搞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它、理解它、发掘它。”“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语境里，赋予文化以和自然资源相对的‘人文资源’的意义，就意味着要将文化的一些内容凝结物化、商品化。费孝通非常支持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发展文化产业。

2000年8月，费孝通到昆明参加“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二次高级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如何保护、利用人文资源的问题：“我们不能用主观主义的态度，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取消民族文化。但是，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把那些进步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益于民族发展的好东西总结出来，然后考虑用什么形式来宣传、展览和演出。我们要把好的东西拿给大家看，先要自己搞清楚什么是好的，要能够讲出来，这就需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的人才。”[52]他希望云南省能够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旅游业，满足中国先富阶层和来自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观光客对

51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65页
52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64页
53 费孝通：《故地重游多新见》，载《群言》，2000年第12期

“香格里拉”或“桃花源”的向往之情。

关于开发民族旅游业对增加少数民族的经济收入和维持少数民族文化生命两方面的影响，费孝通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这次重游故地，我在大理喜洲镇、严家大院，在丽江黄山民族旅游村的农户家里，都欣赏到有着浓郁的白族和纳西族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和歌舞表演，当地的老百姓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而增加了收入。但是，这些地方热热闹闹的市场氛围，使我感觉到现代商业化的气息正在挤进来，当初洱海边那种清新、静宁、朴素的味道已经不容易找到了，自然景观依旧，早年的感受全无。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怀念那种气氛的。我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新兴的旅游业如何做到与传统文化相统一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54]民族文化旅游，一方面促进了地域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收入和民族文化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改变了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再生产模式，以及这些族群的生活秩序。在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开发成为西部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是保留民族文化的一种“现代的”、较有效的方式。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诞生

费孝通长期研究民族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讲中国历史以汉族为中心，研究民族的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工作者普遍认为其研究对象就是少数民族，这两者之矛盾被认为是常态，费孝通存在疙瘩却未能解开。如他所言：“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括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55]1988年上半年他接到Tanner讲座之约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讲演，讲什么呢？出于他对民族研究的留恋，他决定以郁积多年的这个民族困惑为题准备讲演稿，一是试图释疑，二是希望把自己思考了多年的见解（如20世纪50年代初综合性介绍各民族历史的讲稿中蕴藏的观点）贡献给世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连开对他的决定给予了大力支持，向他提供了手头存有的全部论著资料。是年，他利用到山东威海暑休机会，一气呵成，写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于当年11月在Tanner讲座上公诸于众。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讲演的最杰出贡献是，他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历史与过程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个重要概念。在他看来，“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代的对象应当置于现实和历史两个场景中：“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

54 费孝通：《故地重游多新见》，载《群言》，2000年第12期。
55《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99页。

人民。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他接着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和，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6]他在讲演中还概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六个特点[57]，给人以清晰的认识。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长期历史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在长期的历史中不断融合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基础上混合而成的，正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山到草原上放牧，壮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的文化大熔炉里化成其它民族的一部分”[58]。少数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如藏族、瑶族就包含有许多语言不同的成分，很可能也表明是不同成分互相混合的结果。

因此，费孝通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满、蒙、回、藏、彝、维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的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白玛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汉族中的客家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59]。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展望，深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用个比喻来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60]。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表后好评如潮，在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于1990年主办民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到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日本知名专家共计40多位，讨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

56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81页
57 详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11—416页
58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载《神州》1988年14、15期
59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63页
60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18页

一体理论。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的讨论，最终达成以下共识：“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表现为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大陆上各民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61]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全面坚持贯彻民族政策，重视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使各兄弟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上繁荣发达富强的发展道路，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此次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还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因之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还需要做许多专门课题的研究，才能使“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得到完整的发展。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1990年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日本国也相继举办了以此论文为专题的研讨会，这是对该文学术价值的充分肯定。资深人类学家、台湾东华大学乔健教授认为，该文既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可以作为中学公民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62]对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贡献颇大的陈连开教授表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对民族学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63]陈连开对“中华民族”问题的相关史料曾进行过认真整理，并初步将“多”与“一”的关系概括为“多元集合体”。看了费孝通这个论文以后，顿开茅塞，认为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不易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对于该论文的学术价值，有学者认为，这个理论“可能是首次由中国人类学家基于对中国复杂的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关系所作的长期观察和研究而提出的，一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多民族关系包括其绵长的历史与复杂的文化的‘民族理论’”[64]。

费孝通通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层次问题之后，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

61 邸永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载《学习时报》第189期。
62 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63 陈连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影响》，载《费孝通先生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2009，第126~132页。
64 周星：《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

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65]

总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在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判断、总结和升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的构成格局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65 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思想战线》，2001年第27卷第6期。

第三篇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经济社会发展

第八章　发展农村工业的主张与疾呼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走向，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纷纷投身到救世济民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去，试图通过“实业救国”、“改良运动”、“技术下乡”、“知识富民”等来改造或拯救中国乡村，从中找出中国发展的动力，涌现出各种乡村建设思想。费孝通就是其中一位学术界代表，他长期倾心于“乡土研究”，把发展乡村工业看作是农民增收、中国农村变革的重要主张，并为之疾呼和护植。如今我国农村工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这其中有他的巨大贡献。

一、男耕女织，农工相辅

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曾应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考察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了解与认识。1939年发表的《江村经济》以农村社会组织来探讨乡村工业发展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生动描述了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中国乡村危机。

太湖流域的江南农村，“户户栽桑，家家养蚕”。蚕丝业成为当地农民“上供赋税，下给俯仰”的家庭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和手工业牢固结合，形成“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虽然农民家庭具有较强的自我生产，自发组织能力，但由于地域上的广泛性和农民家庭的分散性、封闭性，千家万户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江村经济》中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又影响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男耕女织是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模式，具有农工相辅的内涵。费孝通在江村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受到传统土地制度的束缚和外来势力及西方新技术的竞争，中国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他明确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

人民的饥饿问题。”[1]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分析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决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2]，“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实际上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3]。

费孝通指出，农工相辅是个基本结构，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强调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为主，工业停留在手工业状态，只有农工相辅，发展乡村工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农民之贫困与饥饿问题。

二、技术下乡，富民之道

技术下乡，是富民之道。费孝通姐姐费达生所在的江苏女子蚕校“以农民为本位”[4]，把科学技术送下乡，成效显著，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蚕桑生产的发展，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费孝通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技术下乡是促进农村变革的重要因素，他不仅长期给予关注，并且积极倡导，付之实践。

江苏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是中国蚕丝业的改革家，为此贡献了一生。20世纪初年，他在日本考察时，看到他们的蚕种优良，蚕茧又大又厚，蚕丝质量好，成本低反观发明了养蚕缫丝业的中国，农村养蚕沿用着几千年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用土种、土法，茧质差，失去了世界竞争力。郑辟疆决心从改良蚕种入手，进行蚕丝业的改革，当时的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对其提出的各种建议都置之不理。1918年郑辟疆到女蚕校担任校长，有了实现此项改革的条件，先后成立了蚕种改良试验部和优良

1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7页
2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8页
3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8-189页
4 《复兴蚕业的先声》，《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246页

蚕种推广部，送费达生等优秀学生到日本留学，培养人才。费达生不负厚望，学成回国即肩负起将改良蚕种、科学养蚕方法和现代制丝技术推广到民间去的重任。

1923年冬，在校长郑辟疆带领下，费达生和张兆贞等四位姑娘下乡，到开弦弓村等蚕区农村宣传科学养蚕知识，推广科学养蚕技术，组织蚕业合作社，打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1929年，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和当地乡绅联合民众，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中国第一个农民办的乡村股份合作丝厂。

费孝通和费达生在《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复兴丝业的先声》，以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论著中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费达生在农村传授科学技术，养蚕办厂的实验历程、影响、困难和问题。改革开始阶段，费达生等在女子蚕校组织和领导下，深入到农户和青年妇女中，谆谆教导她们与传统观念决裂接受新的观念，学习利用科学知识，特别是防治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的科学知识。“为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的幼蚕，按照合作的原则，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称作‘稚蚕共育’。费用和劳动根据蚕主放在公用蚕室内的蚕种按比例分摊”[5]。经过两年的艰难曲折，由20户推广到了全村养蚕户，也就是改良蚕种和科学的养蚕技术被农民接受了。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显而易见，因病而损失的蚕，其数量控制在20%以下，蚕茧的总产量同用传统方法养时相比至少增加40%。1926年，还在村里和其他地区推广饲养秋蚕，使夏秋的桑叶得到充分利用，蚕农增加了收入，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实验被公认取得了成功以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把他们的经验向整个产丝区推广。[6]

同样，开弦弓村蚕农用传统木制脚踏缫丝机生产的土丝，也是质量差，影响了蚕农的收入。查其原因，如纽约丝公所来华调查员陶蒂博士所言：“人民保守旧法，未知科学之研究，机械之利用。”[7]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费达生在郑校长的支持鼓励下，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改革传统缫丝生产方式、方法，于1924年开始推广脚踏缫丝车，短短三年时间，就由最初的10台发展到100多台。为使更多的农民受益，费达生在震泽“蚕皇庙”开办“土丝改良传习所”，广泛地向农家姑娘传授缫丝技术。[8]生丝是纺织工业的原料，对生丝有精确的标准，而手工缫丝难以达到其要求，费达生进而认识到必须把缫丝的科学方法系统地引进农村，“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同时，“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9]。为复兴乡村经济，费达生在郑辟疆的指导、支

5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44~145页。
6 参见（1）《江村经济》，第145页；（2）余广彤：《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9~27页。
7 陶蒂：《论中国丝业之改良》，转引自余广彤：《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第28页。
8 余广彤：《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第29页。
9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41页。

持下，依靠社会技术、资金等的帮助，团结村内的乡绅和农民，创办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中国第一个农民办的乡村股份合作丝厂，于1929年8月5日开工。[10]当年纯利润10807.934元，为鼓励社员和扩大组织，管理者取其70%进行红利分配，社员所得红利相当于他们所购股份的两倍。此后，由于世界经济萧条以及社员合作意向的减弱，丝厂的困难逐步增大，年年亏损。这有许多内生因素，但当时的外部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制约是主要的。丝厂的生产受国际丝价的影响难以预测，虽然他们生产的蜜蜂牌生丝质量好，但并不能保证卖到好价钱。所获微利付银行贷款的利息都有困难，股民的红利分配也就得不到保障，股民希望的利益得不到，其合作的积极性难免下降。

但他们与当时占主导的悲观主义相悖，对复兴中国蚕丝业持乐观态度。他们从经验中认定丝业的复兴是应当向农村去发展，使它成为安定农村经济的副业。“我们相信，在这路上，会有不绝的继续者，而且要在这道路上，获得最后的成功。在这方向，在这精神中，中国要在人类的历史上，再度的放着异彩。”[11]费孝通赞颂费达生等知识青年技术下乡行动的高尚社会价值，即认为“一切科学上的发明，应当用来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应当专为少数人谋利益，甚至使多数人受苦”[12]。以养蚕制丝而言，她们努力把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用来促进生产，使农民获得利益。更赞颂她们宗教性质的服务热忱。她们为中国的蚕丝事业，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在烈日和风雨中奔波，而觉得乐在其中。[13]诚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他们认识到：“农村运动最重大的条件，还是在从事此种运动的人能有服务的热忱和技术上的训练。没有服务的热忱，不以事业的成功为人生中重大安慰者，很不容易到农村中去受种种生活上的困苦。没有技术的训练，就是到农村中去，亦是不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仰，实际上，不会发生什么重大效果的。”[14]

费孝通通过对费达生在开弦弓村传授养蚕制丝科学技术实验进程的描述与分析，预示着乡村工业的未来。1941年9月，费孝通在张之毅所著《易村手工业》“序言(中国乡村工业)”里进一步主张内地农村工业的发展应当走出自己的道路，在技术和组织上发生质变，才能立足于战后的新世界。在技术上，要采用机器与农业相结合适于乡村经营；在组织上作坊工业可采取合作方式，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两有权分散到所参加生产的农民之手，这样既可以避免贫富悬殊，又可使农村保留一切可能保

10 参见余广彬：《费孝通和他的费达生》，第31页
11 《复兴蚕业的先声》，《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240页
12 《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06页
13 参见《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06-107页
14 《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10页

留的乡村工业，共同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他多次谈论费达生当年送科学技术下乡的意义，大力提倡智力支边。他在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十年当中，以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民盟的工作方针（详见第十六章），组织专家学者分期分批坚持在甘肃定西、贵州毕节、河北广宗等地长期进行科学技术扶贫，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深受当地政府和民众赞许。他在家乡吴江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做了许多实事，如从西德引进长毛兔、从澳大利亚引进凤尾菇，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开发和推广，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三、乡村工业，农村希望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是人类工业史上一个富有开创性的实例，乡村工业作为中国农村复兴的起点和基础。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他说：“为了探索强国之路，我接触了农村工业，从此一触引发我的兴趣，一直关注、调查、研究和探索着农村工业的发展。”[15]

1985年，费孝通在盛夏中访问江村和其他7个乡镇，听到了基层干部和乡镇企业厂长银根吃紧的阵阵呼声，他们忧虑乡镇企业的前途，希望费老帮助说说话。不久，他们在《新华日报》看到了费孝通《九访江村》的长文，纷纷争相传阅。费孝通联系实际分析了贷款大起大落的症结所在，以乐观的心态，对乡镇企业的历史传统、现状、发展趋势和农业的规模经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事实和坚定的信念回应了种种猜疑。乡镇企业是由农村副业发展起来的，被费孝通誉为“草根工业”，是农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另一半命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他说：“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力，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他又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草根工业破土而出，它就会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行，这就是说，在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变着农村的面貌。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最终还得去适应自己创造的工业发展。”[16]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15 张毅 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序一，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第1页。
16《九访江村》，《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18页。

在社会发展史上，农业和手工业经历了由相伴到分离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村手工业渐渐以分工的形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草根工业”的迅速蔓延、发展和壮大，乡村工业已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一翼，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工业脱胎于农业也反哺于农业，以工建农，以工补农和兴办多种公益事业，使中国农村从农副工到贸工农相互协调发展，整体促进，呈现出可喜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农村在费孝通的理论指导下，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开辟了一条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尤为显著的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给农村工业化快速发展赋予了新的契机。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联营企业到合资企业，从民营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甚至上市企业。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加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乡村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四、小城镇 大问题

乡村社会的变迁代表着中国历史变迁的方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乡村工业为主导的农村非农产业在小城镇上崛起，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农村社会的分工带来乡村第二、第三产业聚集过程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拓展，农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也迅速下降。但同时给各地乡村的集镇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1982年，费孝通从家乡吴江“破题”，采用实地考察、类型比较、功能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吴江小城镇进行了分析解剖，定性分析提出了“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这10字研究课目，研究探析中国城乡结构、人口分布以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探究从江村到江镇的提升。

费孝通以分类法总结了吴江县域集镇的5种类型，即第一种类型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震泽镇）。第二种类型是丝绸工业中心，具有专门工业的小城镇（盛泽镇）。第三种类型是吴江政治中心的城关镇（松陵镇）。第四种类型是富有水乡特色的古镇（同里镇）。第五种类型是水陆便利的交通枢纽节点（平望镇）等五种类型特征，将县域集镇按行政区地位划分为3层5级。他认为，吴江小城镇一度由盛而衰的症结是当时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小城镇复苏繁荣的根本原因是乡镇工业经济的勃兴与带动。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富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小城镇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成为人口的“蓄水库”而小城镇的集体商业经济尚未搞活，流通渠道有待疏通，小城镇应当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

费孝通认为，他们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他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的大问题，仅仅靠工业化是不协调的，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他指出：今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长期关闭在农村里的大量人口，如果没有缓冲和蓄积这股急流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

新型的小城镇可以发挥拦阻和储积人口流量的有效作用。积极发展小城镇，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考察，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金融、流通等中心，是联结城乡之纽带，是城乡经济协作互补的结合点，是一个共同构成城乡一体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小城镇的地位及作用愈来愈重要，小城镇的发展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将有力促进中国城乡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推动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客观上存在必然的依存关系，小城镇是农村工业化的主载体，带来农村人口的集聚和小城镇规模的日益扩张，也必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了小城镇的功能，增强经济的辐射能力。可以说，农村工业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那么，城镇化就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对此，费孝通提出，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各级政府决策者的高度认同和重视，也推动了国内外对小城镇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的社区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对整个社会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农村大地上，小城镇一改以前衰败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乡镇工商业的发展，迅速地繁荣发展起来了。就吴江而言，空间区位优势明显，小城镇星罗棋布。23个大小城镇分布在1176平方公里，密度为50多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镇，长度间隔6—10公里就有一座城镇，属城镇高密度地区，在全国也是罕见。1983年7月，在费孝通的亲自指导下，对黎里乡、镇试点，进行乡镇合一体制改革，实行镇管村，取得实效。1985年10月又在其他六个县属大镇推开，从而冲破了乡镇分治的壁垒，减少了行政管理权限，有利于小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统一。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至1994年5月，吴江全市的23个小城镇全部成为建制镇，从县乡体制到市镇体制，小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功能逐步完善，小城镇集聚经济要素和经济辐射功能增强，吴江小城镇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吴江小城镇“多子多孙”规模过小，分布稠密，建设成本大，很难再发挥规模经济和带动效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001年至2004年，吴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村镇行政区域调整。23个建制镇、555个行政村和202个社区居委会撤并为10个镇、250个村及49个社区居委会，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一镇一品”产业特色更加明显，小城镇经济社会得到健康发展。

第九章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费孝通在农村和小城镇调查研究的进程中提出来的。为了总结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他积极探索每个地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模式观”。他在《四年思路回顾》中更明确地说明：“我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17]他认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应搞“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费孝通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侨乡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和“耿车模式”等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的概念是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行政管理为主，客观上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存在形式。

费孝通认为“苏南模式”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但是，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就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社会现象。

费孝通对苏南地区的调查总结了四条：一是“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就站不稳；二是“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就富不起来；三是“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就活不起来；四是“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改革开

17 《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81页

放以后，苏南地区成为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江泽民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费孝通还特意提到了“苏南模式”中，乡镇和大城市“藕不断，丝还连”的关联。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迫走入大城市，他们带回家乡的不仅有辛苦赚来的工资收入，还有在工厂里学习到的现代技术和超出地缘关系的人脉资源。1983年，他带领的调查组在苏南四市调查中走访了28家乡镇工厂，他们的创业都与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关，多数是由有乡土关系的城市退休工人或干部牵线搭桥或提供技术力量而诞生的。据无锡市反映，解放前上海的钣金工中有近一半是无锡人，形成了上海机械工业中的“无锡帮”，解放初他们还不断从家乡介绍人去上海，在上海这个工业城市里培训出大批无锡技工，他们中一部分人回来后就发展无锡社队工业，因为这批人与上海各工业系统有种种关系，通得上“路子”。

南通与苏、锡、常都位于长江下游，尽管南通地处长江以北，不属严格意义上的苏南，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与苏、锡、常相近，都随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了工业化时期。在中国近代轻工业奠基人张謇的带领下，南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有“中国近代第一城”之誉。张謇出生寒门，苦读成才，清光绪二十年（1894）成为中国科举制最后一名状元。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产生了“中国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的认识，由此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885年，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并发展成“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股份制企业中大获成功的第一家”。大生实业和无锡荣氏实业、苏州常州的刘氏实业都是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的代表。近年来，南通的发展呈现“跨越赶超、全面协调”的特点，被学界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南通现象”。

费孝通曾总结早期的“苏南模式”特点为：集体所有制，接受大城市辐射，政府经营，离土不离乡，工农相辅。他认为正是这些优点使当时苏南的乡镇企业获得了以小补大、拾遗补缺、适销补需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称为“内发”式的苏南模式发生了新变化，开始逐步吸收外来的资金、技术，呈现“内发”与“外发”结合、与“珠江模式”靠近的新动向，费孝通称之为“苏南模式的新发展”。

费孝通发觉，大约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集团化了，一个县市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它们的共同点是贴近市场，有的还和国际市场紧密相连，其中多数大型企业还实行了股份制。到2000年，吴江市各级政府已基本从集体资产企业中退出，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实现了股份制或民营制改造，企业成了自主的市场主体。费孝通发现，企业改制导致的分流工人办起了家庭工业，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出路，但是不解决全部问题。他主张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工

业要到小城镇集约发展，建设一些中心镇，让一部分农民在最经济的条件下集中到城镇中来，同时要让他们有工作做，能有稳定的收入。

如今的苏南，早已从费孝通当年说的“草根经济”长大为“大树经济”。以他的故乡吴江市为例，工业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主体，并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丝绸纺织、光缆电缆三大产业为主体，以铜加工、电梯、日用化工、服装、亚麻、制鞋、汽车配件以及食品加工八个产业为成长型产业的良性发展型工业结构，连续多年跻身中国县域经济第一方阵。截至2010年初，吴江有民营企业2万多家，累计注册资本551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42.7%。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形成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与当时许多学者、官员不同，费孝通一直力挺“温州模式”。1986年2月27日到3月6日，他带队的全国政协考察团前往温州考察。受计划经济思想所囿，温州地区出现的“家庭工业”受到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种种非议。他这次初探温州，考察了当地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亲身感受到了温州人的伟大创造，称温州的家庭工业是个体经济，是中国历史上旷无师古的新事物。[18]当时一些温州雇主大户还请教费孝通：“政策会不会变？将来会不会来整我们？”他在杭州做的《小商品 大市场》的报告给出了回答，指出温州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商致富”的不同于苏南的新路子。他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详尽地分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充分肯定了“温州模式”，指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带着全国性的普通意义”[19]。他的讲话使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们提起“温州模式”就想起“小商品、大市场”，这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1994年11月，费孝通二访温州，写下了《家底实 创新业》的文章，再次力挺“温州模式”。1999年后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温州，发表了《筑码头 闯大下》，阐发了敢闯敢拼、勇于争先的温州精神，指出温州人远洋出海需要一个大大的码头，中国人远洋出海需要一个更大的码头。

18 参见《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67–468页。
19 《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61页。

“温州模式”是有历史根源的。费孝通认为，温州和苏南历史条件不同，它不可能发展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想，是把温州人搞苦了的。后来到80年代，国家政策改变了，允许农民搞贩运，搞流通，搞商业，温州人的老祖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有的从甲地买了东西到乙地去出卖，来回地倒。1986 年，费孝通初访温州调查时发现，“个体商贩合法化后温州人民才得到了用武之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 万，其中经商的约10 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20]，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

费孝通十分佩服自强不息的“温州精神”。他曾说到：“这种发展模式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他们走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一次，费孝通到海边金乡镇去参观，看到家家户户在做贴在用具上的塑料标号，其中有一家所做的标号是人民大会堂，隔壁一家却是在做乌鲁木齐的一个工厂的标号。这个小镇的手怎么会这样长呢？费孝通联系到他在柏林所遇见的温州侨胞和在内蒙古、甘肃街头的成衣铺、修鞋铺，以及在北京街头背着棉花胎叫卖的温州年轻人，发现原来温州有十万大军遍布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和商品流通网，这个网就奠定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网，在海边角角上的一个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机器，男女老幼都有了工做。而且在温州，个人收入分配出现了“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城里人不如乡下人”的现象。“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放手发展“家庭作坊”、“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模式，是一个“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模式。

费孝通认为，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渠道的不畅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前进的主要矛盾之际，温州依靠十万购销员和十大专业市场所组成的民间商品流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流通环节上联系了起来。“温州模式”再次证明，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动力源于亿万群众的创造。

浙江人外出谋生是有历史传统的。1937年夏，费孝通从伦敦到柏林和哥哥一起度假时，了解到柏林城里就有上千的温州人，挨门挨户的送货上门，零售小商品。1938年，他经法国回国，在从马赛到上海的轮船上，他结交了不少原籍温州的回国侨胞，其中一位老人给他很深的印象。这位老人年轻时出家门，到欧洲做小买卖，挣钱养

20《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57页。

家，已经在家乡造好了两座房子和自己的坟墓，这次回去是想落叶归根了。可见，一个地方解决生活问题独特的方法都是由来已久的。

如今，我们已经在关注“浙江现象”。客观地说，“浙江现象”的形成是温州模式在全省扩展的结果，而作为描述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经验与成就的“浙江模式”，就是扩展、更新、修正、成熟后的“温州模式”。

三、“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的概念是指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格局，内外资金和技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费孝通告诉我们，要理解“珠江模式”，首先就要懂得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历史联系。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既无农业又无像样的工业，主要靠作为中国大陆与外部商品的转运站而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对我国经济封锁，割断了港珠之间的联系。香港只有靠从上海移入的工业力量加上珠江三角洲过来的劳动力兴办小型制造业，在一个一无原料二无大市场的孤岛上开创了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企业形式。改革开放后，香港重新恢复为大陆的南大门并成为大陆对外贸易最大的通道，而且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对珠江三角洲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

广东境内西江、北江、东江三条江在广州汇合成珠江，南流入海，珠江两岸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上原来的四市十二县，1985年被划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珠江三角洲。1985年，费孝通访问香港时已经对“珠江模式”有所认识。他在访问回来所写的《港行漫笔》中讲到：“从观塘的‘蜂窝厂家’出来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我有孙悟空的本领，真想一口气把这密密麻麻挤在多层大厦里的许多工厂，吹散到内地广大的农村去。那么，这些‘蜂窝厂家’不就成了无数的乡镇企业了吗？”[21]这里的“蜂窝厂家”是指这些工厂都挤在多层大厦里，一层楼里可以有好几家小工厂，一个老板可以有好几家甚至几十家工厂。1988年底，费孝通访问东莞，他惊奇地发现原来他的突发奇想已经成为了现实。他认为，这是当隔着两地的政治屏风一撤走，香港和大陆两地工资和地价的差额所形成的那一股经济风不可避免地就刮了起来，香港的工业正在扩散到珠江三角洲。

从1988年到2003年的15年里，费孝通对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先后共赴广东十一次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其辐射区进行追踪调查。他总结“珠江

21 《港行漫笔》，《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280页。

模式”的特点主要是：珠江三角洲首先接受港商采用“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引进了现代工业，培养了人才，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外资和现代技术、经营方式嫁接上乡镇企业，扩大了合资企业的范围和方式，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繁荣了地方经济，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他同时强调，“珠江模式”是“外向型”的，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主体也有部分在外,因为掌握着经营管理权的并没有脱离它原来的中心，利润主要部分也是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他认为，这种攥在别人手里的“大进大出”，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的问题，如何掌握经营主动权，提高经营大市场的能力，把主要利润拿到手，是珠江模式转型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他指出“珠江模式”要“从造船出海”再前进一步，以争取更大利润和自主权。他强调，我们既要善于“借脑袋”，更要学会“造脑袋”，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用文化和教育“两条腿”来支撑跳跃，这样才能在后工业社会的“权力游戏”里掌握主动权，争得更大的利益。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要保证将来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就应该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也要更多更好地考虑建立、推进和带动内地经济腹地和加强贸易中心的建设。

四、“侨乡模式”

“侨乡模式”的概念是指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有着更为宽广的发展前景，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

费孝通指出，“侨乡模式”源于赴海外出卖劳力的侨胞。早期的侨胞大多是出身穷困的劳动人民，他们迫于冻馁而飘洋渡海，出外谋生。他们从国外汇回的“侨汇”，不仅是维持侨眷生活的基本依托，也构成了侨乡经济的重要来源。侨胞中的一些人经过长期的勤俭节约，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在国外站住脚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的在家乡搞起了修桥、铺路、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办起了企业。

费孝通进一步分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汇率差价越来越大，侨胞觉得把外币直接带进来到国内黑市里换成人民币结算更合算，形成“以钞代汇”，后来侨胞觉得把钱直接给侨眷在国内买东西不如在国外市场买了东西带回来更合算，形成“以物代钞”，这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侨乡经济，尽管这对国家是有损害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家政策改变，允许侨胞免税带进大小包件，于是侨胞带进和邮寄到侨眷这里的物资大量增加，超过了侨眷自己的需求，侨眷将多余的物资摆摊当商品出售，客观上形成了洋货市场。福建石狮就是最早出现的洋货小商品集散地。

精明的商家也从洋货的热销中看到商机，开始建立小作坊仿制“洋货”出售。先

是侨眷把积攒下的侨汇合股聚资办厂，再是侨胞以帮助侨眷办厂的渠道向侨乡投资办厂。短短几年，福建沿海乡镇中各种形式的侨资企业遍地开花，甚至发展到和国际财团结合进入国际市场的水平。

在后来的调查中，费孝通在福建福清县看到了另一种发展方式，就是由侨胞中有实力的财团有计划地集中投资建设成片的工业小区。这些工业区里的以现代技术和设备建设起来的中小企业走在乡镇企业的前列，它们的起点比较高，而且和国际市场关系紧密，为侨乡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子。

费孝通认识到，从“汇款养家”、“热心公益”、“以钞代汇”、“以物代钞”到“赠品上市”、“国产洋货”，再到“合股办厂”、“侨资企业”和“侨资工业小区”是一个顺理成章、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一种促进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新模式——“侨乡模式”。

费孝通认为，福建打的“侨牌”效果比较明显。他认为，“侨乡经济”是千年来我国侨胞一贯坚持的侨心的一种新表现。它越过赡养侨眷、办学校、办公益的门槛，踏进了用侨资开发侨乡，发展侨乡经济的新时代。

五、“民权模式”

“民权模式”的概念是指利用本地资源和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经济发展路子。费孝通特别赏识这种深入到千家万户的致富道路。

1987年4月和1991年9月，费孝通两赴河南省民权考察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条龙是果农专业户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酿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他指出，民权的加工工业就是以葡萄酿酒和以柳枝蒲苇编织开始的，他们先开发“草根资源”后发展“草根工业”。草根资源指的是土地所生长的植物资源，不仅是粮、棉、油等大田作物，而且包括林木、果树、灌木、蒲苇等等一切可以用来加工的原料。草根工业就是利用这些草根资源的加工工业。这两个概念比通常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范围宽泛一些，却正切合民权的特点。

费孝通总结说，企业和果农的结合正是“民权模式”的一个特点。厂方根据市场的需要选择不同品种的葡萄，发放给果农培植，取得原料，酿出名酒。民权名酒产品种类多，就得力于对原料的控制和不断改良。为此，民权建立了国营、集体和个体的三级联营制。酒厂为了避免收购时的拥挤，帮助各村、乡建立集体所有的葡萄发酵

站，使几万家果农不必在葡萄成熟的短期里把易于损耗的产品集中向酒厂交货，他们可以就近把葡萄运到自己村或乡的发酵站进行初加工，酒厂按计划向发酵站分批调进果汁进行深加工。这种三级联营制促进了村乡集体企业的发展，增加了村乡集体组织对葡萄栽培和酿酒业的积极性，密切了工农结合。后来，正如费孝通预想到的一样，"民权模式"按照发展的规律，走出了"草根"的范围，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六、"耿车模式"

"耿车模式"是指在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以提高农村收入为目的，走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以加工工业为主，来发展家庭工副业路子的经济发展模式。

费孝通总结到，"耿车模式"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四轮齐转，双轨并进"。所谓"四轮齐转"是指乡、村、联户（联合的农户）和户四个层次同时办企业。其中的乡、村两级企业是集体所有制，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是个体所有制，这就是"双轨并进"的含义。

当时，我们国家的企业分很多层次。一是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原料国家给，产品国家销，按计划办事；二是准国营企业，部分原料国家给，部分产品国家收购，部分是在国家计划之外；三是"二轻"企业，就是以前各种合作社合并起来的轻工业，他不能进入国家计划经济，不能由国家供给原料；四是计划以外的集体企业，国家不投资，不给原料，不包市场，他们尽量想办法和计划经济挂钩，希望为国营企业制造零部件等，尽可能取得一些国家供应的原料，但绝大部分是计划之外，各自核算，自负盈亏。

在计划之外的企业里还有个体专业户和专业户联合体，前者属家庭工业，后者属合作工业。家庭工业是一家一户搞的小规模的简单工厂，这种简单工厂联合起来，叫做联户。联户实际已进入合作性质的经济。最初的联户大体上依托亲属关系联合起来的。这种联合如果再进一步扩大，就突破了亲属关系的限制。当时耿车乡大的联户企业据说有100户成员，这实际上成了民间的集体所有的合作组织，但他们不是政府所有，仍旧是在计划之外。

各种企业，总起来，可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完全或不完全的计划经济里面的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第二是国家基层政权所有的，但在计划之外的乡镇企业，被称作是集体所有制；第三是个体企业和集体所有的合作企业。个体企业实际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企业单位，它需要借助外在的流通和服务网络。流通网络有几种方式，一种由个体户形成，一个一个人分别出去拉生意。如当时耿车乡有个老汉，因为他在山东有熟人，就可以包三个儿子的产品到山东去卖，他有力量的话，还可以包的更大一点。他已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去跑码头，自己不做工了。这种人也可以成为专业

化，即所谓商业专业户、流通专业户、贩运专业户。当时，耿车乡产生了一种集体的服务机构，机构名称叫“两户一体服务站”或“农民企业服务站”。“耿车模式”的关键特点就是在个体户上产生了一层集体服务机构，造成一个草根工业的双层结构，这里的个体户不是单纯的个体户，而是依附于集体经济的个体经济。

费孝通认为，耿车模式并不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简单相加。在基本特点上，耿车模式既不具备苏南模式集体经济的基础，也不具备温州模式的大市场。耿车模式在所有制上是集体和个体一起上，而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没有做到这一点，苏南模式中家庭工业这一块太小而温州模式中集体经济没有家庭工业发展的快。其实，“耿车模式”代表着不发达农村地区的一种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

费孝通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化的技术，二是能人要多一些，三是要扩大社会性的服务，搞商品经济必须有市场观念，四是对外开放，要抓紧利用外边的力量、外边的市场、外边的购买力。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许多现实意义。

在1998 年前后席卷全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中，乡镇企业剧烈分化，耿车也“四轮并一轮，两轨成一轨”，宣告了原有“耿车模式”的终结。当初红极一时的“官营乡镇企业”陆续转手他人，包括装饰板厂在内的原镇办18 个企业的产权全部卖出，个体私营经济从此一统耿车天下。

七、费孝通的“模式观”

在总结了多个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后，费孝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评价标准和“模式观”。

在模式的评价标准上，费孝通在《小商品　大市场》中提出：“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它模式，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古来所无的。惟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惟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22]这个标准是和费孝通“志在富民”的理念相吻合的，也是当时中国国情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费孝通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反对单搞一个模式的，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因地制宜　多种模式》中说：“苏南主要是靠兴办乡镇企业，所以说‘无工不富’，洞庭湖区却是先从搞大农业富起来，进一步再搞工业，可以说是‘先农后工’，这说明

22 《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67页

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能单搞一个模式，而必须因地制宜、多种模式。”[23]他认为，不仅在发展工农业的重点、先后上，各地因不同的条件可走不同的路子，就是在人多地少，农业不易发展的地区，也就是无工不能富的地区，搞什么样的工业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他强调，各个地区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要在参考其他地方经验的基础上找出自己的优势，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费孝通用发展的观点对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他强调要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他在《四年思路回顾》中也讲到：“模式在概念上应当和样板区别清楚，不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因为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应当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文革’期间的‘学大寨’是一个不应当忘记的教训。”[24]后来，他也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最近的10年里发展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看来追踪调查很有必要。认识本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事实在发展，认识也该跟着更新。”[25]他认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

随着客观实际的进一步发展，模式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过程。费孝通先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观点，后来又加上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他说，“模式”两字不是严格的概念，其实就是口语中所说各式各样的“式样”。“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他地区简单地去模仿，这样提法只是为了着重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要互相学习，不要照抄硬搬。他之所以总结出那么多模式其实是为了引导人们关注和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让人们学习和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达到“富民”的目的。

23 《因地制宜 多种模式》，《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598页。
24 《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81页。
25 《珠江模式再认识》，《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280页。

第十章 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在东部沿海地区研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过程中，提出了多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虽然这实质上是一种区域研究，但他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概念。但在边区开发研究中，他的认识提升了。1987年，经过实际考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河州故地建立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并实施。他说：“这个建议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标志着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丰富了我社区研究的内容。”[26]由此，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宏观研究的新层次。这是他认识社会不断深入的结果，也切合了现实发展的需要。他从全国一盘棋出发，超越行政区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设想，为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贡献了宝贵的意见。在费孝通的论著中，区域经济、经济区域与区域发展等概念是在同一意义上运用的。

一、“区域发展”概念的提出

1984年以后，费孝通的研究既“横向扩展”，又“纵深发展”。他从东南到东北，再进一步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他从农村、小城镇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最后研究区域发展，直至研究整个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他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27]。

费孝通进一步强调，一个经济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他说：“如果用一个人体来比喻，就是要有一个‘心’、一个‘肚子’、一张‘嘴’，还要有‘脉络’。‘心’就是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众多的农村、市镇和其中的

26 《农村、小城镇、区域协调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8-209页
27 《农村、小城镇、区域协调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8页

农田、工业企业，‘嘴’就是出口，可以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产物出纳吞吐自如，以对外贸易来讲就是进出口岸，‘脉络’就是交通运输的渠道、通信联系和交通网络”。[28]一个经济区域必须具备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以众多农村和市镇为其腹地，进行生产和消费。腹地和中心，腹地内部村镇之间要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是一个经济区域赖以生存的流通渠道。中心城市、村镇腹地、流通网络、海陆空的出口是构成一个经济区域的基本内涵。

费孝通解释道，经济圈或经济带等是区域发展的延扩，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区域是城乡协作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也可以各有其发展模式。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费孝通十分关心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这里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他进行“江村经济”研究并走出去的地方。他曾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这一地区的发展建议，比如《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就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问题与江苏、浙江、上海党政领导座谈的情况汇报》、《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关于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建议》等。他十分关注两大经济区的建设——上海经济区和南京经济区。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纳入苏南地区，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他也十分看好联结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城市且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他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天空。

费孝通强调，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能够得到重视与扶持，不仅能迅速壮大自身，而且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他对上海浦东开发寄予厚望，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29]

28 《区域经济浅谈》，《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367页。
29 《长江三角洲之行》，《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3页。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费孝通通过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受到了高度重视。4月10日，江泽民主席特意安排专门听取费孝通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当时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和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也在场。费孝通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状况说起，他说，那里经济发达，又有人才、管理、信息、交通等多方面的优势，过去人们称上海是“大上海”，并不是指上海的面积大，其实就是指它的地位、作用、实力大。上海应该成为大陆的香港，应该成为一个集外贸、金融、科技、航运、信息为一体的中心。费孝通进一步谈到，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开发区要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铁路大动脉与西北原材料基地及三线所蕴藏的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恢复它在东亚的应有位置。在费孝通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江泽民总书记一直认真地听着，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要点。这次会谈更激发了费孝通的干劲，随后他就又踏上了赴江浙沪考察的征程。

1999年11月，费孝通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勉励上海要放长眼光，拿出大气魄，做腾飞巨龙的龙头。他说：“上海要真正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中心，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还必须联合其周围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这八员大将。可是上海到现在还没有看准这一点，因而还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把上海的技术资源扩散出去。上海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帮助身旁的八员大将发财，水涨船高，上海的地位会因此更加提高。上海如果只是一心想搞好本地经济，我看就像回到了‘小渔村’的时代了。”[30]费孝通这样说不是无凭无据的，就在当时的前些年，费孝通发现上海附近的昆山想借上海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经济，上海就制定了许多办法来限制两地的交流，以为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费孝通认为，这种上海的小家子气表明他们还没有摆脱传统的乡土经济观念，实际上流出去的“肥水”，在外面发展以后又会流回上海，给上海带来好处。费孝通再次强调，搞经济工作要有一种大区域的观念，一个地区要发展必须靠经济中心，然而，经济也要为自己的腹地服务，这个服务将会使腹地能够更好地接受中心的辐射。

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号），进一步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决策部署。规划范围涵盖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规划以上

30 《培养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101页。

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为核心区，统筹两省一市发展，辐射泛长三角地区。该规划要求长江三角洲地区要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努力建设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引领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同时，江苏沿江开发战略获得批准实施。

长江三角洲的规划出台，沿江战略的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以及近几年来日益受到江浙沪政府、民间重视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无一不是费孝通首倡其议、奔走努力的。今日长三角的发展正是费孝通昨日的期盼。

三、费孝通与泛珠江三角洲

从1988年到2003年的15年间，费孝通对珠三角地区及其辐射区进行了多次的追踪调查，对珠三角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92年，他考察了广东省顺德、东莞、番禺，并写下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一文。2003年9月，他赴广州、东莞、深圳访问，了解“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签署后，广东省在推动包括粤港澳在内的“泛珠江三角洲”（9+2）计划的实施情况。他指出，珠三角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深化香港同珠三角的经济关系，推进港珠经济一体化，协调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增强“珠江模式”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共同繁荣的“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

费孝通分析了香港发迹的历史。他指出，香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楼房林立，宛如混凝土大石林，车水马龙，国际往来频繁，真是财大气粗，派头十足。其实，香港能有今天，是吃了大陆“封闭”饭一下子肥起来的。他说，“20世纪30年代，香港比上海差得多，没有多少人想去。我那时出国路过香港，它还不像个样子。城市破破烂烂，临海的几条街道到处是鱼腥味。人们穿着木屐来来往往，嘈杂之声闹得行人掩耳侧目。直到60年代初香港仍不如上海。但是在后来的10年至15年里却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主要是搞转口贸易、金融流通以及种种投机倒把的地产生意。再后才办起了一些小工厂。到了‘文革’期间，大陆去了不少人，办了许多小企业，给香港带来很大好处。但是香港地盘小，劳力有限，毕竟不是办工厂的地方。近五六年来，在大陆开放的政策下，他们把工厂扩散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三来一补’，取得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赚了不少利润。香港把它的工业扩散了，但是贸易、金

融、信息和运输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却牢牢把住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发了大财。”

费孝通进一步调查了香港在经济上的扩散能力。他带着这个问题到了海南岛，到了广州西北的梅县，又去了广西的桂东等地。他说：“我看到的是这股港风正在吹向珠江三角洲的外围。翻开地图来一看就可以明白：从香港这个中心向大陆扩散，像波浪般形成了若干层次的同心的环形地带。第一环是深圳和珠海，这些地方现已成立了经济特区。再向里，第二环是广州附近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这四个县。他们已被称为突飞猛进的‘四小龙’。”同时，他认为香港的这阵风已经吹进了第二环，而且会继续扩散，这并不取决于香港的实力，而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和投资条件。

费孝通进而提出了“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经济中心辐射扩散开来的将有三个环形地带，而且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 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外围，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港珠经济一体化”和“澳珠经济一体化”，2003年6月和10月，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政府先后签署了CEPA，总目标是以提高香港、澳门和内地之间经贸合作水平以实现共同繁荣。这从制度上标志着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经济区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正式成立，并且将由“自发合作”走向“自觉合作”。

费孝通特别主张理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因为他认为这将解决“南中国的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心城市的兴衰直接影响着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首先要理顺相关城市的定位和功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经济区域内来思考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心城市要勇当主角，其它城市要甘当配角。比如香港要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澳门则要定位于国际性的休闲娱乐博彩业中心。他多次提到一个问题：“香港回归后需要考虑的是研究大陆如何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香港的经济、金融、商贸和企业经营方式来提高全国的经济实力，而且要研究大陆在接受香港经济辐射时如何建立香港的经济腹地的问题。”他认为这不仅关系到香港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华南经济区内深圳和广州两大城市的发展，甚至整个华南经济区和中部经济区的发展。

2003年，费孝通与北京大学研究人员讨论新世纪港珠关系进入新时期时提出：“这不仅仅是香港与珠三角两家关系的问题，它还会牵涉到华南地区的区域经济问题。”他认为：“相关区域应该可以联合成为以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带动的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泛珠三角”合作正是这种“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的现实实践。目前，广东省已经进行了“双转移”，就是广东省沿着“大珠三角”和周边省区的物流

路线向邻省进行产业转移与合作，使物流路线成为增长轴，增长轴上的一些重要城市将成为新的增长极，并成为区域内的次辐射中心，从而也形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与“大珠三角”和广东省有联系的云、贵、川地区将接受次辐射中心的辐射，形成“泛珠三角”的半紧密层。而通过这一系列辐射扩散作用，“泛珠三角”可以建立起更广阔的经济联系，比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京广线和京九线沿线地区、长三角地区和西部地区。

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泛珠三角”，这正是费孝通经济区域发展思想“随机应变”的体现，也只有将发达的交通和物流网络与“泛珠三角”联结为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才能实现费孝通“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夙愿。

四、“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

1984年后的十多年间，费孝通走遍了北方环渤海区域，足迹遍布唐山、天津、大连、锦州、秦皇岛、烟台等地，经过反复考察论证，他提出了“发展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的著名论断，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

1993年9月26日,费孝通专门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他认为，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纽带。我国东北亚地区具有地域和经济上的优势,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前景，这就突出了环渤海地区的战略地位。环渤海地区的自身条件具有加快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独特的港群优势和广阔的腹地，交通网络密度在全国最高，科研人员数量占全国的37%，铁矿储量、棉花和石油生产分别占全国40%、40%和45%，作为国家历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重点，环渤海地区在占全国5.1%的国土面积上,创造着超过全国1/4的工业产值,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信中，他分析了制约环渤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因素：一是缺水问题；二是能源不足问题；三是适应国际高新技术发展而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的难度；四是我国南北方改革力度的时间差造成的政策投入不足，使该地区的潜在生产力有待充分释放。加之环渤海地区内的省市原来分属于三个经济区（华北、华东和东北），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协作与交流，经济上缺乏互补性的局面还有待改观。他针对切实加快环渤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主要有：一是在统一规划、优势互补、外接国际、内联腹地的方针下,以环勃海地区为振兴我国老工业基地的试点，给予充分的政策投入，引导其转换机制,提高技术含量，并适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充分释放生产能力；二是建议设立环勃海开发银行,并考虑开设北方证券中心，拓宽融资渠道，有效地吸收国内民

间闲置资金和外资，以利缓解大规模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三是扶持环渤海地区联手发展电力与交通事业，利用集资、股份等多种方式兴建电厂、铁路以及公路联网，加快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的跨海铁路轮渡建设，积极论证海底隧道方案，及早形成现代化交通系统，提高生产和流通效率；四是创造整体开发环渤海地区的条件，促进区内区际联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可先从区内各省市自身的联合起步，向省际协作发展，再与内陆地区联合，带动广大腹地；五是借助并强化港群优势，加快港口建设，发展区际交通，口腹相连，形成网络。按照邓小平同志“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的思路，考虑增设和扩大保税区，按照国际惯例运营，增强其外向素质，提高其接轨起点，扩张其辐射实力。

费孝通特别强调，作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城市——天津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是最大有作为的。他十分关心天津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进入21世纪，必然要出现几个大的经济区域，从目前看，有三个已经可以基本明确了，就是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为龙头的华东、长江流域经济区和北方的环渤海经济区。在这三大区域中，华南的珠江三角洲和华东的长江三角洲，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的原因，发展相对较快，龙头作用比较明显，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有不断向纵深和向北推进的势头。而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核心还不明显，对该地区整体经济的拉动缺少强有力的动力。而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对保持中国的东西、南北经济发展相对平衡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天津是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一个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国际性港口大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担负着广大腹地对外联系的枢纽和窗口作用，而且它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良好，交通通信比较发达，科技实力雄厚，特别是有着大片的优于上海浦东的待开发土地，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认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京津冀联合，在发展中形成一个中心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天津要主动地为首都服务，为华北服务，为环渤海地区服务，以服务求联合，求发展，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

1994年9月，费孝通带领大批专家到滨州等地考察黄河三角洲的发展情况。他在《滨州讲话》中提出，我们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北部也应该有一个经济中心，那就是黄河三角洲”。他说，历史上黄河三角洲没有得到开发，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黄河入海口经常摆动，不过很多专家认为通过治理可以保证50年之内黄河入海口不会摆动，这就给黄河三角洲开发奠定了基础。他指出，我

们要把黄河周围的地区都包括进来，建立一个开发区。他一直很关心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在《三访滨州》中，他指出，黄河三角洲是一块宝地，资源丰富，必须要以主要靠我们自己力量来开发的原则，学习国内外的经验。他进一步表示，对于滩涂的开发，我们可以学习黑龙江省开发北大荒的做法，也可以向国内外各界引资，共同开发滩涂。

费孝通通过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建议递交后不久，山东省东营市来人找民盟商量具体的开发方案。原来，中共中央已经把建议转到山东省委，东营受命着手具体规划，在胜利油田开发后期如何利用地面资源，发展后备企业，以保证这个地区一旦石油枯竭经济仍能继续繁荣。

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此为起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包括山东省的东营、滨州和潍坊、德州、淄博、烟台市的部分地区，共涉及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山东省的1/6，总人口约985万人。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地理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具有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良好条件。加快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不仅关系到环渤海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也关系到环渤海和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

六、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

沧州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北靠京、津，东临渤海，南面与山东德州接壤。费孝通关心沧州的发展，曾多次访问沧州并向中央提交《关于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1992年11月，他赴沧州调研，回来后他在所写的《沧州行》中指出，他曾在日照提出日照港的腹地问题，在黑河提出口岸和腹地的问题，他认为，口腹相连才能发挥出经济效益，千万不要见口不见腹。党的十四大报告把神黄铁路与三峡工程等并称为我国跨世纪特大工程，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条铁路通道，而黄骅港则是一个运煤的专用码头。

费孝通敏锐地指出，有路有港但沿路地区经济并未发展起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要树立区域发展的观念，以黄骅为出口，及早为它开辟一个广阔的腹地，把黄骅建设成为一个国内外贸易的商埠。他认为要把黄骅建设成一个“码头货如山，贸易通四海”的经济中心，并依靠这个中心发展出一个交通方便、信息灵通、金融活跃、工厂林立的华北经济区。他还对黄骅的腹地进行了研究，认为黄骅港需要一个广阔的腹

间闲置资金和外资，以利缓解大规模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三是扶持环渤海地区联手发展电力与交通事业，利用集资、股份等多种方式兴建电厂、铁路以及公路联网，加快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的跨海铁路轮渡建设，积极论证海底隧道方案，及早形成现代化交通系统，提高生产和流通效率；四是创造整体开发环渤海地区的条件，促进区内区际联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可先从区内各省市自身的联合起步，向省际协作发展，再与内陆地区联合，带动广大腹地；五是借助并强化港群优势，加快港口建设，发展区际交通，口腹相连，形成网络。按照邓小平同志“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的思路，考虑增设和扩大保税区，按照国际惯例运营，增强其外向素质，提高其接轨起点，扩张其辐射实力。

费孝通特别强调，作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城市——天津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是最大有作为的。他十分关心天津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进入21世纪，必然要出现几个大的经济区域，从目前看，有三个已经可以基本明确了，就是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为龙头的华东、长江流域经济区和北方的环渤海经济区。在这三大区域中，华南的珠江三角洲和华东的长江三角洲，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的原因，发展相对较快，龙头作用比较明显，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有不断向纵深和向北推进的势头。而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核心还不明显，对该地区整体经济的拉动缺少强有力的动力。而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对保持中国的东西、南北经济发展相对平衡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天津是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一个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国际性港口大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担负着广大腹地对外联系的枢纽和窗口作用，而且它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良好，交通通信比较发达，科技实力雄厚，特别是有着大片的优于上海浦东的待开发土地，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认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京津冀联合，在发展中形成一个中心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天津要主动地为首都服务，为华北服务，为环渤海地区服务，以服务求联合，求发展，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

1994年9 月，费孝通带领大批专家到滨州等地考察黄河三角洲的发展情况。他在《滨州讲话》中提出，我们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北部也应该有一个经济中心，那就是黄河三角洲”。他说，历史上黄河三角洲没有得到开发，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黄河入海口经常摆动，不过很多专家认为通过治理可以保证50年之内黄河入海口不会摆动，这就给黄河三角洲开发奠定了基础。他指出，我

们要把黄河周围的地区都包括进来，建立一个开发区。他一直很关心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在《三访滨州》中，他指出，黄河三角洲是一块宝地，资源丰富，必须要以主要靠我们自己力量来开发的原则，学习国内外的经验。他进一步表示，对于滩涂的开发，我们可以学习黑龙江省开发北大荒的做法，也可以向国内外各界引资，共同开发滩涂。

费孝通通过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建议递交后不久，山东省东营市来人找民盟商量具体的开发方案。原来，中共中央已经把建议转到山东省委，东营受命着手具体规划，在胜利油田开发后期如何利用地面资源，发展后备企业，以保证这个地区一旦石油枯竭经济仍能继续繁荣。

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此为起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包括山东省的东营、滨州和潍坊、德州、淄博、烟台市的部分地区，共涉及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山东省的1/6，总人口约985万人。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地理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具有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良好条件。加快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不仅关系到环渤海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也关系到环渤海和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

六、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

沧州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北靠京、津，东临渤海，南面与山东德州接壤。费孝通关心沧州的发展，曾多次访问沧州并向中央提交《关于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1992年11月，他赴沧州调研，回来后他在所写的《沧州行》中指出，他曾在日照提出日照港的腹地问题，在黑河提出口岸和腹地的问题，他认为，口腹相连才能发挥出经济效益，千万不要见口不见腹。党的十四大报告把神黄铁路与三峡工程等并称为我国跨世纪特大工程，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条铁路通道，而黄骅港则是一个运煤的专用码头。

费孝通敏锐地指出，有路有港但沿路地区经济并未发展起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要树立区域发展的观念，以黄骅为出口，及早为它开辟一个广阔的腹地，把黄骅建设成为一个国内外贸易的商埠。他认为要把黄骅建设成一个“码头货如山，贸易通四海”的经济中心，并依靠这个中心发展出一个交通方便、信息灵通、金融活跃、工厂林立的华北经济区。他还对黄骅的腹地进行了研究，认为黄骅港需要一个广阔的腹

地，首先是黄骅市，然后向纵深发展，沧州、河北，南连徐淮，西出太行，构成一个大区域。当港口和腹地“口腹相连”，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时，黄骅港才会成为一个和大连、天津、烟台并立的渤海湾海岸的大商埠。他将带动腹地和我国中部地区向纵深发展。

2010年8月18日，河北黄骅港通过一年半的建设已由单一煤炭港升级为综合大港，黄骅港由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杂港区、河口港区四部分组成。预测到2015年、2020年黄骅港的吞吐量分别为2.8亿吨、3.65亿吨。按照《黄骅港总体规划》，它的定位为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港口，环京津、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隆起带。

七、东北亚经济开发区

费孝通在东北考察时提出，“中国有几个大的经济区域，一个是华南经济区，包括香港，带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华东经济区；今年又提出京、津、冀的联合来带动华北经济区的发展”。那么，东北怎么办？“在21世纪到来之后，东北亚必将成为中、俄、日、韩、美经济竞争的一个热点”。他建议将东北亚建成一个经济开发区，而且作为经济区，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城市，一个广大的腹地，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又要有一个出海口。交通是血脉，血脉要流通。

费孝通强调，牡丹江是东北亚竞争中的前哨阵地，应该得到扶持尽快发展起来。他指出，牡丹江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线有200多公里，市区距边境线仅130公里，距俄罗斯远东重要基地海参崴340公里，距扎鲁比偌港500公里，辖区内有绥芬河、东宁两个国家一级口岸，与虎林、密山和吉林的珲春等地构成东北北部口岸群，牡丹江市是这些沿边口岸群依托的中心城市，是我国在21世纪参加东北亚竞争的桥头堡。把哈尔滨建设成一个具备进出港口能力的“内陆港”，也是他关于经济区域要有村镇腹地、流通网络、中心城市和对外出口想法的实践。他建议：一是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全盘考虑，及早做好准备；二是要行使好中国图们江的出海权；三是要根据牡丹江市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身条件，积极扶持它发展成为一个与海参崴实力相当的工商业城市；四是把哈尔滨建设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经贸城，提高我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五是加强中俄间的友好合作，充分利用海参崴已有的港口来促进我国三江平原的发展。同时，他又一次上书“紫光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将牡丹江市列入开放城市和在哈尔滨市建立内陆港的建议》。2008年12月，黑龙江省颁布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发展规划》，提出了加快沿边开放带建设，其中就包括了建设牡丹江（鸡西）沿边开放区和大力发展哈尔滨这个内陆港等内容。

八、加快图们江地区开发和开放的建议

1991年，费孝通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访问。在珲春的时候，他乘车经过夹在俄罗斯和朝鲜两国之间一条狭窄的小路到达边防哨所访问。这里距离日本海仅15公里，而图们江就从瞭望塔下流向大海，这是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入海口。他讲到，我国人民在图们江通航有着久远的历史，清末民初，当地居民一直可以通过图们江出海捕鱼、通商，清政府还在珲春设立商埠，设海关总管，后来在与俄国订立的《北京条约》的划定边界中保留了我国从图们江的出海权。1938年，由于日俄冲突，日军强行封锁了图们江口，从此中国人民被迫中断了图们江出海航行达半个多世纪。

面对已经恢复行使出海权的图们江，费孝通再次讲到他关于经济区域要有村镇腹地、流通网络、中心城市和对外出口的理论。他认为，必须要利用好这个出海口，加快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开放，并加紧确立好相关中心城市，提前为中心城市找好腹地。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主要范围是中国图们江区域的核心地区，即吉林省范围内的长春市、吉林市部分区域（长春市部分区域是指长春市城区、德惠市、九台市和农安县；吉林市部分区域是指吉林市城区、蛟河市和永吉县）和延边州（简称长吉图），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70万人。这一区域面积和人口均占吉林省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二分之一，是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核心地区和重要支撑。按照规划纲要，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将以珲春为开放窗口、延（吉）龙（井）图（们）为开放前沿，以长春、吉林市为主要依托，实施边境地区与腹地联动开发开放，率先突破、率先发展，形成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隆起带和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带动吉林加快发展振兴。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将培育成东北地区新的增长点，并形成先导区与吉林省及国内其他地区协调互动的发展新格局。这明确体现了我国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新模式的基本思路，为我国进一步推动和参与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确立了行动纲领。准确把握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基本方向，不仅对搞好先导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带动吉林省加快发展、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维护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再一次印证了费孝通的远见和他关于正确处理中心城市、腹地、出口和流通网络的关系的重要性。

九、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大陆桥运输是指用横贯大陆的铁路把海与海联结起来的海陆联合运输方式。集装箱的使用，大大简化理货、搬运、储存、保管和装卸等操作环节，使大陆桥运输优势

更加明显。新欧亚大陆桥东起我国黄海之滨的连云港，向西经陇海、兰新铁路线的徐州、武威、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再向西经北疆铁路到达我国边境的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中亚、西亚、欧洲地区，西止荷兰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港。这条大陆桥跨越欧亚两大洲，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全长约10900公里，通向中国、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大陆桥。欧亚大陆桥在我国境内长约4131公里，西行途径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周边毗邻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辐射地域近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7%。

1996年5月，费孝通赴徐州、连云港考察欧亚大陆桥。他指出，建立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就是沿桥的大中城市成为周围广大农村腹地的经济中心。在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应该建成经济中心的枢纽。他比较发现，郑州市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上最具发展现代物流业潜力的城市之一，是铁路、公路、航空兼具的综合性重要交通枢纽和重要的通信和邮政枢纽。“中原城市群”是指“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计九个省辖市组成的城市群”，居于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无论从战略布局、发展需要，还是从经济优势、现有基础来看，中原城市群有条件发展成为沿海三大经济区之后的又一大经济区，它是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中心枢纽，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条件。

费孝通敏锐的发现，我国境内的这一段大陆桥完全可以成为一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要防止“酒肉穿肠过”的覆辙，建设发展一批沿途中心城市，并主动发挥好沿途中心城市对腹地的辐射作用。

十、京九铁路经济走廊

1996年，费孝通参加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到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的考察活动。1997年4月，费孝通赴深圳参加“民盟京九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并做题为《从京九铁路通车说开去》的讲话，同年12月，在深圳参加“京九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并做了题为《为京九沿线城乡发展提供一些意见》的讲话。自1998年4月下旬开始，他访问了河北衡水、山东聊城、河南商丘、江西南昌等地，开始了一段对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穿糖葫芦”式的实地调查，目的就是想为建设一条沿京九铁路的经济走廊出谋划策。

费孝通一边沿京九线考察，一边发掘沿京九线有哪些已经具备或再加把劲就能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中等城市，也就是“抓好京九线上的几个经济增长点”。他说，我们要“线上选点，以点连线”。京九线东西有京沪线和京广线，京沪线有天

津、济南、徐州、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城市，京广线有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株洲、广州等城市，比较起来，京九线当时还缺少类似已经相当发达的大中规模的经济中心城市。他认为，要缩小差距就要加强京九沿线中心城市的发展。他还为此建议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具体推动京九铁路经济走廊的建设，要设立专门的基金以及制定政策推动该经济走廊沿线的发展。

同时，费孝通也指出，京九铁路一端是北京、一端是九龙，中间的桥梁就是深圳，京九铁路通车，加强了深圳与内陆腹地的联系，深圳要更好地加强与内陆的经济帮扶和往来，发挥好桥梁作用。最后，他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加快京九铁路沿线中等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建议》。

第十一章 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开拓性研究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周年，成就显著。在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想起了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1980年代初就响应党中央关于西部种草种树，改善生态环境的号召，立项进行边区开发研究，由此切入了西部开发主题，开始了缩短东西部差距的开拓性研究。他说：“1984年，我结束了对江苏的初步调查后，除了继续在江苏各地观察外，我的研究重点跳出了江苏。一路沿海南下，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一路进入边区，从东北过内蒙古入青海、甘肃并访问了新疆和宁夏。”[31]他跑了几个民族地区，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够发展起来？[32]在而后的20年里，费孝通踏遍了除西藏外的西部各个省区，深入荒漠、草原、牧场、山区、高原进行考察，掌握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对有的地方他还追踪研究，曾经九上甘肃、八进内蒙。行行重行行中，费孝通根据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下了如《赤峰篇》、《包头篇》、《定西篇》、《临夏行》、《海东行》、《凉山行》、《武陵行》、《开发大西北》、《包头行》、《三访赤峰》以及《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等多篇关于西部开发的论著，系统、深刻地论述了西部开发的战略意义和开发思路。

一、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1.西部开发是全国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东西部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存在的差距自改革开放后急剧扩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西部本身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对西部的开发偏重于发展农业，造成西部生态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得海运、交通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加快对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引进，得到较快的发展。

31《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17页。
32 参见《发展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61页。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东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的差距拉大。1978年东、中、西部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8年则变化为58.3%、27.9%、13.8%，人均GDP也在逐步扩大；（2）东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差距拉大。东部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外企进驻是东部的工业化速度突飞猛进，远远地把西部抛在后面；（3）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比例1980是1.28：1，到1998年则为2：1；（4）东西部综合差距拉大。东西部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思想观念、生活质量、教育等各方面。全国近600个贫困县（综合指标）有9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33]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部的发展也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有人认为是对外开放力度不够，应进一步打开国门。但费孝通敏锐地指出上述思想极具片面性，东部地区的发展虽然要继续改革开放，但受到瓶颈即土地、劳动力、能源及市场等方面的制约，则更是主要的。如果不解除这个瓶颈的制约，东部地区将无法发展，从而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他认为解除这个瓶颈除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外，关键在于西部开发。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虽在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劣势，但具有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投资成本低廉、市场广阔等巨大优势。

针对东西部日益拉大的差距，以“志在富民”为学术和人生追求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必须缩短、消除东西部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差距。否则，东西部之间会产生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社会稳定。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社会差距必须有一个底线，低于这个底线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一点已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就是要把西部地区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逐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东西联动，不但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根据他们的发展经验，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不但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能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2.西部开发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费孝通认为中国现代化面临两个差距：一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二是中国内部的东西部或者大体上说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是中国现代化课题中不可分的两个部分。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国西部地区是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五个大的民族自治区。据1997年统计资料，西部少数民族为7447.8万人，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民族区域的经济

33 李欣：《西部发展十年概述》，载《经济参考报》2000年3月15日。

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南和西北几个省区。

费孝通忧虑地指出，宪法上规定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解决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没能解决事实上的差距。“西部和东部的差异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一方面是动员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参与他们本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这个观点过去常常被忽略。不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大型国营企业根本没有考虑到和当地少数民族相联系。甚至眼中只有这地方的资源，而忘记了还有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34]

费孝通强调，没有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较多地保留着，制约了他们的现代化。任何民族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只有两条路，要么灭亡，要么主动转型、积极参与到现代化道路之中。他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繁荣和进步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基本国策。我们不实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大鱼吃小鱼”政策。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当今国内和国际背景下，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现代化道路，只有在外力的冲击下，通过政府和汉族的帮助才能得到发展。

费孝通指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在全国2.1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少数民族地区占1.9万多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之间的差距过大，政府没有切实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他多次论证说，没有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看待西部开发的立足点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国内外的大格局强调西部开发的必要性。他的西部开发思想具有超前性，他提出的战略构想已逐步被政府所采纳和实施。他的许多观点正是现在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二、西部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1.“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

1984年，费孝通在定西地区考察时，高屋建瓴地指出东西合作是西部经济启动的关键，东西合作必须遵循“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方针。这是什么意义？他解释说：“以东支西，东部以三个力量：智力、财力、人力支援西部地区。以西资东，因为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都在西部，沿海地区很少，西部就可以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去支持东部的工业。东西双方的交流必须互利互惠，做到双方都有好

34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8页。

处，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单纯作为原料基地来看，不给它发展。东部必须支援西部发展本地的工业，使西部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达到共同繁荣。”[35]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部的合作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行政性合作，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第二种是市场性合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性合作是东西部合作的主要形式。一方面，东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被无偿地向西部调运。“三线建设”时期，东厂西迁就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则采取对口支援的方式。邓小平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36]根据中央的部署，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37]。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体系造成严重的价格错位，给东西部地区带来比较利益较大的差别。计划价格扭曲了工业产品与能源、原材料产品的比价关系，前者长期偏高，后者长期偏低。这种不合理的剪刀差，使西部地区受到巨大的损失。

这种行政性合作对西部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西部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它的消极作用也是巨大的：“1.限制了东西部区域之间的竞争，被动地联合使双方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2.鞭打快车的财政政策影响东部地区的发展后劲，而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补贴并没有形成一种自我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3.中央计划常常违背经济规律，不符合市场规则，导致人力、物力资源的闲置、浪费和破坏，没有发挥出对西部整体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从根本上解决东西部经济的巨大落差。”[38]

三、互利互惠——市场合作的根本机制

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要顾全这个大局。费孝通认为这种行政性合作是必要的，应当切实落实邓小平这“两个大局”思想，但是不能成为东西部合作的主导方式；根本方式应是市场性援助，即通过市场要素的合作达到支援西部、发展西部的目的。由于东部有智力、人力、财力，西部有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东西部地区应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实行优势互补，要素互换。互利互惠是东西部合作

35《两篇文章》，《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539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37 方立：《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38 方立：《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第311页。

的根本原则。只有实行互利互惠，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济合作的形式和内容迅速扩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费孝通特别指出，东西联营应是毛细血管的活动，即企业与企业直接见面、商定，政府仅起到支持、保护的作用，不能越俎代庖，搞拉郎配。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合作因素。东西部企业的合作模式应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有的学者总结了东西部企业合作几种模式："1.东部资金+东部技术+西部基础设施；2.东部大公司+中西部大农业+中西部大市场；3.东部的优势企业+中西部的相关产业+中西部的优势资源；4.东部的资金+西部的"三线"企业；5.东部的观念+中西部的政策；6.东部的名牌产品+西部的企业生产扩展型模式；7.东部和中西部联合开发中西部优势资源建立特色产业模式。"[39]费孝通期望的就是上述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

另外，在西部开发中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部开发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功能。西部开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资源空间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缩小地区差异，从而实现合理的空间均衡的空间经济一体化。这两个目标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一般来说，很难同时实现两个目标。[40]前者目标的实现主要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均衡目标的实现则需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在客观上西部的自然条件、区位、历史基础等因素使西部市场主体与东部并非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仅靠市场机制只会促使西部更加边缘化。特别是西部开发的前期阶段，政府应该是开发的主力军，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为西部的起飞打下坚实的基础。东部地区应克服地方主义的观念，主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去西部投资，西部也应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健全法制，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对投资企业进行倾斜等。西部开发的根本目的就是缩短东西部的差距，促进西部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达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四、西部区域发展之路

1.自力更生，走外助自立型现代化之路

费孝通强调，西部开发，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当地人民群众。西部开发首先必须自力更生。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98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8.8%，利用外资占11.7%，自筹资金高达42.9%。因此，

39 杜平：《西士取金——西部打开发的政策背景和商业机遇》，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第209页。
40 周叔莲、魏后凯：《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开发模式》，载《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2期。

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不能形成依赖中央政府及外部支援，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积极能动性。同时，费孝通又认为，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和牧区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以来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单独依靠当地的力量不可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走外助自立型现代化之路。

自力更生与外力的援助并不矛盾。费孝通指出："我们建国以来，在民族工作上是取得很大成就的，首先是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接着花了不少力量帮助他们发展起来，帮助少数民族有两条办法，一条叫作'输血'，一条叫作'造血'。过去我们花在少数民族身上的钱不少，可是花在'造血'上的不多，用在'输血'方面的较多。"[41]在"输血"过多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逐渐丧失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奋斗自强的意志，进而走上民族消亡之路。费孝通多次指出，应变"输血"为"造血"，将资金投入到生产和再生产上，使其靠自力更生得到真正的发展，缩短与东部的差距。

费孝通特别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大鱼吃小鱼"。对待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不仅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但国家的帮助不能形成"扩散—供给"模式，要形成"扩散—工业化"模式。国家支持的目的是"使少数民族能用自己的腿走路，形成一个靠自己不断发展的机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平等互助的成员"[42]。西部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发展进程当中自力更生和引进外援的关系应该好好地把握。

2.因地制宜，走多种模式发展的道路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具特色。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2000年6月，在"陕西省实施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上，费孝通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借鉴东部的经验，走工业下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大力发展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43]他认为，民族地区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道路。既不能盲目模仿，也不能依赖国家，更不能等待帮助，要走自身经济发展之路。他走一路，看一路，说一路，积极为各民族地方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找出路。

1992年11月，费孝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理论研讨会上，根据八年来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对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设想，包括建立"黄河上

41 《海南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6页。
42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34页。
43 《陕西日报》，2000年6月18日。

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临夏的发展模式、“两南兴藏”的具体设想，并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帮助少数民族发挥各自的民族优势发展经济。

通过对西北边区的多次考察，民盟中央于1988年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的提出，得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四省区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很快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该经济区建设的实施，极大地加快了四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不仅仅支撑了这四个省区的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费孝通在《凉山行》一文中提出关于大西南“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思路。“一点”就是指攀西地区，它资源丰富，能源充沛，是对今后开发大西南具有强大启动作用的经济心脏。针对当前该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对策：即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民族结合。“一线”则是指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印、孟的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攀西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搞成一片，这就是他设想中所提的“一面”。经济的辐射作用将像波浪一样由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从凉山地区向四周扩散到大西南的整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包括川、滇、黔三省，即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使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设想。[44]大西南“一点、一线、一面”开发设想的提出，表明他的研究着眼点正逐步从微观分析、确立模式走上宏观思考、区域规划的路子。如“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所在的河州地区可以实行“以商代工”的启动战略。他看到临夏和海东有不少回族同胞到西藏拉萨贩运，搞活了经济，促进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对此，费孝通提出要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西部各地都要有这种贩运队伍，启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如今，临夏—海东以其辐射全国的流通网络和吞吐量巨大的专业市场，已成为我国东西部商品流通的“旱码头”，对我国西部牧区和东部及其周边广大农区的发展发挥了纽带作用。

费孝通认为，西藏的现代化问题可以“反弹琵琶”，可以从外围入手，逐步向中心深入，而“两南”地区可以作为“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联系的桥梁”、“藏族现代化的跳板”，[45]成为藏族现代化的窗口。因此，他产生了“两南兴藏”

44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65页。
45 费孝通：《又一次访问定西》，《志在富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4页。

的设想，即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

3.发扬历史文化传统，建立经济协作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怎样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各国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西部开发也不例外。许多人认为西部落后的原因在于其文化落后。我们不否认西部地区存在文化贫困的现象或者说文化中某些因素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不能完全归结于文化。西部地区是伊斯兰教、佛教和汉文化三大板块并存博奕文化格局[46]。费孝通深有体会地指出，从文化的角度对西部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和深入研究，我们还做的远远不够。美国在西进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文化毁灭不但使文化生态失衡，而且还造成许多现在还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费孝通强调，我们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不要毁灭西部的多元文化。我们首先应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同样宝贵，我们的生存与它息息相关；二是文化既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又能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资源。我们要创造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民族优秀文化为代价。他认为，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在历史中形成了区域间、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都是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西部发展中要重视这些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4.“两个市场，左右开弓”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要有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启动的关键在于市场导向的确立。在西部开发时，市场的开拓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要重视，这就是他一贯强调的“两个市场，左右开弓”。

目前，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很小，国内市场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农村市场。费孝通认为，农村大市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是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之所以没有开发出来在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人民收入较低，购买力不足。以中西部为例，1997年中西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为1535元，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8.4%，全国平均水平的69.5%。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将增加消费需求4850亿元；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水平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将增加消费需求11770亿元。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来看，开拓国内市场的意义更是深远的。

同时，费孝通十分重视在西部开发时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但他认为打开东部国际

46 高新才、马文龙：《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载《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市场十分困难。因为不但东部沿海地区的竞争，而且也很难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争夺市场，西部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应将重点放在西部国际市场。我国西部地区与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0多个国家接壤。历史上有著名的“丝绸之路”与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它是20世纪以前欧、亚、非大陆上人类主要的交通路线。由于海上文明兴起，农业文明时期国际间这种贸易方式衰落了。费孝通主张重开“丝绸之路”，并非恢复传统的贸易方式，而是指恢复历史上与这些国家的繁荣贸易，为西部的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

费孝通认为，现在铁路、航空运输比海洋运输便捷多了，完全有条件重现“丝绸之路”的繁荣。[47]我国在20年来的发展中，忽视了西部国家市场的开拓。1988年费孝通经过考察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通过资源开发，带动这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3000万人民致富，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费孝通进而指出：“这个经济带启动的结果，将使这个协作区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中心。我们认为这个经济中心的建立和发展，更为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已建立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48]

费孝通还主张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通往亚、欧各国最早的国际通道，形成的时间可以远溯至秦汉之前，它北起长安，越秦岭到成都，然后大体上沿今天的成昆铁路，经西昌、攀枝花入云南，穿过里江和大理之间的山路，到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入缅甸、转印度和孟加拉国。他认为重开南方丝绸之路现在已具备条件，成昆铁路和滇缅公路已畅通，并且重开南方丝绸之路可以繁荣沿线地区，“由彝族主要聚集区的凉山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建立攀枝花和西昌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西昌和攀枝花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49]进一步来说，中东地区是世界资源中心，开拓西部国际市场，能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充足资源。西部国际市场将是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

五、保护环境，合理开发

1.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1984年，费孝通刚开始边区开发的研究，就发现了边区自然和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在《赤峰篇》里，他历史性地考察了自然生态失衡的症结所在：“农牧在靠天经

47 这仅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拓展开西部国际市场以后，其贸易量绝对大大历史上的贸易量。
48《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64~365页。
49《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65页。

营的水平上对土地利用存在矛盾，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50]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例如青海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35%，新疆为0.79%。据统计，全国目前荒漠化土地已达39.3亿亩，占全国内陆面积的27.3%，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开发的根本。只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才能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费孝通认为，保持自然生态平衡首先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牧业，改变过去的粗放经营方式，使农牧矛盾变为农牧结合，相得益彰。西部地区陷入恶性循环，越穷越伐林、毁草种地，造成环境进一步被破坏。其次就是要从宏观经济着眼，加强全国性的区域分工，由内地供应西部必要的粮食，西部供应内地肉食和工业原料，实行互通有无。

西部汉人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适应当地的食品结构，减少粮食消费量而增加肉食和乳品。进一步而言，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利益、产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必须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环境。再造一个山清水秀的西部，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为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

费孝通还强调，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必须与人的生产生活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提出用大系统的观点看待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一次去定西考察时，他指出定西地区要种草改善环境。当他第二次去定西时，发现草是种上了，但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种上的草面临被拔掉种粮的危险。他深有感触地说：“草的转化就不单是自然生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生态如何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大课题。”[51]

2.保持人文生态平衡

费孝通在《包头篇》中详细阐述了当地人文生态失调问题。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在西部建设的许多国有及军工企业留下一个重要的后遗症——人文生态失调。“人文生态是一个社区的人口与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至于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日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52]

费孝通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是人文生态失调的主要原因，这在西部

50《赤峰篇》，《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492页。
51《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60页。
52《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6页。

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厂长就是一个家长、市长。企业办社会加重企业负担，效率低下，自身难以维持发展。西部的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像一个个孤岛，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力。他强调，必须根治人文生态失调的顽症，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城市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扩散效应，走“城乡一体化”和“一厂两制”的道路，扩散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力量，切实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二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

3.充分发挥城市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扩散效应

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总体上是落后的，但有许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兰州、西安、成都、重庆、包头等。费孝通指出，在实施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发挥这些城市在资金、技术、文化等方面对周围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在《定西篇》中，他写道：“兰州市的扩散是有潜力的。它不仅可以成为甘肃省工业体系的核心，还能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起到中坚、枢纽的作用。由兰州市的地位，我还进而想到甘肃各地区的首府、各县的县城乃至有条件的乡镇，都应当敞开城门，发散各自的力量，扶持乡镇企业。这种由上而下的层层扩散将造就一个错落有致的地方工业群落，这一群落的良性生长又能起到自上而下，层层保护的反馈作用。”[53]

“一五”至“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在西部建立了几千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企业没有和当地的社会经济融为一体。费孝通强调发挥国营及军工企业的作用是启动西部地区两个关键之一。他把这些企业比喻为“隐蔽的上海”，认为现在大部分还埋藏在山沟里，如果能发挥出来，广大农村就能变为西部的“苏南”。这是一个潜伏着巨大能量的资源。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发挥原有企业的力量，是要盘活存量，只有盘活存量和添加增量同时进行，西部发展的前景才会更加辉煌。

4.人力资源开发，西部开发的重中之重

人力资源并非实物资源，而是一种特殊的最宝贵的资源，它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无限的潜力。人力资源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资源，是一个地区总体资源中最关键的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和东西部差距的扩大，造成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短缺和原有人力资源的流失，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人口数量大、素质低、教育科技投入不足、人力资源开发主体单一、缺乏健全的人力资源流动机制。[54]费孝通指出，西部开发在推进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要把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摆在重要的位

53 《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68页。
54 李岗：《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源头工程》，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置，人口是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人员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教育落后和科技能力不足是制约西部发展的六大问题之一。西部与东部相比，人才严重失衡，在东部平均100人中拥有科技人才18名，而西部只有2名。针对人力资源的短缺，费孝通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当地人才靠当地培养最可靠。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培养出西部发展所需要的新型人才。“对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为了早日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打破封闭状态，摒弃传统意识，主动接受外来的先进科技文化，寻找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支援”[55]。他又指出，人才培养还靠在实践中进行，他认为“如果地、县、乡各级领导能注意重视类似谢、陈这样的基层成长起来的人才，用短期培训等方法为他们助长补缺，定西发展乡镇企业的人才会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56]

针对西部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费孝通认为，仅靠强迫是束缚不住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应是自由的。西部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关键在于要给人才良好的发展空间。提高人才的经济待遇并给他们创新的机会。许多人才流向东部或国外，不仅仅因为物质待遇低，关键是没有用武之地。西部许多地方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很严重。一个民众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滞后的西部是没有希望的西部。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西部开发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老骥伏枥，志在富民。费孝通犹如一匹骏马在西部奋蹄疾奔，写下了西部开发系列论著。总的来说，费孝通西部开发思想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研究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费孝通自20世纪80年代就呼吁开发西部、研究西部，既为世纪之交党中央的西部开发决策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也为西部开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西部开发思想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自然逻辑演绎，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对西部的研究并非应时之作，而是从村—镇（乡镇企业）—区域（包括西部开发）的自然发展，也是其民族研究的必然发展。他一再说自己与少数民族有感情，民族研究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西部开发研究是费孝通“志在富民”学术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费孝通在耄耋之年还奔波于西部各个地区，为西部的发展出谋划策，为西部人民的富裕呕心沥血。

55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33~334页。
56 《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72页。

第四，费孝通研究西部的立场高、视野远。费孝通并不局限与一个方面探讨西部的发展，而是从国内外大的背景出发，指出西部开发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实施西部开发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全面发展的一项宏伟战略任务。费孝通奔走20年呼吁开发西部和关于缩短东西部差距的探索，已在并将继续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呈现其远见卓识，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掘。

第十二章　“小康”思想与乡土中国

1947年11月和1948年1月，费孝通相继发表《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和《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两文，他以中国“人多地少”为前提，在前文提出区别于美国式生活的“东方的小康生活”及其水准问题。后文则对小康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如果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当承认争取这水准是公道而且合理的。”[57]他所提出的“小康”思想，以及关于“小康”水准与乡土民生、“小康”生产与乡土经济、“小康”传统与乡土社会、“小康”生活与乡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是一笔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理论和思想财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今时代，抚今思昔，深入研究这些课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小康”水准与乡土民生

费孝通是在乡土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社会观方面自然深受我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影响。小康思想，我国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诗歌经典《诗经》之中，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58]《礼记·礼运》在阐述“大道既隐”之后，以“是谓小康”说明与“大同”社会的区别。”[59]《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60]千百年来，“小康”不仅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种社会学说，也深入到实际的社会生活。费孝通在《小康经济》中提出东方小康水准问题，他引述《孟子·梁惠王》中孟子的话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61]南宋洪迈在《夷坚甲志·五郎君》

5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75~176页。
58 齐豫生主编：《诗经》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第80页。
59 曾亦 陈文娟：《礼记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第175页。
60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卷，超星电子图书，ISS号：90081457，第1227页。
61 《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36~437页。

中写道："久困于穷，冀以小康。"[6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丁前溪》说："由此小康，不屑旧业矣。"[63]《儒林外史》第十五回有"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的描述，[64]郁达夫《迟桂花》有"家里虽称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65]的记述，等等。费孝通研究中国社会造诣很深，他提出"小康"思想，可说是这一社会思想传统的自然传承。

在20世纪这个风云变化的大时代，费孝通亲历了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又远涉重洋，直接考察、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因此，他提出的"小康"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表层地对中国传统的"小康"思想的复述，而是赋予了它许多新的深刻内涵。

费孝通提出"小康"思想，是作为一种民生标准。民生，可以说是他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出发点。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他提出"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完全是从百姓，特别是从农民角度着想，是从一种经济结构能否维持民生考虑的。他说：从整个经济分析来看，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等等因素是一个有机的配合。"中国传统社会能很长久地维持着这种配合，那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在这种经济里生活的人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66]相反，"任何经济结构如果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是决不能持久的。"[67]将民生问题与经济结构联系起来，把民生作为决定经济结构存亡的根本因素，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体现。他所说的"民生"的"民"，与他的富民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他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68]"民生"的民，"富民"的民，都是以民为本位。

费孝通提出"小康"思想，维护的是人的生存权利。这是现代社会才具有的一种人的权利观念。关于人的生存权，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的相当生活水准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69]《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70]这是对相当生活水准权的规定。享有维护相当生活水准权，其最低限度需要是每个人应享有必需

62 洪迈：《夷坚志》第一册，超星电子图书，SS号：12370916第七页。
63 蒲松龄：《聊斋志异》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230817，第54页。
64 吴敬梓：《儒林外史》超星电子图书，SS号：10021755，第107页。
65 郁达夫：《郁达夫经典作品选》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278197，第117页。
66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74页。
67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74页。
68 《行行重行行 志在富民：费孝通——行走一生》，《人民日报》2005年4月28日。
69 《当代世界史资料选集》（第一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228页。
70 葛明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4页。

的生存权，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住房。用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对生存权的国际性保障。我国已经在1997年签署并在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中国的生存权与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当生活水准权统一起来，既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要求。《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和最紧迫的任务”[71]。可见，我国有关生存权的要求和标准还比较低，仅仅是温饱标准，尚未达到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相当生活水准标准。费孝通在60多年前提出的“不饥不寒”的水准，与我国人权白皮书和国际公约规定的精神是很一致的。

费孝通提出“小康”思想，是基于社会公平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争取“小康”“是公道而且合理的”，这就是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对“小康”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既体现了人类社会长久地求索，又说明它是一个具有深厚价值意蕴的理论命题。中外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持续探讨，而且在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等诸多学科中，都成为重要的内容。人们通常以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为鉴别社会公平程度的直接依据，认为分配公平制约着其他方面的社会公平，不仅关系到效率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因此，许多思想家都主张，在生产、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促进社会公平。费孝通关于“小康”“公道而且合理”的论断，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小康”生产与乡土经济

“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和经济基础之上的。费孝通对“小康”的生产和经济基础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种生产和经济基础，根据他研究“乡土中国”的分析，可以概称为“乡土经济”。他说：“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稳定，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延续了几千年，多少代人生活在稳定的历史继承性中。”[72]但是，乡土社会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11月）。
72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73]他认为，维持“小康水准”的生存和经济因素是多方面的。

维持“小康水准”需要保护土地。土地是维持“小康水准”的物质基础，是农民的命根。费孝通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74]他强调要珍惜和保护土地，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基本和长远意义的。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立地之本，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这宝贵的资源应该有效充分利用，因土地资源有限而且不能再生。千百年来，人类生息繁衍，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文明，科学与经济的发展，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资源土地。

费孝通还强调，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必须切实保护地力。他说：“中国传统小康经济是建筑在小心伺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力，使人们老是可以取资于地面上培植的作物的基础上。”[75]如何保持地力成为发展乡土经济、维持小康生活的一个长期而重大的课题。他针对“损蚀冲洗下的乡土”，提出保持地力的要求时说：“土地是有生命的机体，地力得培养，如果培养得法，可以取之不竭，用之不穷。”[76]

费孝通提出培养地力，对于我们现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是很有启迪的。长期以来，我国在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主，高产值、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及畜牧业比例过低，导致整体农业产出效益差。大部分群众的主要投入及大部分耕地资源用来生产粮食，以解决温饱问题，许多地区尚未从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中解脱出来。因此，在注重提高农民利益、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近期和长远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维持“小康水准”需要发展农工混合经济。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经济，在租佃制下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户，并不能够只靠土地的产出来维持一种“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准，是农闲时期的乡村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补贴了农业，在劳动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维持了农工混合的乡村经济形态。“中国从来不是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制造工业分

7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3页。
7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75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3页。
76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1页。

散在家庭里固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却是一个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事实，使普通土地不足的农家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里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77]

费孝通还就乡土工业与现代工业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针对发展乡土工业会阻碍现代工业发展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乡土工业不过是一种中国工业化的过度步骤，这个步骤不会阻碍中国高度工业化的发展。“要乡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则中重建起来，一切新事业本身必须是要经济上算的过来的，所以乡土工业可能是最有效的入手处。”[78]有了乡土工业的发展，可以积累资金，吸引知识技术下乡，为发展现代工业创造有利条件。

费孝通特别强调，我们要认清当时乡土工业遭受破坏的根源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着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而且是现代化的。”任何社会都自有一套应付生存问题的办法，传统中国也不例外。旧有的农工混合经济所能提供的生活保障程度固然很低，但至少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所需，甚至维持一种“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平。西洋机器工业的入侵，导致了乡土工业的衰败，使得“小康的降而为小贫，小贫的降而为大贫，大贫的铤而走险”，这种小康生活也像其他所有的“黄金时代”一样不可复得。

三、“小康”传统与乡土社会

“不饥不寒”的小康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费孝通把这种乡土社会称作“礼俗社会”，也就是“礼治”的社会。他说：“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79]他对“礼”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80]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种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为了避免对“礼”的误解，费孝通特别指出：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并不带有“文明”、“慈善”、“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等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

77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73页。
78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37页。
79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3~44页。
80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2页。

以很“野蛮”。从现代标准看去，礼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他还举子贡欲废弃宰羊祭庙的古制说明这一点。子贡问孔子可否取消杀羊祭庙的制度，孔子说：你爱的是羊，我爱的可是祭庙之礼。可见，孔子并没有对活羊动恻隐之心，同意取消这种残忍的行为。[81]

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家、社区等，都做过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产生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而形成了乡土人际关系结构，这便是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社会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82]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去的社会影响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形成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儒家最注重的是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差序。“五常”规范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差序。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衍生出来的就是差序。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83]保持这种差序格局的和谐，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乡土社会维护差序格局的和谐，是有一套规范的，如仁、义、礼、智、信，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等。

乡土社会的家是一个伸缩的社会圈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一种伸缩能力。“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84]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85]

在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与西方家庭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西方家庭中，夫妇是主

81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1页。
8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3页。
8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1页。
8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页。
85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2页。

轴，子女是配角，成年了就离开家庭。家庭具有生育功能，而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我们乡土社会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86]在这样的家庭组织中，男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费孝通指出：“在亲属组织中，目前法律对财产继承问题的规定似已成为两性不平等的实例。”而根据男女平等的思想，就要修改这种两性不平等的单方亲属原则。[87]

乡土社会的社区是研究农村的基点。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乡土社会。费孝通学术生涯的一个重点是研究中国农村，他把农村称作“乡土社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村与村之间存在着孤立、隔膜的关系，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疏少，区域间少接触，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大多农民聚村而居的特点，对于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

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乡土社会很少类似的情形。[88]费孝通回顾自己研究乡土社区的经历时，说明他是从研究乡土社会开始，到研究农村变化，后来研究小城镇，现在进入了大城市、大都市，伴随中国社会走了一条城市化的道路。他说：“如果把传统中国社会看作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一端，那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个城市化过程。这个未完成不单单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或者工业化的过程，还指人本身的变化过程，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89]费孝通还说：研究“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90]

费孝通还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管理主体的问题发表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在比较健全的社会条件下，不仅政府具有社会管理的功能，履行社会管理的责任，社会组织同样具有社会管理的功能，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他说：“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一天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使一个政府能向人民负责，受人民控制，在早期，还得设法减轻这政府的事务，减弱这政府的权力。减轻事务和减轻

86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4页。
87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88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页。
89 费孝通：《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90 费孝通：《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权力并不是说社会上的事情停顿，而是说让出许多事务和权力来给各种非政府的，直接由地方人民经营的团体去做，去负责。这广泛的基层民主才是民主政府不致变质的保证。”[91]

四、“小康”生活与乡土文化

“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产生了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文化。这样的乡土文化，又成为小康生活的一种精神支柱。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和地有着感情的联系。这是一种桑梓情谊，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92]，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把这种传统乡土文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成为中国文化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费先生特别重视研究文化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人的生活是文化之源，文化要为人的生活服务。文化如果离开了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价值了。他深刻地指出：“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93]“人类创造文化为的是要增进他们生活的价值，他们并不会以维持文化为目的而牺牲生活的。所以拉长了看，一个对于生活没有用处的文化要素，不论是物质的器物或是社会的制度，甚至信仰的教条，决不能长期保留。一个活着的文化要素因之必然对于利用它的人有他的用处。”[94]

费孝通认为，文化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特性。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文化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是人创造的，人不是简单的生物体，因为没有人创造的文化，也就没有人自己。”[95]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可以说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或“人类化”，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以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社会，从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客体包括自然和社会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得以不朽，是因为他立德、立功、立言，从被社会承认、对社会作出贡献、对社会关注的问题做出自己的阐述，而得到超越人生物体的生命。在中国

91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6页。
9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3页。
93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8页。
9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25页。
95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文化中，文化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具有的历史性，又紧密地与文化的社会性相联系。”[96]

乡土文化是一种传统，成为维系社会传承的规范。费孝通说：“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97]他所说的乡土社会可以遵守的“成法”，指传统的法令制度、老规矩、老方法等。《吕氏春秋·察今》曰：“故择先王之成法，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98]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到，“成法”强调的是从人出发，为人而设。可见传统的法令制度、老规矩、老方法等，人情、乡土气很浓，尤以乡土文化的道德、习俗等为甚。

“诚信”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内涵。费孝通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99]在乡土社会，诚信是立人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00]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诚信是齐家之道。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101]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忠诚、互不信任，家庭便会逐渐崩溃。从为政即治理乡土社会来看，乡土文化强调的是，诚信是为政之基。《左传》云：“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孔子反复告诫为政要有“民信”，“民无信不立”[102]。如果人民不信任统治者，国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脚。因此，为政者必须“取信于民”。

“规矩”也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内涵。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一种熟悉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

96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97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2页。
98 吕不韦：《吕氏春秋》（下）超星电子图书，SS号：90094569，第50页。
99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页。
100 朱熹：《四书集注》，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985038，第60页。
101 魏征：《群书治要》（下册）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279275，第845页。
102 朱熹：《四书集注》，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985038，第144页。

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03]规矩是一种具有亲密感的乡土文化，在乡土社会无所不在。也就是说，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习惯形成的“规矩”，而不是现代社会的法纪。法纪靠强制权力实施，规矩靠社会习俗维系。对此我国的典籍有大量阐述。荀子说“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104]。《史记·礼书》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105]。魏阮籍《大人先生传》说“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106]。这些阐述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指出了这些规矩的文化蕴涵与社会功能，达到个人情感与规矩的内在统一，起到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使人达到悦心的境界。

乡土人才落叶归根的传统成为乡土文化的重大特色。费先生对这一点的赞赏充分表现了他的深厚乡土情结。他说：“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送往外洋，而且对于根源的保卫和培养时常看成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个地方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107]乡土人才落叶归根，是乡土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是我们这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一种让费孝通感到十分忧心的现象，就是乡村子弟外出上中学、大学，学成之后，几年的离乡生活却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他说：“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得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108]这样脱离农村实际需要的教育，可以说没有真正承担起为我国现代化服务的任务。因此，他当时就提出，要造就大学生回农村的桥。

费孝通对乡土重建、实现“小康”目标，充满着憧憬。他说：这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个前提如果不存在，这一套讨论重建的话也都不发生直接意思了。我这套话也可以说都是白说的。但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能永远这样下去，有一天重建乡土的前提存在了，我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还是要我们细细研究的。”[109]新中国的建立，这个前提存在了，费孝通的预见在崭新的条件下得到实现，“细细研究”的工作则需要不断延伸。

10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页。
104 荀况原著：《荀子校注》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572846，第235~236页。
105 司马迁：《史记》（一）超星电子图书，SS号：90081060，第111页。
106 郭光校注：《阮籍集校注》超星电子图书，SS号：11715782，第95页。
107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5页。
108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6页。
109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38页。

第四篇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民主政治

第十三章　参加民盟

1938年，费孝通获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之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华夏大地。他决心“和同胞们共赴国难”，便迫不及待地启程回国，经越南西贡，直奔祖国的抗战后方——云南昆明。他“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虽然身居后方，但是抗战的形势时刻牵动着费孝通的心。他感到自己既有责任用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为祖国的重建服务。同时，他极力主张争取政治民主，实现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费孝通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十分关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的信念。当他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和腐败无能后，就奋起直言谠论、主张抗日，鼓吹民主，抨击时弊，甚至对执政的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充满鄙夷。

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不仅工作条件艰苦，生活也十分困难。据当时的报道，抗战以来，昆明的物价飞涨了300倍，而西南联大教职员的薪金只增加了5倍。面对生活上入不敷出的窘境，费孝通只得“摆摊卖文”，拼命写稿，挣钱养家，让一家人吃饱肚子。为了赚取稿费，他甚至整天“泡在茶馆里”等人上门约稿，有时稿子要得急，他就在茶馆那样乱哄哄的环境里写文章，一挥而就，让等在一旁的编辑拿去报馆发表。

艰苦的工作条件，激励着费孝通在学术上不懈地努力；困苦的生活境遇，将费孝通带入了一个写作高峰期。这期间，他撰写了《禄村农田》、《农村土地权的外流》、《战时内地农村劳动力问题》、《夫妇之间——生育制度结构中的一个难题》，以及《西行杂写》、《旅美寄言》、《邦各有其道》、《雾里英伦》等大量著作。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社会学研究上，希望用自己的学识为建设国家、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出力。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读过《资本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懂得很清

楚”，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那时候流行的许多社会思想学派的一种”；对中国共产党也是“知之极少”。但是，他回国后看到，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场上，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抵御外辱；而在另一个战场上，国民党处心积虑企图消灭共产党。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正进行着殊死斗争。

1943年6月，费孝通等10位教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按当时的规定，他们出国前必须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费孝通开始拒绝受训，后来以不作为一般团员对待和不出操、不听课为条件，在团内住了大约两星期。训练结束后，蒋介石与每个团员见面，会见费孝通时，蒋介石问他读什么中国书？他回答说：读我这一行的书，不读中国古书。蒋说：要多读读中国古书。后来费孝通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这个人下作，我不要他抬举我，所以故意这样说。

一年后，费孝通访美回到昆明，他发现此时的昆明已经发生了他不曾想到的变化。出国前，他埋头于学术研究，但是一旦关注身边的政局时，周围发生的一切就让他感伤，情绪消沉，觉得“心里好像有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重担……”，“觉得说话是多余的，感觉着光明固然存在，可却在日子的背后”，无奈之下只好沉默。周围的同事、朋友，大都感觉相同。

这次回国后，费孝通发现同事、朋友与过去不一样了。他们对时局的分析，谈论国家未来的见解，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听了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抗战初期，闻一多“对国民党及政府寄予很大希望。当时抗战虽遭受一些挫折，但他对政府和抗战前途仍充满信心，他也曾准备随时响应征调，直接为抗战服务”。可是此后的事实让闻一多彻底失望了，国民党一味地消极抗日，对民主进步力量残酷镇压，把国家搞得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闻一多不再对政府抱有幻想。

那次，闻一多和费孝通一见面，就立即伸出热情的欢迎之手，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费孝通一年前的那种思想“不好！不好！”，“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1]

二、反对独裁、反对内战

费孝通平日交往密切的除闻一多之外，还有潘光旦、曾昭抡、吴晗等人，他们也

1 《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439页。

都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在众多同事、朋友的感召和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榜样是最好的引导”，这股引导的力量，终于让他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盟是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当时名称叫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抗日而斗争。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共推黄炎培为主席。后黄炎培因故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10月，明确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2]

对于费孝通来说，在国内各派势力斗争日趋紧张，政治势力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选择了这样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是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事件。2001年纪念民盟成立60周年时他说：“民盟这时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积极主张团结，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它提出的口号，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当时的一个‘民主教授’，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民盟。选择这样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说来得益于周围的一批朋友，正是通过这批进步的朋友，使我在民盟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3]事实上，加入这样一个政治团体之后，费孝通在政治的敏锐性和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上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看出，这时他的文章和行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呼吁和平，呼吁正义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当人们还在欢庆胜利的

2 参见《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群言出版社，2001，第1页。
3 《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第338页。

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在阴谋策划“剿共”，中国人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内战即将全面打响，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地反内战的浪潮。

费孝通和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曾昭抡、罗隆基等著名民主教授、民盟盟员一起，积极响应民盟总部的号召，投身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费孝通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告国际友人书》、《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等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撰写了《复仇非勇》、《平民世纪在望》、《美国你不该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等多篇文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内外发生的政治事务所持的立场和观点。

1945年11月25日晚7时，在云南大学广场，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报告会”。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四位教授到会演讲。但是人群中夹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当钱端升开始演讲时，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军警包围了云大校园，校外响起枪声，混入会场的特务割断电线，企图制造混乱。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害怕，点起汽灯，继续开会。

当费孝通站上讲台作题为《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的演讲时，枪声更加密集了，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站在会场最高处的费孝通极力保持镇定，他向全场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伴着枪声，在群众高唱的反战歌声中，集会被迫提前结束。这次集会虽然提前结束了，但是影响巨大，更加激发了大众反内战的斗志。

演讲会刚刚过去五天，反动当局又出动军警和武装特务，袭击了联大和云大等校的爱国师生，他们用木棍打，用刺刀扎，甚至扔出手榴弹，造成了四死、伤数十人的“12·1”惨案。这时的昆明已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此后，国民党特务更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他们强令进步刊物停刊，跟踪盯梢进步人士，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1946年7月初，民盟总部派李公朴到昆明组织反内战运动，由他发起，约了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和费孝通七人具名，邀请新闻记者在商务酒店开了一个招待会。会上李公朴和闻一多发言，表明民盟反对内战的态度，当时就有特务捣乱。新闻招待会后，特务终于下了毒手，7月11日李公朴在青云街学院坡被枪杀。

李公朴死后，特务们没有收手。7月15日，开过“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的闻一多先生，刚离开府甬道西仓坡《民主周刊》社回家的时候，枪声再次响起，闻一多和他的儿子一起遭特务暗杀！李、闻的先后被害，使费孝通无法按捺胸中的激愤，他在悼念李公仆的一篇短文中说：

这是结束的开始。公朴先生的血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历史上划出一条

新的界限，这界限无疑地已经接近了光明。我哀悼公朴先生不能看到这光明的来临，但是他的血本身创造了光明！

“无耻”，这是他临终时对杀害他的黑暗势力的最后的斥责。可是，让我们告慰死者，无耻到这种地步，已表明了快到结束。信赖人民，他们会继续奋斗！[4]

四、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李公仆遇刺后，费孝通的名字上了暗杀的黑名单，受到特务的跟踪，天天有形迹可疑的人在云大和联大教员宿舍周围游荡。费孝通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特务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冲进来抓人。闻一多被害那天晚上，他避到云大校长熊庆来家，后来美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把他接走。当他们刚从校长家离开，国民党特务便闯进熊校长家搜查，带走了他留在那里的一个包裹。

显然，特务们已经要对费孝通下手了。当时除了费孝通以外，还有一些经常出头露面的民主教授，如潘光旦、潘大逵、张奚若、尚钺、冯素陶、赵沨等人也被接进美国领事馆，他们都是民盟盟员。美国领事馆保护民主教授这件事，还引起了一场“外交争端”——费孝通等人躲进领事馆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要求领事馆交出这几个人，领事馆不干，事情闹到了南京。为此，国民党中央政府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了交涉。最后由美方派人与云南省政府以及民盟负责人共同会谈，达成协议，在保证这些民主教授安全的前提下，将他们送离昆明。

费孝通去了南京，然后回到家乡。为了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以及改变当时的环境，在友人的建议和安排下，接受了英国一个文化团体的邀请，于1946年11月告别家人去了英国。他在英国待了三个月，于1947年2月回到北平，继续在复原后的清华大学教书。这期间除了教课，他想把这些年来在学术上思考的问题梳理清楚，整理成文。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暴风骤雨，还是刮进了清华园。

国内战争打响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统区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加紧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随即就以“危及国家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同时，在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始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北平的特种刑事法庭也发出了“传讯、拘留、提审”各大学里民运积极分子的命令。

4 《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279页。

据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副主席裴毓荪回忆说：1947年8月的一天，她突然接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通知，说她处境险恶，必须立即撤离清华校园，当她准备离校时，发现军警已经守住了各个路口，便衣特务在校内到处乱蹿。急迫中她朝胜因院走去，希望教授住宅区里的戒备能松懈一些，没想到那里也一样有军警在巡逻，一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定了定神以后，抬头察看四周，发现自己正站在费孝通家门前，她敲响了费家大门。费孝通毫不犹豫地把她安顿在家里。当晚，费孝通又跑到燕京大学，希望找到一辆能够自由出入清华的汽车把她送走，但是没能如愿。

第二天，费家门前就出现了可疑的“便衣”。看来此处已不可久留，费孝通就把她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冯友兰家。第三天，她被吴泽霖教授从冯家接走，并于当天半夜，在地下党派来营救她的彭珮云等同学帮助下，翻越清华园的围墙，逃离了虎口。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费孝通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

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并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1948年12月18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解放前夕，国民党派了一架飞机，专门运走了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内的一批著名知识分子。费孝通没有走，他决定留下来。美国阿古什教授说：“他不喜欢国民党，他不会跟着他们去台湾的。但他完全可以像1946年考虑的那样，去英国或美国。他懂英文，有博士头衔，在英美人类学家中有点名气，在这两个国家他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在美国大学中谋一个适当的职务是不成为问题的。但是，他终于留下了。”[5]

其实费孝通早就有出国任教的机会。1946年费孝通重访英伦的时候，他的老师弗思曾极力挽留他留在母校任教，遭婉拒后，又写了推荐信给香港大学校长，想把他留在香港。后来费正清又想拉他去美国。1948年11月前后，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费正清来了个电报，告诉他哈佛大学决定请他为客座教授，速去美。他没有接受，也没复信。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派官员到清华园找费孝通和潘光旦，询问他们在北平即将解放时作何打算？当听说他们都没有离开北平的意思时，这个美国人就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表示在共产党政权下，他们会没命的。费孝通回答说：不会这样的。他认为“最好是同人民一起度过黑暗时期”，“在国内有许多事可做，培养学生，研究中国”。他对一位劝他离开的美国朋友说：“不论结果怎样，我是决心不离开中国的，我将成为新政权的‘忠实的反对派’。”[6]

费孝通没有走，他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5 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第164页。
6 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第十四章　迎来解放

虽然那时费孝通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然而社会现实让他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一批肯干事的年轻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把他们看作振兴中国的力量”，并且相信自己“和共产党人可以一起工作”。当这样一批肯干事的人打下江山以后，他愿意留下来，希望和他们合作，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政权下，“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

一、人民代表，参与国是

费孝通不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却于1949年1月，接受共产党的邀请，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载着费孝通、雷洁琼、张东荪等一行人的大卡车，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经石家庄到达西柏坡，一路上费孝通看到“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连绵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车，车上插着一面旗，没有枪兵押着……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费孝通被这壮丽的景象所震撼！到了西柏坡，燕京大学教授、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代表张东荪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同他谈话后，对他颇为赞许。”[7]

西柏坡之行给费孝通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说：

> 这次旅行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知识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实只是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吧。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石家庄的旅行我学得了这一点……[8]

7 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67页。
8 《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104页。

1949年6月，他在一封给外国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

……新政权在建设中诚心诚意学习先进技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薪金也提高了，这表明科学和知识受到重视……我的教学方法受到鼓励……我还被聘请到北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以便发展城市研究工作。[9]

从这些真诚又充满激情的文字里，人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费孝通对共产党有了崭新的认识，他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对新中国的建立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期待。

1949年9月，费孝通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代表，他参与了北平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看来，此刻费孝通似乎开始涉足“政治”了。其实他并没有想以此为“契机”，转而踏上当官这条路的念头。

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抗战以后，我、吴晗、闻一多、冯友兰这些人同其他年轻人一样，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所以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我们是想让当局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的是民主，要“议政”，不要“执政”，要用我们的思想影响“政治”，“为王者师”嘛。当时大家都讲好的，不当官，要教书。那时他在文章里写道：

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景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能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10]

费孝通还说，刚解放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还有点“政治野心”，认为民主党派在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里可以起作用。另外因为吴晗的老婆是共产党员，他和党的关系比较深，这时也觉得自己在党里的地位比较稳了。有一次谈起民盟工作，按照吴晗的意思，要我负责北京市民盟，所以在北京市的盟务方面我出过不少主意。

解放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到来之时，费孝通“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他说：“一个富于生命

9 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68页。
10 《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72页。

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而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11]

1949年8月，他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大会，短短的6天会议，让他学到了抵过过去6年甚至30多年的东西——明白了怎样才算得一个民主的社会。费孝通到过美国，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当时以为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后来又有机会到英国，希望在工党的英国可以看到民主的究竟。他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我们知道民主这个词已经30多年，我追求了解民主也已经有6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12]这样一个困扰了他30多年的问题，在此次代表大会上找到了答案。

大会开始的时候，费孝通一进会场，就看见“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个戴瓜皮帽的”，打扮各异的代表，和这样一群身份不同的人一起开会，对费孝通来说是平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他不由得“点起头来”。“代表性呀！”他说：

> 这许多人并不是由市民普选来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选举是一个手段，如果这手段能提高代表性，那是要得的，如果不能，那就要不得。[13]

开会的6天里，费孝通安心地坐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不由得想起3年前在云南大学广场上举行的“反内战时事报告会”，当他上台演讲时，会场四周响起了枪声，子弹在头顶上掠过，那时的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就是专政。由此，他“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说：

> 解放以来我对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是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我爱它，因为许许多多我熟悉的，我爱好的青年朋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个个都拼命工作，中国有希望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我眼睛面前完全证实了，但是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在参加代表会议之前，我是不太敢相信的。
>
>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实行民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过去所了解的民主是形式的，不是本质的，好像必须投票，必须大吹大擂的竞选，必须像英国的巴力门一般有着“陛下的反对党”之类的节目才算是民主。解放之后，并

11 《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103页。
12 《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95~96页。
13 《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97页。

> 没有这套形式。第二是我过去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不是辩证的。民主了，这个社会就不包括专政，两者不能同时存在。因之，我看见解放后的政权有专政的成分也就不能相信会民主了。这些思想上的包袱，感谢这次代表会议，它给我解除了。[14]

可以说，经过北平各界代表大会之后，费孝通对共产党、新政权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也愿意许多像他一样“背有思想包袱的朋友”，能“更进一步在事实中去认识新中国的本质”。

二、百家争鸣，反右运动

1950年，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贵州分团团长，率队赴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潜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他还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想一边教书，一边用自己的知识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后，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费孝通诚心诚意地希望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不要掉队，因为像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还是保守住过去个人主义的作风，在新事业里是插不上手的……就会到处碰壁。不改造，只能退下去”。在这个期间，他写了《我这一年》、《大学改造》两本小册子和《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人民首都，人民当了主人》、《思想战线的一角》等文章，表达自己解放以来在思想改造中所受到的教育和体会。他自认已经找到了一条改造的路子，并希望能在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一个“样本”的作用。

但是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逐渐变了味，调门越唱越高。一个原本要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运动，变成了揭发、批判、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舞台，运动后期，如王蒙先生说的：“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成效。”费孝通也逃不脱这个“风气”，在痛骂了自己一通之后，总算过了关。

1951年，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从此踏上仕途。费孝通晚年时回忆说：解放初期我在清华教书，待遇、条件都不错，朋友也多。共产党方面的彭真和李维汉拉我拉得很紧，彭真想要安排我去北京市政策研究室。李维汉是国务院秘书长，说话算数，在党内抓民

14 《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96页。

族、统战工作，我在这两方面都可以起作用，结果李维汉把我要过去了，从此走入仕途。在这件事上，是共产党决定的。关于这样的安排周恩来没有跟我单独谈过。

费孝通出任专家局副局长时，局长齐燕铭要他“通过民主党派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和要求，及时反映”。其时，我国的知识界正经历着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搞得狼狈不堪，无所适从，一个个变得谨小慎微，疑虑重重；再加上这个时期党和政府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发生了偏差，致使这些刚从旧社会走过来，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唯物论这些新东西比较陌生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之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误会，产生了隔阂。其实党和政府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弊端，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成立专家局就是为了能够搞清楚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以便对症下药。

民盟是个知识分子的政党，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那时费孝通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部副部长，他通过这个渠道，用“串联”和“滚雪球”的办法，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1956年下半年费孝通赴云南进行少数民族调查，专家局要他趁这个机会，了解西南方面知识分子的情况。

1957年春完成调查后，费孝通把半年多来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状况向专家局作了报告，同时也向民盟中央汇报。汇报以后，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估计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许多同志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他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文章说：

>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问题表现在哪里？他指出：

>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来，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究竟顾虑些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

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担心……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15]

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但是，这样一篇反映真实情况，受到群众欢迎和党的高层领导肯定的文章，后来竟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主要罪状。

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费孝通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民盟这个知识分子政党来看，这次运动"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共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35%；各省市委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16]

三、"文革"动乱，抄家批斗

费孝通被撤销了一切职务，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但是在民盟中央还保留一个委员的位子。翌年，摘掉右派帽子，从社会主义学院毕业，回民盟中央参加学习，继续"改造立场，改造思想"。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结束了，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很多知识分子由此心存疑惧，对国家的政策、形势、工作等方面的看法，采取了"不讲、不写、不想"的态度。

到1960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困难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不仅粮、油、肉、蛋凭票供应，连花生、瓜子都难见踪影，只能

15 《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25、32页、33页。
16 《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2页。

在春节、国庆这样的节日里分配到一点。这时，怎样团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眼前的困难，成了执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共产党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它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为此，民盟中央组织的学习从形式上，一改反右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搞法，采取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这种学习气氛比较宽松，称之为“神仙会”。这时期，费孝通除了每周几个半天到民盟中央开“神仙会”之外，还有机会跟随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农村、工厂参观学习。

可惜，这样比较宽松的时候没有延续多久，一场空前的灾难突然降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8月24日，“民盟中央接到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的‘通牒’，勒令限期72小时内自动解散组织。8月25日，民盟中央以办公厅名义，在机关大门上贴出《中国民主同盟公告》。全文是：‘本盟完全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央处理。特此公告。’8月26日晚……民盟中央交出民盟中央委员会及民盟中央办公厅公章。至此，民盟中央工作全部陷于停顿。”[17]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场浩劫中，费孝通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抄家、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发配干校等全过程。1987年，他和美国纽约市大学亨特学院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谈话时说：“文革”一开始，“袭击来了，他们来拿走我家里全部东西，这叫抄家。”“我们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我主要是打扫卫生，但也有别种劳动。我负责打扫厕所。当时我对校园中的全部厕所都相当熟悉。那算是轻劳动。还要用手拔草。劳动是强迫的，劳动不积极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有时我们被带出去游斗和展览，头上戴一顶高帽子，身上挂块牌，写明我是‘牛鬼蛇神’。小孩们都嘲弄我们。我们被带到人群之前。他们呼口号，我自己也得喊，‘打倒费孝通！打倒费孝通！’有时我们要给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观看。我们不得不站在那里背诵我们的罪行。就我来说我不得不反复地承认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8]

1969年，费孝通随民族学院员工被送往湖北潜江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年头。

17 《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52页。
18 《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76页。

第十五章　重获新生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费孝通获得第二次解放。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中国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费孝通又像回到开国初期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的日子，希望尽快重新获得为祖国效力的机会。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已是个年近耄耋的老人了。

一、平反复出，重建社会学

1977年初，费孝通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这是他自反右以后第一次在这样重大的会议上公开露面，预示着费孝通的复出。这年年末，他得知中国科学院将恢复成立的消息，立即致信当时负责筹建工作的胡乔木和于光远。他说：“月前传来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消息，令人兴奋，这是领导上的英明决定。主持得人，尤为欣慰。久想修书表达这番心意，并想就年来实际工作中的体会，略抒所见，以供采择。”费孝通在信中除了表达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外，还主动请缨，说自己这匹“三四十年代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殊可告慰”[19]。希望还能像“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那样，供人民驱策。

其实，“四人帮”倒台，世道一变，费孝通就忙碌起来了。1977年，他受聘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加对“四人帮”的审判，撰写了《蓄意歪曲，无耻篡改》一文，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1978年，调离中央民族学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长。1979年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在重新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后，他先后赴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再次登上国际学术舞台，结束了与国外学界隔绝了近30年的历史。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木，要费孝通出面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

19 《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190、195页。

这期间，“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也逐步恢复组织和开展活动。1977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各民主党派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指示。民盟随即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翌年8月，民盟中央设立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宣传及日常工作。费孝通为该委员会成员。在1979年10月召开的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费孝通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批判、改造的对象，“文革”时更沦落为“臭老九”，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如今，虽然党和政府提出了这样那样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大家担心以后会怎样？莫不是又一个“阳谋”！

1978年，为了商量恢复社会学学科，胡乔木曾给30多位过去社会学界的老先生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座谈会，但是开会时只来了20多人。缺席的人中间，有一位费孝通的老同学，因为曾经为社会学说好话，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弄到北大荒去劳动了好几年，吃了不少苦。他接到开会的通知后，他的夫人说，你好不容易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结果他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怎样消除他们心中的思想疑虑，成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盟这个以文教科技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政党，有不少成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端遭到迫害，成了“重灾区”。因此，盟员中所反映出的思想顾虑，可以说就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

共产党当然深知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所以“文革”一结束，党内就开展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并且制定了相关政策。198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里宣布“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并同意统战部对“拟予改正”的22人予以改正，这22人中有费孝通、钱伟长、章乃器、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黄药眠、陶大镛等10多位盟员。6月23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正式宣布了上述决定。在这个座谈会上费孝通表态说：

>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给我一次不寻常的教育。我多少懂得了，每个人的思想，包括自己的在内，都有其社会的根源，而且都会在社会上发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曾按我自己对这方面的体会，写出过不少文章，流传在国内和国外，这些是我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脚印，串联起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那个思想历程。

这个历程曲曲折折地为我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生

存下去和昌盛起来，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而当务之急是搞四化建设。这是大局，这是百年大计。为此，个人的得失、沉浮、悲欢、荣辱还能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经过复查又对我作出改正的决定。以我个人来说，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人了，余生有限。请容许我说一说今后的打算。我除了保证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外，还想提到两笔老账，想写两本书：一本是我20年前许下的愿，想到我调查过的江苏本乡的一个农村里去调查一次……第二笔账是欠我前妻的，我们两人在30年代一起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她当时想写的调查报告因为她的不幸逝世没有完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宿愿……

从整个民盟来说，“到1981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政策，共有5583位被错划‘右派分子’的盟员经过复查后获得改正，占当年盟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数的97%。”[20]

二、重视教育，多出人才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民盟中央为了深入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决定由费孝通牵头，1982年在民盟内部做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不久调查结果出来了，其中说：“有一部分同志余悸尚存，担心1957年的悲剧重演，怕把提的意见转给本单位领导，白纸黑字，轻则影响关系，重则给‘穿小鞋’……有的担心‘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阵风后烟消云散……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记忆犹新……提意见是否又会被说成‘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21]也就是说，“文革”结束6年以后，这些顾虑依然像一块大石头那样压在知识分子心头。

此时费孝通正在为重建社会学四处奔走，到处讲学。每次演讲除了讲授社会学知识，还结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谈论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如果我们翻阅1981年到1984年这一时期他留下的文字时，可以看到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和知识分子》、《人才与智力资源》等这样有关“知识分子”、“人才”、“智力”、“知识”的文章不下几十篇。

民盟成员中知识分子多，其中有不少是教育工作者，可以说民盟在教育工作上是

20 《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62页。
21 《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81、195页。

有传统的。因此，民盟中央一直把教育问题作为参政议政的重点。费孝通说这是民盟的“教育大参政”。对于经历了10年浩劫，我国的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成了民盟中教育工作者经常研究讨论的问题。1985年元旦刚过，在福建漳州召开了“民盟九省市普通教育研讨会”，他代表民盟中央出席。来自各地的盟员教育工作者对中小学校的现状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经民盟中央主席会议通过后，一份《关于城市普通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和费孝通致胡耀邦的一封亲笔信，于1月15日送达中共中央。后来他在《知识分子要做“二传手”》中记录了此事：

> 教育是百年大计，兹事体大，关系几代人，要改好，必须看得远，看得全面……百年树人嘛……我们得到信息，党中央正在研究教育改革问题。我们提点建议，希望能及时，别成了马后炮。12号我从漳州赶回来，我这个“提货专员”，当夜把货送交执行局验收。我们开个会，说光这么送给党中央去，恐怕印象不深，最好加一点东西，几个副主席联名写一封信。我起个草，可是时间来不及，就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吧，我是民盟副主席还是代表民盟的。在这封信里，我说教育势在必改，怎么改呢……首先要抓住人，抓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提高。现在出现一个隐忧——我没用危机这种字眼，叫做“智力流失”很严重（在致胡耀邦的信中费孝通直言不讳地说，“智力流失”的原因是“各级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穷困，精神上缺乏鼓励，工作上得不到安慰……这是不容忽视的，必须及时地、大力地、坚决地采取措施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所以我说“要采取震动性措施”，使社会上耳目一新，使人感到做教师真光荣，就要有经济基础，要拿钱出来。我们不是没有钱，是花得不对头……所以我提，先规定一个数目比例，应当以总产值的百分之几作教育经费。国家财政拿不出来，有个差额，由国民的力量来搞教育公债包括华侨集资。[22]

也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出台的。当初文件稿提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民盟中央在讨论时，认为这个提法不够全面。费孝通把这个问题形象地比喻作“我们在人才方面要的是西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呢，还是桂林山水的独秀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民盟中央

22 《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2页。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在文件最后定稿时“提高全民族素质”这句话，终于写进了“决议”里边。

1989年2月，民盟就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召开了研讨会，会后拟定了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的十条建议，并于2月28日以费孝通的名义，代表民盟中央报送中共中央。费孝通认为民盟组织盟员对教育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算是丰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内容的一种已行之有效的方式。我们当审慎地在现存的渠道中切实地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23]

3月11日，民盟中央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复信：

> 民盟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问题的建议信已收阅。建议信提出了许多好的重要的意见。中共中央不久将举行会议讨论教育问题，在拟议的文件中，民盟同志们的许多好意见已有反映；有的问题，请国家教委同民盟的同志进一步探讨、磋商。1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年年都有进步，但仍有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我们真诚欢迎各民主党派和一切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同我们一道把教育工作搞好。[24]

无独有偶，就在民盟把“十条建议”送交中共中央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登门拜访费孝通，两人就当前教育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可以从上述事例中，看到民盟在参政议政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亲密合作的精神。

23 见1989年3月1日，费孝通致阎明复信。
24 吴修平：《信念与探索》，群言出版社，2001，第94页。

第十六章　参政议政

1987年1月9日，民盟召开五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费孝通为主席。1988年3月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担任民盟主席期间，费孝通十分重视民盟组织的自身建设。

一、多党合作，推进民主

费孝通给秘书定下规矩：到外地出差，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安排他与当地民盟的同志见面或座谈。在一次座谈时，有位盟员抱怨他们单位党委不重视民盟，在作决策时不听取民盟同志的意见。费孝通听了以后说：你要人家重视你，首先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第二，看你提的意见有没有道理，不能每次开会就发牢骚、挑毛病，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而是要提出事情应该怎样办才能做好。你提的意见有道理，办法好，对人家有帮助，人家自然会重视，会主动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谁喜欢老听你发牢骚、挑毛病。他就在这样的漫谈中了解基层盟员的思想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许多新人加入到民盟队伍里，一时间，民盟在当前政治格局里怎样正确定位，成了民盟自身建设中亟待明确的问题。1986年，费孝通在一次与民盟中央机关同志谈心时，讲到民盟成立时的历史背景。他说那时候："人们看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搞独裁，一心准备发动内战；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积极苦干，一心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两相对照，促使中间的这股力量向两边跑，一部分跑到国民党方面，一部分到共产党方面。民盟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受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跑到香港，这部分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那时起就跟着共产党走。党的事业兴旺，我们也发展；党的事业受挫统战事业就受挫，我们同共产党'荣辱与共'"。[25]他希望年轻人要记住这段历史，要弄明白民盟在整个中国政治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费孝通领悟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从此坚定了他与共产党

25 《费孝通文集》第16卷，第306页。

合作的信念。他常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西方人不懂。“我们不要去抄外国政党的内容到中国来，中国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政治发展历史来看民主党派”；“讲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概念讲政党该做什么，更不能以别国的政党样本来套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26]对我国实行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深入浅出地用闻一多先生名字中的“一”和“多”来说明：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含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常说的闻一多同志的名字，就是“一”与“多”的关系……孙中山讲以先觉觉后觉，那么，谁来领导，谁是先进的。在这个世纪就是工人阶级先进。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党是先锋队。党的主要任务是起领导作用。

光有“一”是不行的，有“一”就有“多”，有纯就有杂。这个“多”是在“一”领导下的……共产党是领导，但不能脱离群众，要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领导起来，向一个方向出力量。所以民主党派要“多”……这就是“一”与“多”的关系。

二、投入建设，学以致用

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框架已经搭好，但是还需要我们添砖加瓦，充实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搞四个现代化，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建设。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民盟应该怎么做？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应该积极引导、组织广大盟员，用自己的智力，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发挥作用。费孝通审时度势，提出了民盟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的方针。

费孝通是一位人类学社会学专家，从立志研究这门学科之始，就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是“到实地去”躬身实践，并且立下了“志在富民”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等科学论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主持民盟工作以后，就用这种务实的精神指导民盟工作。

在费孝通这一思想指导下，民盟开展的办学讲学，扶贫支边和经济、科技、卫生、法律咨询等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比如由民盟四川省委牵头创办的凉山大学，因为具有“纪律严明、治学严谨、勤奋好学、尊师爱生”的好校风，深受各界好评，成为四川省唯一被国家正式批准纳入全国统一招生的民办大学。

26 吴修平：《信念与探索》，第339页。

又比如民盟北京市委科技委员会，在1990年组织盟内外农业专家组成攻关组，到顺义县南彩乡和俸伯乡开展大面积的吨粮田试验工作。攻关组采取优良品种，抢种抢收，充分利用有效积温，科学施肥，平整土地和采用农业机械等措施，一年工夫就获得成功，并在其他各县推广。

1988年，费孝通应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党委、政府邀请，率盟内外专家学者赴上述四省区考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他还组织盟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对中原地区发展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战略、河南省跨世纪发展战略、环渤海地区发展战略等一系列专题进行研讨。这期间，民盟中央还和民盟地方组织合作，积极参与了江苏徐州、山东滕州等多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

费孝通不仅发动、组织各地盟组织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当中，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了寻求富民强国之路，在祖国大地上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他尤其关心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1991年，他听说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广宗县，至今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他想能不能发动民盟的智力优势，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把广宗县作为试验点，找出一个帮助地方脱贫致富的具体办法。于是从1991年到1996年，他三赴广宗考察。考察期间，他在贫困的大东村的打麦场上，坐在条凳上听村长汇报；在老乡家看到正在打竹帘挣钱的小女孩，还看到一架自己母亲时代就已经淘汰的、但在这里还在使用的织布机；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到西关村参观印染厂，去东马鲁村看了淀粉厂……考察结束，在与县领导同志座谈时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考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总的来看，这里农业基础薄弱，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希望作为“父母官”的干部，一定要争气，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共同治贫。改变观念，眼睛不能只向上看，一味指望国家给钱，最根本的是要向下看，组织农民从他们熟悉的副业生产入手，不要小看大东村打竹帘那样的副业，搞好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村致富的一条路，当然不能让该上学的孩子来做这件事。如果把全县的劳动力转变成生产力，就能让千家万户真正增加收入。

回京后，费孝通向国土开发建设基金反映在广宗了解的情况，在国土开发建设基金的帮助下，解决了广宗县因缺资金、机井不能配套的老大难问题。他还指示民盟河北省委组织河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和唐山市的陶瓷专家，帮助广宗种植旱作农业、推广培育蘑菇的技术，以及改进陶瓷厂釉面砖的生产……此后民盟就把广宗作为扶贫联系点。几年下来，在费孝通倡导下，民盟帮扶广宗脱贫的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引来了国外人士的参与。一个包括党政有关部门，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帮扶脱贫的局面正在形成。

后来在一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通气会上，费孝通把广宗生产的釉面砖带

到会场上，用实物作例子，向党中央汇报了广宗县的情况和民盟的扶贫工作。

三、实地考察，提出建议

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里，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途径，一是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民主协商或座谈会，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费孝通正是在开座谈会时，向共产党汇报了民盟在广宗所做的工作；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作用；三是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职务；四是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其实除上述四条途径外，民主党派还有一条更快捷、更有效的反映意见建议的通道，就是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可以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领导或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直接进行沟通。费孝通把这个做法称作“上书紫光阁”，说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优势”。这些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到2003年，费孝通利用这一“优势”向“紫光阁”递交的“奏章”有：《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关于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建议》、《关于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建议》、《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就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问题与江苏、浙江、上海党政领导座谈的情况汇报》、《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建设黄骅港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关于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关于将牡丹江市列入开放城市和在哈尔滨市建立内陆港的建议》等30多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重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落实或纳入了国家的各项计划和规划之中。

四、参政议政，务实求真

在费孝通大力倡导和带动下，民盟的社会服务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成效。1989年11月，费孝通出席在徐州召开的民盟区域规划和咨询工作经验交流会，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参政议政不是空谈，而是通过我们参加实际的工作，来发表我们的政治见解、意见和建议。我们和共产党唱一台戏，一台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的戏……通过做好事，做实事，我们才是真正参加到政治工作中去。”

他的“做好事，做实事”的主张一经提出，得到了各级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的积极响应，但也有一些盟员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政党就应该搞政治活动”，这样做就“把民盟由一个政党变成了学术团体”。针对这一尖锐的批评，费孝通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阐述这样的观点：

> 什么是政治？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这就是政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政治吗……民盟是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集合了一批学有

专长，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在知识分子中带头，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使更多的人来搞社会主义、搞四化建设，这就起到了政党作用。民盟要有威望，让人家信得过，不是靠投票得来的，是要靠做实际工作才能获得。我们的队伍要精，我们要真正有知识的人，不要空头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有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以致用的精神。[27]

1992年4月，在一次民盟中常会上，费孝通就民盟为经济建设开展服务工作的问题，再次阐明：“什么是参政议政？所谓参政议政，不是乱说话，也不是说空话，而是要求我们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说，要求我们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28]

由于“出主意、想办法”和先前提出的“做好事、做实事”，既符合民盟在我国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方位”，又能最大程度发挥盟员的积极性和优势；而且这十二个字，朴实无华，表达直白、准确，寓意深刻，念起来朗朗上口。这些年来，广大盟员正是按照这十二个字的精神，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民盟各级组织也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比较深刻地了解国情、民意，从而为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通过实践，费孝通的这一指导思想在盟内逐步取得了共识。1992年12月召开的民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盟的‘六大’以后，费老进一步提出了民盟工作要努力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民盟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他听了以后，谦虚地表示：“还是把这十二个字说成民盟工作的主张比较好。所谓主张，指的只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还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总结经验，再加以完善。”[29]到1994年，这十二个字“才正式肯定为民盟工作的基本方针，写入民盟中央的文件之中”[30]。

1996年11月，86岁高龄的费孝通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任民盟名誉主席。

费孝通一生追寻民主，终于悟到了民主的真谛，坚定地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虽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费孝通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十年当中，以务实求真，不尚空谈的精神，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来指导民盟的工作。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方面，留下了大量著述。他的真

27 《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52页。
28 黄景钧：《费老倡导“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前后》，载《中央盟讯》2010年第2期。
29 黄景钧：《费老倡导“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前后》，载《中央盟讯》2010年第2期。
30 29 黄景钧：《费老倡导“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的前后》，载《中央盟讯》2010年第2期。

知灼见，不仅得到了广大盟员的认同，也受到了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病逝。贾庆林在致费孝通亲属的唁函中称：

惊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费孝通先生不幸逝世，心情十分沉痛。

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大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胸怀“志在富民”的宏愿，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民盟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事实、做好事”的思想，已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先生为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曾七下定西，无数次赴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研；即使在弥留之际，先生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统一大业。先生一生追求进步、光明，与中国共产党披肝沥胆，坦诚相见，不愧为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先生的逝世是国家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谨表达我的哀悼之情和慰问之意，望节哀保重。

第五篇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

第十七章 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第一章所述，关于差序格局理论，后人已做了许多研究和阐释，本章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作一浅显的阐述。

一、中国的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一圈一圈水波纹以己为中心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与己的界限弄得模棱两可，这和西方文化里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做法大相径庭。

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仔细调查和观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解剖中国传统社会，在费孝通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孝通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孝通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

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费孝通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标示着社会关系的亲疏。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震荡幅度可以大，也可以小，关键是看入水石头的大小，中心势力的厚薄。有势力的人家，家庭规模可以在三世同堂甚至是四世同堂的基础上，还有众多的门徒和食客，街坊可以遍及全村，村民们都可能参加这家人的婚丧喜庆。穷困潦倒的人家，身居闹市，也没有亲朋上门，家庭的规模可能就是一家三口甚至是独身一人。

二、“差序格局”的特点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有：

1.自我主义

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小到治家，大到管理一个团体或企业，甚至更大的组织，所有的政策或规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设计和实施的。这就是外国人所说的，中国单个人是条龙，合在一起是一条虫，这就是自我主义在作怪。

2.公私群己的相对性

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大圈包含小圈，小圈对内是一个团体，对外服从大圈。这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明显，即使到了今天，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已经非常深的今天，我们仍感觉到这个总结和概括是多么的准确和到位。

3.特殊主义伦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即使是当今的中国，法律法规已经普遍颁布和实施后，对法律的人为破坏或是曲解，也还是屡见不鲜。比如对于治理“黑网吧”，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管，但都管不好，就是因为各自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都以本部门或行业的利益为出发点。其它的社会管理的薄弱处和黑暗处，也都可以看到特殊主义伦理的影响。

4.人治社会

用于维持秩序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中国进行的讨论和争论，也是五四运动以后进行的，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法治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先进国家的法制环境相比，中国的人治色彩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还是很浓厚的，实现全面的法治，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要靠几代人，甚至多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步克服。

5.长老统治

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专制权力、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权力分配和制衡的机制，儒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就是它的理论总结。经过近百年的革命和运动，在中国大陆，这种长老统治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在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中，老人与青年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青年人能够比老年人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话语权自然地转移到青年人手中。家庭中老年人地位和话语权的旁落，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生产要素人口流动的加剧，家乡和宗族观念的淡薄，族长和长老的

地位和权力也随之削弱。当然，这种长老统治的影响和痕迹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和领域中更加明显。

三、差序格局的网络

差序格局是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这种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并加以总结后提出来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衍生而来的，比如孔子的为尊者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名份，对上自己微不足道，对下自己就代表了一切，上面永远是对的，而下面则永远只能遵守上面的规定，永远是奴才，除非你是三十年媳妇熬成婆。还有如修齐治平，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庭，再到国家，到天下，这四者之间可以转换，可以替代，所有的位置和要求都是相对的，这与西洋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是大相径庭的。

差序格局是以每个个体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在差序格局中，富于伸缩性的网络关系中，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有了这个自我主义，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就都可以解释了。如此精准的分析，在学术思想和大众生活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让所有人都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或身边的社会现象中，理解他的差序格局思想，并在心中产生亲切的理解。以至于有人说，如果中国社会学家当中有谁提出了什么理论可以算是中国人特有的贡献的话，首先就应当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

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社会形态已经过了三级两跳的今天，这个理论仍然有着非常强的洞察力。比如今日的中国，在许多单位里，规章制度是因人而异，对普通员工是约束，对领导就无法约束；一些法律对普通百姓是约束，对一定层级的官员就无法约束，这正是差序格局。“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使然”；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后，他们往往说贪污受贿是为了本单位或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以博得人们的同情。

这实际上也是差序格局理论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使然，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是公的，这样就为他的腐败行为开脱。甚至在一些地方，有些官员为了本地的利益，触犯了国家的法律，组织部门对这些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因公负伤”，自然要多照顾照顾。在中国的单位里，所有人除了正式的组织框架下的位置外，还有所谓“圈子”一说，同事与领导，同事与同事之间不是相等的距离，而是靠各种关系组成的“圈子”建立关系和行事，尽管中国的许多机构披着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外衣，但在机构内部真正运行的“潜规则”，还是差序格局的“圈子”：“圈子”内部的关系和“圈子”之间的关系。

第十八章　文化自觉与文化价值观

费孝通晚年提出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文化的反省来实现文化的自主性，目的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重新树立中国人近百年来在强大外来文化压力下丧失殆尽的民族自信心，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找到接榫之处”。如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等观点，不仅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引起震动和思考，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对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一、文化自觉的提出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文化自觉概念是费孝通在1997年初首次提出的。他说，在中国面向世界时，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起点。

什么是文化自觉呢？费孝通解释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应该同时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人类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1990年费孝通80岁生日，他在日本东京与老朋友的欢叙会上致答谢词时，在瞻望人类前途时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七年后，他指出这16个字“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2]。

1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66页。
2　《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50页。

二、各美其美，自觉地维护自身文化的历史传统

“各美其美”就是要认识并承认自己的文化，继承前人的经验，从前人的文化发展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种文化，既包括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又包括更深层和更抽象的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通过认识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来认识和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比如考察我们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中和位育”、“中庸之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观念，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和平共处可能作出的贡献。

童年时的一件小事，让费孝通在多少年以后，仍然在思索其中蕴涵的文化含义。他的祖母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有字的废纸，收集起来集中在炉子中焚烧，并告诉他要“敬惜字纸”，年少的他并不理解这个举动。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理解到了“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不仅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和思想，在传播和影响别人，更可能给别人带来祸福，写字写书，其文化意义可见一斑。

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费孝通在晚年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国学的根基不牢的遗憾。因为根基不牢，他认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把握不准，因此他还孜孜不倦地“补课”。他说：“因为缺少国学的知识，我也吃了很大的亏，讲中国文化的的时候，我不容易体会到深处的真正的东西。”费孝通认真“补课”，就是为了从更深层面来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他认为，各个民族或国家都能准确认识本民族或国家的优势和长处，就可以实现“各美其美”。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三、美人之美，学习西方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

“美人之美”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中国现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工业文明社会”和“信息化文明社会”，这两个在西方国家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在我们这里重叠在一起了。我们必须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了解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因此，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经验，不主张“全盘西化”，还应该走自己的路。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一生经历丰富，他经历了中国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或者说是经历了三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化文明和信息化文明阶

段。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20世纪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跳跃，费孝通称作为“三级两跳”，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在这个“三级两跳”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是时间上被严重挤压。西方发达国家在“三级两跳”过程中，时间准备充分，让人们的观念转变、制度设计、文化思想等能够逐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对社会和人的冲击相对来说少一些。就好像一个人经过一生的奋斗，才成为富翁，他对金钱的理解就准确得多，同时金钱对他的伤害也小得多。而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暴富，他就无法对金钱有正确的把握，同时巨额的金钱对他的伤害肯定不会小。中国“三级两跳”的过程，因为时间相对短暂，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是深刻而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

二是中国在“三级两跳”过程中，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界的干扰甚至是干预，使得中国的“三级两跳”走了许多弯路，甚至是错路，这同样对中国人从物质层面到文化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社会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滚滚而来，对中国的冲击更多更大。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留传统文化，成为很多人的担心。

三是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又因为中国在实现“三级两跳”过程中时间被严重挤压，每个文明传播和发展都不充分，三种文明同时递进又同时存在。比如，在中国的东部，信息化社会的特征已经明显，中西部还处在工业化社会时期，而老少边穷地区却还保留着农业社会的诸多特征。原来的以农业社会为典型特征的文明特质，受到多种文明、多种角度的冲击，旧的文明传统在迅速分解，而新的文明传统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只要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就不能停留在“各美其美”的阶段，如果这样，势必要造成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外来文化的拒绝，一定会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太多了。因此要从“各美其美”迈入到“美人之美”阶段，就是容忍、理解、欣赏和吸取异民族文化的长处。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中国文化中的“和”、“天人合一”、平衡和谐、人已关系等观念，在思想的核心深处，支撑了中国文化能够理解、欣赏和吸取异民族文化的长处。

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有通过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平衡营养，身体健康，反之，营养不均衡，就会造成身体出问题。联系到世界上许多文化的形成、壮大和灭亡，都是因为拒绝吸取异民族文化的长处，最后走上没落的。而近代一些发达国家，正是有了开放的心态，吸取异民族文化的长处，才实现了本民族的复兴。

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更不能搞单边主义、有我没你和有你没我，最后的结果就是冲突甚至是战争。如果两败俱伤，双方得不偿失；如果是一方“灭”了一方，被

“灭”的一方将会把仇恨固化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一有机会就会爆发。这种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反复出现。

联系199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费孝通说：“文化背景这么不同的球队，在球场上找到了大家都遵守的规则。如果将来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化能像不同的球队这样相处，这个世界就和平了。”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不断吸取异民族文化的长处，做到了“美人之美”。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体现。

四、美美与共，建立共同遵守的文化准则

实现文化自觉的另一体现是“美美与共”。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在认识自己的文化和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接触与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费孝通在多年的调查和观察中，有两件真实的案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到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区考察，看到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古老的狩猎民族，由于森林面积缩小，连生存都受到威胁，其文化传统的保存更显得岌岌可危。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其实这不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更是现代或后工业化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前途问题。

到了90年代，费孝通又到黑龙江考察同样只有几千人的渔猎民族赫哲族，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费孝通认为，这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发挥原有文化和特长，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要主动进行文化转型，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就是文化自觉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以小见大，中华民族在快速进行的“三级两跳”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费孝通不愧是实证研究的大师，他能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社会现象，层层分析，鞭辟入理，他对美国“9·11事件”的深刻观察，同样也为他文化自觉理论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依据，也更坚定了他对文化自觉理论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费孝通明确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而非西方的各种文明，亦产生了种种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对抗的思潮，把这种情况称作是“文明的冲突”

将很危险。

费孝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晚年所看到了一本《塞莱斯廷预言》，他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西方文化的反思录”，并从中听出了“文化自觉”四个字。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前五百年，西方人把自己交给上帝支配，浑浑噩噩过活，一切都是为了上帝。通过宗教革命，人们推倒了神的权威，却被世俗的追求所控制，一切感官和物质的追求和享受，成为世俗的潮流，这样又过了五百年。

到了新世纪初，即将开启的新的一千年，人们感觉到了人类发展有可能出现文化中断的危险，脆弱的地球再也承载不起如此疯狂的世界，西方世界出现的“千年忧患”情结，就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因此，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香港回归前的1988年，费孝通曾经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并出席了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他说，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又证明了当前的不同社会制度是可以共处的，香港的回归不单单是为我们二百年来忍辱负重的岁月画上句号，更大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在于一国中可以有不同制度协调并存……就中国文化而论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由“和谐”引伸而来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与异民族与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我的美是美，你的美也是美，我们各自的文化和制度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就是美美与共。

五、天下大同，各国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实现文化自觉的最终目标，就是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在晚年一直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社会，就是各民族和国家，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艰难进程，最终实现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原出自儒家经典。孔子《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一作：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现代科学证明，在浩渺太空，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太阳对地球的辐射能量，即使一亿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只要人类能控制人口，避免战争，保护环境，完全可以使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幸福地生活下去。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加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相互吸引和影响，“同”越来越多，“异”不断减小。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仍然经常出现，形成冷战以来，局部战争不断的局面。

实现“天下大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方向和共同理想，这一理想崇高、远大、广博而平易，是人类社会道德的至高点。我们不能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放弃为实现天下大同的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坚定地站在人类社会道德的至高点上，点亮全球化进程的指路明灯，才能共同为保护和建设好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作出应有的贡献。

费孝通把中国文化亲切地称为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这个土地就是地球母亲，无论是人还是其它，都是如此，来自于此，也回归于此。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化典籍里，都是提倡这种思想，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是如此，虽然朝代在更迭，但并不影响这些核心思想的代际传承。

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通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来为世界大同作出贡献的愿望。他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而他为找这条路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

第十九章 费孝通文化思想特点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其文化思想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中学熏陶，西学系统，学贯中西；从实求知，由点及面，终成体系；深入浅出，老少咸喜，微言大义；追求民主，志在富民，知行合一。

一、中学熏陶，西学系统，学贯中西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主要接受的是新式的现代教育。他的父亲费璞安曾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是较早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式人物。费璞安在从事教育的同时，还参与政治活动，曾于1911年被选为吴江县议长，主持辛亥革命吴江县光复，当众销毁清朝吴江县的官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也是一名思想解放的女将。在20世纪初，费孝通出生的那一年，她就在吴江创办起蒙养院，办起了新学，讲授新知识，提倡新文化，真正开风气之先。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童年的费孝通有着特别大的影响。

费孝通生活的江南地区，传统文化土壤深厚，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没有在旧学堂里读书，并不代表他对中国古籍没有涉猎，比如他在上中学时，就在著名文学家金松岑的督促下圈点过《史记》和《庄子》。他的差序格局理论，就是通过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乡江村，以及广西大瑶山、云南昆明的乡村家庭和生活，乡村组织和体系的透彻观察，发现了别人熟视无睹的风俗中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这种发现正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1916年到1938年的20多年求学经历中，费孝通一路走来，都是接受西式教育。这种西式教育，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生长于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国家庭的费孝通，求学经历却充满了浓厚的西学色彩。这种独特的经历，成就了他学贯中西为特征的文化思想，得到了中西方学者和大众的一致认可。

二、从实求知，由点及面，终成体系

费孝通文化思想中，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早年，他进入学术领域，是从微型的农村社区实地调查开始的。无论是对广西大瑶山瑶族的考察，还是对家乡江村的考

察，对云南三村的调查，都是通过对一个一个点的科学调查，采用实证方式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对点的实证研究，是费孝通进入学术领域抢占的制高点，虽然他凭借《江村经济》，一跃成为社会学领域的新星，但他并没有停止在点上，而是继续前行，在继续关注点的同时，开始上升到面上的调查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进行了许多中观研究为代表，这其中，尤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点。在区域经济发展大课题下，费孝通关注和研究了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十几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比如他对温州地区三次考察，发表了三篇研究报告，提出了温州是小商品、大市场著名的论断，温州的实践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温州精神就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创新成为温州发展不竭的动力等观点。比如他对小城镇的研究，他看到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小城镇对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敏锐地提出中国的小城镇、大问题。这些观点，对今天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城市化运动，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比如他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发展方略，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国家和地区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上述学术研究和观点，都是他在原来农村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上升了一个层面，就是以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构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到了晚年，费孝通以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文化自觉理论，将其文化思想建立起一个博大的系统，他将关注的视野放到全中国、全世界，并且分别提出了具有非常现实指导意义的观点。特别是文化自觉，在他逝世五年后的今天，对照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战争，人类对自由和发展的渴望，我们更加感受到费孝通这一思想的伟大。

三、深入浅出，老少咸喜，微言大义

费孝通的著述，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杂文随笔，都透出一种中国文化人对人生时事的深刻理解，往往还能从中谈出许多新的思想。无论其早期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还是后来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小城镇、区域经济发展的系列文章，或是大量的域外通讯，甚至是一些以人生感悟为代表的《逝者如逝》等杂文，无不透露出这位学术大师对中国文字的率意运用。他能从平常的生活场景中看出别人看不透的道理，不得不令人信服，直到他的晚年，文风仍然一以贯之。以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这种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深刻有机结合，不仅在社会学界少见，在所有社会科学界也是独领风骚，这种为文风格也使费孝通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四、追求民主，志在富民，知行合一

费孝通一生都在追求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幸福，无论他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无怨无悔，直到晚年，八九十岁高龄时，仍然行行重行行，在他患病前，每年在外地调查的时间都有100多天。追求民主，费孝通从青年时期就身体力行，特别是他在求学英美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民主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也坚定了他对民主的追求，并将其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从英国回国，报效祖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解放前夕，他应邀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见面，共商建国大计。

解放以后，他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无论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的识别，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关心，还是对知识分子的管理，他都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即使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都没有动摇他追求民主和志在富民的信念。改革开放后，他虽然已是高龄，但他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一点也没有松懈。当他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繁忙的公务也没能妨碍他的学术探索和思考，并将其为人民服务，为困难地区的弱势群众、民族服务，在更大范围推行他追求民主，致富于民的思想。他提出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作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开创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代新风。中国的大学问家很多，很少有像费孝通这样的人，解决好了知行合一的问题，不仅提倡民主，追求富民，更是身体力行，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终身推进这项事业。他近百年的人生，因为追求民主，志在富民而显得灿烂。诚如他自己所说，当“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

后记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终于脱稿了。此书从动议到完稿仅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从理论上讲，编撰这样一本近十八万字的学术作品，时间是非常紧的，但之所以能够完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对费老的尊敬，对费老百年纪念活动的重视。作为组织方，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大家是怀着深厚的情感用心去写的，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去做这件事的。

2010年4月6日，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根据中共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雪娟的指示，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江市社科联主席何斌华召集，邀请刘豪兴、徐大伟、杨晓容、冯月根、王庆、叶勇等同志召开了关于编撰《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一书的座谈会，会上研究决定了从推进学科建设、开展民族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和发展文化思想等五个方面，全面反映费孝通先生无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学者、教授，还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在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书作为纪念费老百年诞辰的献礼。会后，根据各自分工，进入到全面推进状态，并先后邀请了费皖、徐平、吴铎、刘长喜、叶伟春、刘勇、潘允康等同志加盟到编写工作中来。

具体写稿的作者是：第一篇“学科发展”中，第一、二、四章的作者是刘豪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刘勇（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第三章的作者是潘允康（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勇。第二篇“民族研究”的作者是徐平（中央党校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第三篇“经济社会发展”中，第八章的作者是冯月根（吴江市政协经科委副主任）；第九、十章的作者是叶伟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负责人）；第十一的章作者是刘长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人文学院副教授）；第十二章的作者是吴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第四篇“民主政治”的作者是费皖（费老侄子、原民盟中央巡视员）。第五篇“文化思想”的作者是杨晓容（吴江日报社副总编）。最后由何斌华、王庆、朱云云（原吴江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进行统稿和审定。

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领导、专家学者和费老亲属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吴江籍人士汝信教授亲自为本书作序。中共吴江市委书记徐明，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温祥华等领导多次过问本书的编撰进程。中共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雪娟同志作为本书的主编，在编写的过程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费老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女婿张荣华先生也多次关注本书的进展。在编撰过程中，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何斌华同志，市社科联副主席王庆同志、叶勇同志，市政协经科委副主任冯月根同志，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等，都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在此，对上述人员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匆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出现疏漏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8月于吴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 曹雪娟主编.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0733-545-0

Ⅰ. ①费… Ⅱ. ①曹… Ⅲ. ①费孝通（1910～2005）—生平事迹②费孝通（1910～2005）—人物研究 Ⅳ.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8621号

责任编辑：许雪根
特邀编辑：董　侠
装帧设计：陈淑艳
责任校对：许　峰
责任照排：周建春

书　　名：费孝通——一位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吴江人
主　　编：曹雪娟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3
版　　次：2010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545-0
定　　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5640827